

國立政治大學中東與中亞研究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學位論文



土耳其外交政策與新奧斯曼主義
Neo-Ottomanism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研究生：盧睿鎡

指導教授：魏百谷 博士

中華民國 112 年 7 月

摘要

2022 年俄羅斯以「去軍事化、去納粹化」的名義對烏克蘭動武，震驚全世界。西方國家除了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外，也位烏克蘭提供軍事和經濟上的協助。另一方面，土耳其仍在俄羅斯和西方國家之間保持曖昧的態度，一方面呼籲各方對話，另一方面也在烏克蘭的主權議題上支持烏克蘭的主權完整，反映了土耳其嘗試利用自身在俄羅斯和美歐國家之間的影响力，希望能在降低衝突的同時也能促進土耳其的國家利益。

本文的研究重點在於土耳其外交政策中的新奧斯曼主義，試著探討土耳其人對於過去鄂圖曼帝國的想像如何塑造當代土耳其的外交政策。透過文獻探討以及國際關係的建構理論，希望能夠釐清土耳其人到底是如何看待該國在世界上的定位以及和其他國家之間的關係。

關鍵字：土耳其、新奧斯曼主義、奧斯曼主義、鄂圖曼帝國、艾爾多安、達武特奧盧

Abstract

In 2022, Russia's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Ukraine in the name of “demilitarization and de-Nazification” had shocked the world. Western countries not only condemned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but also provided military and economic assistance to Ukraine. However, Turkey maintained an ambiguous stance between Russia and Western nations. While urging all parties to engage in dialogue, Turkey also supported Ukraine'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n the issue of Ukrainian sovereignty. This reflects Turkey's attempt to leverage its influence between Russia and Western powers, aiming to both reduce conflicts and promote its own national interests.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he Neo-Ottomanism in Turkey's foreign policy, aiming to explore how Turkish perceptions of the past Ottoman Empire shape contemporary Turkish diplomacy.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 le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structivism, the goal is to elucidate how Turkey perceives its global positioning and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countries.

Key words: Neo-Ottomanism, Turkish Foreign Policy, Ottoman Empire, Ottomanism, Ahmet Davutoğlu, Erdoğan

章節目錄

章節目錄.....	I
表目錄.....	III
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節、研究動機、背景與目的.....	1
第二節、文獻回顧.....	7
第三節、問題意識.....	9
第四節、研究方法與途徑.....	11
第五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18
第六節、章節安排.....	18
第二章、新奧斯曼主義的意涵.....	20
第一節、新奧斯曼主義的定義.....	20
第二節、新奧斯曼主義與近代土耳其的意識形態.....	23
第三節、達武特奧盧的論點.....	26
第三章、土耳其外交政策中的身分認同.....	29
第一節、鄂圖曼帝國的多元身分認同.....	29
第二節、鄂圖曼帝國晚期國家認同的形塑.....	31

第三節、戰間期到冷戰時期土耳其外交政策及認同	35
第四章、後冷戰時期土耳其外交政策與新奧斯曼主義	44
第一節、1980 年代以後土耳其外交政策	44
第二節、厄札爾的外交政策理念與新奧斯曼主義	47
第三節、厄札爾時期土耳其外交政策	52
第五章、埃爾多安、正義與發展黨與新奧斯曼主義	64
第一節、正義與發展黨與埃爾多安的崛起	64
第二節、埃爾多安、達武特奧盧及新奧斯曼主義	70
第三節、阿拉伯之春、敘利亞與新奧斯曼主義	77
第四節、新奧斯曼主義與埃爾多安的中亞外交政策	83
第六章、結論	88
第一節、研究發現	88
第二節、後續研究建議	90
參考文獻	90

表目錄

表 1：中亞五國人口的民族比例.....54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背景與目的

一、 研究動機

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 (Recep Tayyip Erdogan) 2022 年 10 月 28 日出席首都安卡拉的一場選舉造勢活動時，提出「土耳其世紀願景」(Century of Turkey vision) 的概念，他呼籲國民，從 2023 年起，土耳其全國不分黨派，要團結建立屬於土耳其人的世紀。他提出了幾個關鍵年分，包含 2023、2053 以及 2071 年，其中 2023 年代表的是土耳其共和國建國 100 周年、2053 年代表鄂圖曼帝國征服君士坦丁堡 600 周年、2071 年文中並沒有提，但根據筆者推測，這可能代表賽爾柱突厥人在曼齊克特戰役 (Battle of Manzikert) 中擊敗拜占庭人 1000 周年。(Gazete Duvar, 2022)

2023 年是土耳其共和國建國 100 周年，在此之前的鄂圖曼帝國國祚長達 600 多年。隨著國力衰退，俄羅斯帝國、奧地利帝國逐漸吞併鄂圖曼帝國在巴爾幹以及東歐的領土。到了 19 世紀，隨著拿破崙戰爭爆發，由法國興起的民族主義也擴及到其他地區，包含鄂圖曼帝國。除了國力衰退，希臘獨立戰爭、巴爾幹戰爭更讓鄂圖曼帝國喪失大量版圖，但同時也刺激了土耳其民族主義的發展，此股力量也讓土耳其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獨立戰爭中擊敗希臘軍隊，成功建立主權獨立的國家。

美國在 2010 年後將戰略重心從中東逐步移到亞太地區，以抗衡中國的崛起，中東，特別是兩河流域一帶缺乏強權來協助各國維持秩序，導致當地出現權力真空，成為各方勢力角逐的中心。土耳其的戰略價值以及地緣政治的重要性也大幅上升，一方面，土耳其位處歐亞之間，是東西方交通往來的要道，也是人員、物流流通的重要樞紐；另一方面，土耳其也是歐亞大陸能源運輸的重要轉運站，在俄烏戰爭爆發後，歐盟及美國對俄羅斯實施經濟制裁，俄羅斯也

降低天然氣的輸送以示報復，在這個脈絡之下，歐盟 7 月和位居高加索地區的國家亞塞拜然簽署協議，預計將輸送 120 億立方公尺的天然氣，希望在未來幾年能夠將輸送量提升到 200 億立方公尺以避免俄羅斯將天然氣當作外交武器，然而，根據土耳其和亞塞拜然的協議，土耳其擁有額外管線容量優先權，歐盟若要取得天然氣，則要先取得土耳其的同意。(駐安卡拉台北經濟及文化代表團，2022)

土耳其在能源、戰爭等方面越來越具有發言權以及影響力，自英國記者巴查德 (David Barchard) 提出「新奧斯曼主義」(Neo-Ottomanism) 的說法後，土耳其在外交上的積極動作常被視為「鄂圖曼帝國的再現」。從「新奧斯曼主義」的觀點來看，土耳其在現任總統艾爾多安的執政下，對內強調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對外強調伊斯蘭國家間的團結，並頻頻出訪前鄂圖曼帝國領土的国家，例如巴爾幹國家、中東及北非，這樣的外交行為和鄂圖曼帝國在 19 世紀改革國家、加強帝國境內不同文化、語言及宗教臣民團結的政策相似，這類政策被稱為「奧斯曼主義」(Ottomanism)，而當代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則被稱為「新奧斯曼主義」。

然而，另一種觀點認為，土耳其外交政策實際上也受到泛突厥主義的影響，這類思潮在中亞、乃至中國新疆都有一定的受眾，土耳其也組織突厥國家合作委員會 (已改為突厥國家組織) 以整合前蘇聯境內的中亞國家；此外，艾爾多安也曾在 2015 年對外展示 16 名土耳其古代武士，他們分別代表匈人、突厥人及鄂圖曼土耳其人等等，引發外界譁然，也被解讀為土耳其是在訴諸泛突厥主義。

隨著土耳其經濟發展上的崛起，政治及國際政治的變動也讓土耳其變得更為矚目。本文將透過梳理土耳其外交史以及從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的角度詮釋新奧斯曼主義，藉以回應新奧斯曼主義和當代土耳其外交政策的連結。而釐清新奧斯曼主義的概念會有三個影響：一、理解土耳其的身分認同基礎；二、明白土耳其在區域政治、甚至全球政治的自我定位；三、釐清地緣政治和歷史

文化因素何者對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影響比較大。

此外，土耳其執政菁英如何看待這些變化，以及土耳其人的認同如何形塑外交政策，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焦點，也是本文想要研究的目標。

二、 研究背景

土耳其共和國的前身—鄂圖曼帝國是多民族帝國，長期以來兼容不同民族以及宗教信仰的群體，帝國統治階層的菁英多半來自巴爾幹半島，直到西力東漸、現代性衝擊之前，鄂圖曼帝國並沒有以土耳其人為主體的概念。鄂圖曼自 17 世紀下半葉國力開始衰退，對外作戰屢次失利，到了 18 世紀，列強多次以保護僑民、信徒的名義干涉鄂圖曼帝國內政或發動戰爭，造成鄂圖曼帝國陷入存亡危機。在這個脈絡之下，鄂圖曼蘇丹試圖改革，並在 1839 年頒布御園飭令 (Gülhane Hatt-ı Şerif)，展開軍事、行政及經濟的現代化。

西方化及現代化改革措施對鄂圖曼土耳其的影響在於如何打造一個民族國家，起初鄂圖曼土耳其強調帝國境內穆斯林以及非穆斯林之間一律平等，有些學者將這樣的措施稱為「奧斯曼主義」(Ottomanism)。然而，鄂圖曼帝國仍無力阻止希臘獨立運動，巴爾幹半島興起的民族主義浪潮也讓帝國難以應付。

到了 19 世紀下半葉，蘇丹阿卜杜勒-哈密德二世 (Abdul Hamid II) 即位後開始強調伊斯蘭社群的概念，有些學者認為，他任內推行的伊斯蘭政策反映鄂圖曼帝國晚期的伊斯蘭主義，也就是強調伊斯蘭作為帝國陳民之間的核心和意識型態，以應對西方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答濤 2011, 130) 阿卜杜勒-哈密德二世試圖透過伊斯蘭主義的精神訴求強化鄂圖曼帝國臣民之間的團結。就本文看來，阿卜杜勒-哈密德二世雖然強調伊斯蘭主義，但是他任內推行的政策及改革措施仍然是以維繫帝國臣民團結為主，和奧斯曼主義仍無太大的區別。

儘管如此，由於大英帝國統治的臣民仍有大量穆斯林，而這些穆斯林並未因為鄂圖曼帝國發動聖戰而響應，導致伊斯蘭的訴求並未讓帝國臣民更加團

結，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出現更讓帝國分崩離析，在民族獨立浪潮之下，土耳其民族主義、泛突厥主義興起，並成為青年土耳其黨人、民族主義分子的意識形態基礎。這三個思維並非先後關係，而是同時出現，只是在不同時期統治菁英嘗試不同的方案，這也形塑鄂圖曼帝國晚期以及土耳其共和國初期的身分認同。

從 1923 年土耳其共和國建國到 1980 年之間，不同意識型態、思維影響土耳其國內及外交政策，其中凱末爾主義（Kemalism）影響最為重要，不僅塑造共和人民黨的意識型態，也影響土耳其共和國在東西方之間、歐亞大陸間的自我定位，直到 1980 年代伊斯蘭主義政黨在國內得到較多的支持度後土耳其對於伊斯蘭、世俗化和親西方立場才有所反思。

自俄烏戰爭 2022 年開戰已超過一年，部分國際政治學者、時事評論員會從強權政治的角度分析俄羅斯的國家利益、戰略目標，有些人則從美國或歐盟的全球戰略以及中美對立的脈絡去探討俄烏衝突的影響，卻比較少人以土耳其為分析主體。土耳其在地理位置上銜接歐亞大陸、控制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達達尼爾海峽，具有極高的戰略價值，在歷史上，土耳其和俄羅斯長期對峙，在高加索、東地中海競逐勢力範圍；此外，作為北約成員，美國也在土耳其國內部署核彈頭。因此，土耳其對於中東乃至烏克蘭地緣政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儘管這次衝突尚未落幕，但土耳其所扮演的角色卻相當重要。在戰爭爆發前，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多（Recep Tayyip Erdogan）次表示，只要俄烏雙方同意，土耳其願意擔任兩國間的調停者；他也向俄羅斯喊話，稱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攻擊的做法不切實際，烏克蘭並非蕞爾小國。但俄羅斯並未改變立場，反而指控土耳其持續向烏克蘭販售拜拉克塔爾（Bayraktar TB2，以下簡稱 TB2）無人機，該國也指控烏克蘭軍方利用 TB2 對烏東地區的平民動武。

戰爭爆發以後，俄羅斯及烏克蘭多次尋求談判契機，起初俄羅斯希望兩國在明斯克進行談判，烏克蘭拒絕，烏克蘭也提議在波蘭首都華沙進行談判，儘管雙方一度進行會談，卻沒有進展；過程中土耳其頻頻表示願意調解兩國衝

突，並在3月10日舉行俄羅斯、烏克蘭兩國外交部長談判，雖然結果無疾而終，卻是開戰以來兩國最高層級官員會談，凸顯土耳其作為調解者的角色。

除了協助兩國調停，土耳其憑藉著控制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達達尼爾海峽的戰略優勢，左右黑海地區船隻航行的權利，土耳其也在2月28日宣布，行使1936年〈蒙特勒海峽制度公約〉（Montreux Convention Regarding the Regime of the Straits）所賦予的權利，禁止各國軍艦進出黑海。

在戰爭中俄羅斯控制黑海主動權，導致烏克蘭作為歐洲糧倉，難以將小麥出口到國外，也造成全球糧食出現危機，土耳其也和烏克蘭、俄羅斯及聯合國協商，並在7月22日在伊斯坦堡達成協議，同意建立烏克蘭農產品出口安全運輸走廊，土耳其貿易部長穆什（Mehmet Muş）8月3日也表示，該國也和聯合國達成數項協議，將開放烏克蘭黑海港口，向各國運送糧食以緩解危機。（駐安卡拉台北經濟代表團，2022）

雖然土耳其是北約成員國，但該國和俄羅斯以及伊朗的關係也相當密切，在俄烏戰爭中儘管土耳其在聯合國大會中支持譴責俄羅斯，卻拒絕俄羅斯，也拒絕關閉對俄羅斯的領空，甚至同意俄羅斯寡頭在沒有違反國際法的前提下前往土耳其做生意，總統艾爾多安也在2022年7月19日前往伊朗首都德黑蘭，和俄羅斯總統普京、伊朗總統萊希商談敘利亞問題；他也在8月5日前往黑海度假勝地索契（Sochi）和普京會面，聲稱兩國在經濟及能源的議題上達成共識，同時也強化兩國在敘利亞反恐任務的合作。

對於土耳其在西方和俄羅斯、伊朗之間兩面討好的外交立場，有些學者認為土耳其此舉意味著「向東轉」，對內政治走向專制及威權主義，對外則和美國及歐盟保持比以往還要疏離的關係；但也有學者反駁，土耳其只是修正過去一面倒向西方的外交政策，讓該國對外交涉更有彈性的同時，和西方各國仍保有合作及談判的餘地。

除了外交政策，土耳其在2000年以後也強化軟實力（Soft Power），透過影視作品向伊朗、巴基斯坦等伊斯蘭國家輸出文化價值，例如近年來在中東受

民眾歡迎的電視劇《埃爾圖魯爾加齊》(Ertugrul)、《輝煌世紀》(Magnificent Century) 等等。近年來更是透過和中亞國家的合作，強化突厥語國家之間的聯繫，並在 2021 年 11 月將突厥國家合作委員會 (Cooperation Council of Turkic-Speaking States) 改名，變成突厥國家組織 (Organization of Turkic States)，引發俄羅斯及中國反彈，認為土耳其此舉是在鼓吹「泛突厥主義」(Pan-Turkism)，反映出土耳其自冷戰結束至今，在中亞的影響力大幅增加。¹

有些學者指出，土耳其自從正義與發展黨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以下簡稱：AKP) 上台後，對外政策一改以往謹慎及保守的態度，積極和巴爾幹地區、中亞國家以及非洲國家交往，並和過去地緣政治上有過節的伊朗、俄羅斯及敘利亞緩和關係。他們認為，土耳其一系列動作反映出他們想要建立既非東方、也非西方的外交政策，這樣的立場包含正義與發展對於伊斯蘭的觀點以及土耳其民族主義、泛突厥主義思想的影響，彷彿想要重新打造鄂圖曼帝國，他們將這些外交政策稱之為「新奧斯曼主義」(Neo-Ottomanism)。²

儘管不同媒體和學者引用「新奧斯曼主義」一詞來描述土耳其外交政策，該詞彙的意涵以及說法卻因人而異，土耳其政府多次反駁新奧斯曼主義的說法，認為西方政府、學界及媒體使用這個詞彙時暗示土耳其是個帝國主義的國家，同時也反映西方中心論以及對土耳其偏見。(Nicholas Danforth, 2020)

¹泛突厥主義旨在強調突厥語系各民族之間的團結，並不侷限於單一國家，本文之後會加以詳述。

²鄂圖曼帝國的原文是土耳其文 Osmanlı，按土耳其文應該翻成奧斯曼帝國，考量到台灣習慣使用鄂圖曼帝國一詞，因此在文內皆會以「鄂圖曼帝國」指涉奧斯曼帝國。但本文於此處使用「奧斯曼主義」指涉 19 世紀鄂圖曼帝國境內的意識形態，使用「新奧斯曼主義一詞」指涉 21 世紀盛行於土耳其國內的意識形態。

三、 研究目的

本文試圖以土耳其共和國為主體，首先探討新奧斯曼主義概念的源起、歷史發展。接著透過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的理論闡述新奧斯曼主義對當代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影響，建構主義強調身分和利益對於國家的重要性，而在討論土耳其外交政策時，本文認為土耳其的身分及認同對於外交政策有所影響。針對土耳其外交政策，本文會特別著重分析土耳其前總理厄札爾（Turgut Özal）、埃爾多安以及埃爾多安任內土耳其外交政策重要的規劃者、「新奧斯曼主義」理念重要貢獻者達武特奧盧（Ahmet Davutoğlu）的作品及思想。

第二節、文獻回顧

台灣學界對土耳其的研究著墨較少，論文方面有張智棠的〈土耳其對突厥國家之外交政策研究〉，他的重點聚焦在澄清過往外界對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誤解——認為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旨在輸出泛突厥主義。³

張智棠指出，泛突厥主義並非指導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唯一意識形態，土耳其自冷戰結束以來，雖然透過突厥的淵源聯繫拉近和中亞國家的關係，但由於自身實力不足，中亞及高加索國家並未完全買單，近年來土耳其的角色更像是扮演協調各國衝突的仲裁者以及將中亞能源轉運到歐洲的國家，泛突厥主義在國內反而受到壓制。

這篇論文的價值在於分析土耳其和中亞、高加索國家在歷史、能源和地緣政治的關係，儘管並未討論正義與發展黨上台後外交思想的變化，但仍然是研究「新奧斯曼主義」外交政策時相當重要的參考論文。

中國大陸對土耳其研究的專書仍不算多，但有一些具有相當價值的作品。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答濤的《現代國家與民族建構：20世紀前期土耳其民族

³ 張智棠, 2017, 〈土耳其對突厥國家之外交政策研究〉, 台北: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主義研究》是研究現代土耳其身分認同和民族建構的著作。⁴該書從民族研究的角度出發，內容包含鄂圖曼帝國晚期民族制度的轉變、近現代突厥學、土耳其民族主義的發展以及共和國時期土耳其史觀的變化，這本書的時間點落在鄂圖曼帝國晚期到土耳其共和國初期，對於伊斯蘭主義的描述不多，距離正義與發展黨上台的時間點相差將近八十年，儘管如此，本書仍是研究土耳其認同政治相當重要的參考資料。

鄭州大學世界史博士朱傳忠的《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研究》補足上述兩部參考文獻的不足之處，內文重要之處在於彙整土耳其伊斯蘭政黨的發展史到正義與發展黨的崛起，有助於分析伊斯蘭、正義與發展黨黨綱甚至是現任總統艾爾多安對於當代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影響。⁵

在論文方面，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生宋斌的〈從泛突厥主義到新奧斯曼主義—論冷戰後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調整〉完整分析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轉變、正義與發展黨上台後外交政策的調整以及新奧斯曼主義的核心思想，唯一的問題是該篇論文並未處理新奧斯曼主義詞彙的定義、來源以及爭議。張向榮在〈新奧斯曼主義:歷史嬗變与〉中則分析奧斯曼主義概念的起源以及不同定義，他也援引土耳其官方的說法，駁斥外界對於新奧斯曼主義詞彙的「濫用」，他也強調，儘管土耳其官方否認新奧斯曼主義的說法，但該理念在土耳其國內根深蒂固，得到不少民眾的支持。

西方對於土耳其外交政策和奧斯曼主義的相關資料比較豐富，土耳其政治學、歷史學家亞伍茲（Yavuz）的作品《Nostalgia for the Empire: The Politics of Neo-Ottomanism》是理解新奧斯曼主義最重要的參考文獻，他從歷史及社會學的角度探討新奧斯曼主義的定義、鄂圖曼帝國晚期奧斯曼主義到 1980 年代新奧

⁴ 答濤（2011）。《現代國家與民族建構：20 世紀前期土耳其民族主義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⁵ 朱傳忠（2018）。《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研究》，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斯曼主義的歷史演變，進而探討這些思維是如何影響當代土耳其外交政策，以及其他國家如何看待新奧斯曼主義。⁶

土耳其國際關係學者埃爾詹（Pinar Gözen Ercan）編輯的作品《Turkish Foreign Policy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egality and Global Reach》則是理解土耳其外交政策演變的重要參考資料，整本書按不同主題探討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例如能源安全、土美關係、俄土關係……等等。⁷科塞巴拉班（Hasan Kösebalaban）的《Turkish Foreign Policy : Islam, Nationalism, and Globalization》則是從歷史脈絡、國際政治的角度分析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演變，是理解土耳其外交史的重要作品。⁸

哈爾（William Hale）是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研究土耳其的教授，他的《Turkish Foreign Policy since 1774》相較於上述作品，補充了鄂圖曼帝國後期的外交政策演變以及冷戰結束後土耳其外交政策以及國際關係的變化。⁹

本文希望整合國際關係理論分析以及歷史脈絡，從更宏觀的層面去解釋國際局勢、地緣政治和歷史脈絡是如何塑造當代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並強調不只是物質層面的權力，非物質層面的意識形態同樣也會對土耳其和他國的關係有所影響。

第三節、問題意識

透過文獻整理，筆者發現，目前台灣學界較少研究新奧斯曼主義的概念及外交政策，在俄烏戰爭、亞塞拜然—亞美尼亞衝突以及塔吉克—吉爾吉斯衝突的背後，都能看到土耳其的身影，反映出土耳其在國際的影響力是不斷上升的。

⁶ M. Hakan Yavuz (2020) . Nostalgia for the Empire : The Politics of Neo-Ottomanism,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⁷ Pinar Gözen Ercan (2017) .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egality and Global Reach US : Palgrave Macmillan.

⁸ Hasan Kösebalaban (2011) .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slam, Nationalism, and Globalization US : Palgrave Macmillan.

⁹ William Hale (2012) . Turkish Foreign Policy since 1774. New York : Routledge.

朱傳忠的《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研究》雖然徹底分析了土耳其伊斯蘭政黨的崛起、艾爾多安以及正義與發展黨對土耳其當代政治的影響，但在外交和國際關係的層面則偏向強調達武特奧盧的思想、政策，而忽略了是怎樣的社會背景、歷史脈絡塑造了這樣的政策。

亞伍茲（Yavuz）的作品《Nostalgia for the Empire：The Politics of Neo-Ottomanism》雖然鉅細靡遺的分析了新奧斯曼主義思想的起源以及對土耳其政治的影響，但在分析外交政策的部分則較為瑣碎、不夠詳細，需要綜合其他外交政策文獻才能探討土耳其外交政策中的新奧斯曼主義。

哈爾的《Turkish Foreign Policy since 1774》詳細闡述鄂圖曼帝國晚期到土耳其共和國外交政策的演變，從歷史脈絡的角度探討土耳其在不同國際局勢下如何制定、修正外交政策，他的作品明確闡述歷史演變是如何塑造當代的土耳其，但缺乏對2001年正義與發展黨上台以後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分析，以及缺乏對於土耳其自我認同的闡述。

因此，本文希望透過釐清新奧斯曼主義概念的形成以及其對土耳其自我認同的影響，補足上述提到的問題，包含：一、為何身分認同的元素對土耳其外交政策是相當重要的；二、土耳其身分認同是如何塑造以及演變的；三、新奧斯曼主義是在怎樣的國際局勢之下出現的，又是如何影響當代土耳其的認同以及外交政策。

針對身分認同的環節，本文將比較國際關係理論對國家的主體性以及身份認同是如何論述的，包含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進而主張建構主義比較能說明土耳其外交政策受到新奧斯曼主義的影響。

接著，本文將探討鄂圖曼帝國到土耳其共和國的意識形態以及身份認同，從歷史脈絡的演變論述土耳其在不同時期扮演著不同角色，而這樣的角色又受到和他國互動、地緣政治格局所影響。

最後，本文將分析新奧斯曼主義的內涵、新奧斯曼主義概念的提起以及這樣的觀念又是如何應用在土耳其的外交政策。

第四節、研究方法與途徑

一、研究方法

本文結合文獻分析法以及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以下簡稱建構主義）途徑，分析土耳其新奧斯曼主義外交政策的概念、形成以及如何形塑土耳其自我認同的過程。¹⁰透過文獻分析法，本文將檢視各式文獻，比較不同學者對於新奧斯曼主義的看法以及差異。

另外，本文也會透過歷史研究法檢視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演變以及國際環境是如何影響土耳其外交政策制定過程。本文後冷戰時期為起點，以當代土耳其為終點，分析主體包含決策制定者、國際政治環境以及意識形態。

二、研究途徑

本文也會透過建構主義的途徑，闡述土耳其的外交決策很大程度受到地緣政治以及自我認同的形塑，之所以會選擇建構主義，是因為本文認為，僅用傳統現實主義或自由主義的角度，難以解釋土耳其在強權之間反覆不定的立場，若能從歷史脈絡和身分認同的角度闡述，則能更深入的理解土耳其身分認同的矛盾以及情感。

國際關係對外交政策的分析有不同的研究途徑，一種是將從不同行為者的角度看待國際關係以及國家外交政策。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e Realism）學者華爾滋（Kennez Waltz，2018）在著作《Man, the State and War》中提出三種意象，分別為人類行為、國家的內部結構以及國際無政府狀態。第一種意象強調人性或個人行為是影響國家行為的重要來源；第二種意象則是從國家內部的狀態解釋國家的行為；第三種意象則是從國際政治的狀態解釋國家行為。他的論述也成為當代國際關係學界分析國際關係事件的重要基礎。

除了上述提及的分析層次和決策機制，以下將檢視數種有關土耳其外交政

¹⁰ 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原為社會學的詞彙，國際關係學者奧努夫（Nicholas, Onuf, 1989）首先提出建構主義的詞彙，藉以挑戰國際關係學界主流的經驗主義、科學研究途徑，強調語言、規則和觀念對於研究國際關係同樣相當重要。

策的國際關係理論。

土耳其國關學者亞瓦奇（Faruk Yalvaç，2014）針對研究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國關理論，依照哲學上的知識論區分為三大類：實證主義、後實證主義、批判實存論（Critical Realism）以及歷史唯物論。

實證主義（Positivism）一詞來自 19 世紀法國哲學家孔德（Auguste Comte），主張要用科學、經驗的方法來研究社會，透過經驗、觀察以及理論檢證的方式得到科學的知識。（Martin Hollis 1994，41-42）國際關係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以及新自由主義均採用實證主義或理性主義方法研究外交行為，這些理論的共通點在於假設國家是國際政治的唯一行為者，國家的決策機制、外交決策的流程被視為國家經過深思熟慮後所做出的行為。

現實主義主張國際是無政府狀態，國家是單一且理性的行為者，理性指的是國家會根據能最大化利益的原則選擇合適的手段，在現實主義的理論下，安全、權力是國家最重視的利益。新自由主義的論點和現實主義相似，同樣主張國際是無政府狀態，國家也會重視安全及權力，但差別在於新自由主義認為國際制度能夠促成國家之間的合作。（Faruk Yalvaç，2014 121-122）

後實證主義（Post-Positivism）則是挑戰人文及社會科學的實證主義敘事方式，拒絕承認社會科學存在一個客觀的法則以及行為規律。亞瓦奇（2014）將建構主義、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以及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列入後實證主義的類別，並按照這樣的分類反思建構主義研究途徑。

建構主義本身包含不同研究方法，溫特（Alexander Wendt）所採取的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vism）是建構主義的代表之一。相較於實證主義，建構主義重視觀念扮演的角色，認為國際政治的基礎是社會結構，而社會結構由觀念、物質條件以及利益所組成，國家之間會採取怎樣的行為取決於國家之間是如何看待彼此，也就是互為主體性理解（Intersubjective Understanding）。舉例而言，英國和北韓同樣持有核武，但對於美國來說，兩國對美國安全的威脅程度截然不同。

建構主義內部對土耳其外交政策的看法也有所不同。部分學者透過比較希臘及土耳其的認同差異，來比較兩國的安全政策；也有學者從批判性安全研究出發，挑戰傳統國際關係對安全的定義，認為國家本身也會界定安全的定義，而安全的定義則是受到身分認同以及安全的關係所影響。(Faruk Yalvaç, 2014 123)

相較於建構主義，後結構主義 (Post-Structuralism) 則是從論述實踐 (Discourse) 的角度出發，專注研究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是如何透過論述加以建構出來的。後結構主義國際學者希望能拆解外交政策背後的論述結構、質疑這些論述背後的二元論觀念以及展現出意義的不穩定性。(Faruk Yalvaç 2014 125)

綜合以上論述，本文認為國際關係的建構主義比較適合分析以及解釋土耳其外交政策中的身分認同，理由如下：一、從國內的分析層次或決策制定過程難以判斷國際情勢對於一國外交政策的影響；二、現實主義理論傾向於從因果律解釋國家之間的行為，卻沒有檢視國家的思維、行為的脈絡及意義，這難以解釋為何土耳其在後冷戰時期的外交政策著重於在中東、中亞和巴爾幹地區的互動。

要從建構主義理解土耳其外交政策中的身分認同，尚須解決以下一個問題：是否能夠將土耳其當作單一、具有思考能力的行為者？這樣的類比是否有效？

本部分筆者會先分析建構主義和其他理論在分析國家的身分任同時具有那些優點，亦即比其他理論更說明為何國家會採取特定的行動。

身分認同是國際關係領域發展較晚的研究。國際關係學者貝倫斯科特 (Felix Berenskoetter, 2017) 指出，國際關係領域對於身分認同受到社會科學的影響，包含美國符號互動論 (Symbolic Interactionism)、社會心理學以及發展心理學，但這類研究是近 2、30 年來才成為國際關係學界的研究焦點。在 1960 年代美國國際關係學界受到行為主義 (Behaviorism) 影響，強調量化研究以及

模型推演，認為哲學、歷史學性質的研究不夠客觀，因此早期國際關係或政治學界較少關注國家的身分及認同面向。

貝倫斯科特（2017）指出，1980 到 1990 年代，國際關係對於身分認同的討論才變得熱絡，這歸因於建構主義、批判理論以及後現代主義的崛起。其中後現代主義質疑「大敘事」，認為一切的知識皆文本。他們試圖找出我們認為科學、客觀的知識觀點，其背後的假設以及論述結構，對於國際關係而言，長期作為主流的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其以國家作為國際政治的單一行為者、重視安全和權力等假設也受到質疑，認為這難以解釋國際政治中國家的所有行為。

在這個脈絡之下，建構主義企圖將社會理論帶到國際關係領域，從社會學的角度解釋國家之間的行為以及行為脈絡。本節以溫特的社會建構論為主，首先討論建構主義的本體論、知識論及方法論，並進一步闡述國家的身分認同是怎麼形成的，又是怎麼影響該國外交政策。

溫特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根據兩個變數區分國際關係的主流理論，其一為結構的構成要件，他區分物質因素以及觀念因素，分別代表兩個不同的本體論，亦即物質論及觀念論；其二為結構與施為者（Agent）之間的關係，他區分成個別主義（Individualism）以及整體主義（Holism），基於上述的原則他把國際關係理論劃分到四象限圖，藉以挑戰主流理論以及提出新的看法。（Wendt 1999，22-23）

國際關係的新現實主義以及新自由主義假定國際是無政府狀態、國家是理性自利的行為者，追求的是客觀的利益，新現實主義重視的是相對利得，例如國家安全、威脅，新自由主義則強調絕對利得也是國家關注的核心。溫特認為，這樣的假設無法適用到所有的情境，國家有時候也會採取利他的行為，要解釋這樣的差異，必須要從國家之間如何看待彼此著手，同時也不能忽略國際體系對於國家的影響。

建構主義採取觀念主義本體論，認為國際關係的基礎是由觀念所構成，但

溫特強調，這並非排除物質的重要性，而是物質的重要性只有從社會層面來理解才有意義。另一方面，儘管他主張觀念主義本理論，但物質在一定程度上還是獨立於觀念存在。在國際關係層面上，物質的因素會體現在三個方面，分別是行為者所持有的能力、採取特定行動可能會造成的結果以及地理及天然資源。(Wendt 1999, 111)

在知識論方面，溫特採取科學實存論以及實證主義。前者指的是相信有一個獨立於觀察者的世界存在，成熟的科學理論可以在經驗層面指涉這個世界，他反對經驗主義所聲稱、客觀世界只能透過知覺來認識，也反對後現代主義的說法，認為所有我們看到的世界都是由論述、語言所構成的。(Wendt 1999, 51)

方法論的方面，溫特的建構主義主要受到三種社會學理論影響。其一為符號互動論，此種理論源自美國實用主義哲學 (Pragmatism)，認為人類的行為、意識是在特定情境之下所觸發的。符號互動論學者米德進一步將實用主義哲學用於分析人類行動和自我之間的關係，他認為人類和動物的差別在於，人類會使用各式的符號 (Symbol) 來互動，包含肢體動作、語言以及聲音等行為。(Wendt 1999, 316-317)

第二種理論為英國社會學家紀登斯 (Anthony Giddens) 開創的「結構化理論」(Structurizing Theory)，紀登斯認為，人類的行為以及人類創造的結構並非靜態的，而是不斷變動的過程。人類作為行為者會在過程中反思自己的行為，並對此加以修正。溫特將結構化理論的概念引進國際關係，認為國際關係的結構同樣不是靜態的，他會因為國家的互動、理解而產生變化。(Giddens 1984, 17)

第三種理論是方法論的多元主義。相較於新現實主義以及新自由主義傾向於從實證主義、量化研究以及因果律的角度分析國家行為的前因後果，建構主義重視的是國家採取的行為所代表的意義、行為的脈絡以及與行為有關的制度及規範，因此建構主義並不排除採取詮釋學 (Hermeneutics) 或量化的方式來詮

釋國家的行為。

如果要從建構主義解釋土耳其的身分認同以及外交政策間的關係，還需要解決幾個問題：一、將國家視為單一行為者，將國家外交政策制定的過程視為次要的角色；二、要如何處理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身分認同，以及新奧斯曼主義和土耳其外交政策、身分認同間的關聯。

國際關係新現實主義和建構主義都將國家視為單一行為者，差別在於新現實主義以經濟學的經濟人概念去理解國家的行為，他們認為國家會依照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的思維選擇滿足自己利益的手段和行動。

建構主義從社會學的角度去思考國家的組成以及性質，一方面假設國家是國際政治的主要行為者，另一方面也反對將國家看作是獨立於社會的存在，認為國家的性質取決於國家和國內社會之間的關係。因此，國家建立的過程就涉及溫特所提到的「共同觀念」（Common idea），也就是國家作為一個共同體，成員之間首先具備「我群」和「他群」的概念，並透過實踐將國家打造成能夠滿足集體想法的政治實體。（Wendt 1999，218-219）

溫特認為，國家行為不能化約為外交政策理論，原因在於這樣做會把國際政治的現象化約到個別政府部門或決策者的行為，忽略了國際政治的環境是如何建構國家的身分以及相對應的利益。

除了國家行為者，另一個概念是國家的身分認同以及相對應的利益。溫特在這部分採用符號互動論以及社會心理學的「自我」（Self）概念。根據符號互動論的定義，自我來自個人的內在反思，個人會在過程中建立一套思想、感覺、認同及動機機制，透過這樣的機制，個人學習從他人的角度看待自己以及預期他人會做出怎樣的反應，進而建立自我。

國家作為國際政治的施為者（Agent），同樣也具有特定的身分，他會依照身分界定屬於自己的國家利益，並採取不同的外交政策。根據溫特的分類，國家的身分可以分成四種：一、團體（corporate）：國家是由國內的公民、團體組成，並以「團體自我」（group self）的形象代表國內公民和其他國家打交道；

二、類屬 (Type) 指的是國家本身的特性或社會類別，例如民主國家、亞洲國家等等，一個國家可以具備多種類屬身分；三、角色 (Role)，指的是國家和國家互動後所產生的角色關係，這樣的特性無法單靠國家本身所產生，而是來自社會互動，舉例來說，學生和老師的關係並不是本來就如此，而是在課堂、學校等情境中才建立起來；四、集體身分 (Collective Identity)，這指的是國家不再著重自己的身分及利益，也會考量其他國家的問題，把他國身分利益當成自己的一部份，例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成員國會把單一成員國的安全視為自己的安全。(Wendt 1999, 226-227)

結合國家理論以及身份認同理論，土耳其外交政策不能被視為單一執政黨或著單一政治人物的思維，而是在國際環境下，土耳其作為國際舞台的成員，根據自己的身分和利益所做出的決策，這樣的決策不能完全由經濟學的理性選擇理論來解釋。為了闡述新奧斯曼主義和土耳其外交政策以及身份認同的關聯，本文將從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演變著手。

第五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在時間上主要探討 1980 年代到 2010 年代土耳其新奧斯曼主義外交政策的出現以及演變。在空間範圍上，本文則著重於探討土耳其和中東、中亞國家的外交關係。

二、研究限制

本文所遭遇的研究限制如下：一、語言能力：筆者語言能力有限，儘管有修習土耳其文，筆者所具備的閱讀能力仍不足以閱讀所有土文文獻，因此研究參考文獻仍會以中英文為主要材料；二、檔案取得不易：受限於交通以及國家機密等原因，筆者難以取的土耳其一手檔案，僅能透過外交部公布的新聞稿以及相關官員的論述、其他學者的研究建構研究架構；三、研究空間有限：土耳其自正義與發展黨上台後，頻頻對中亞、巴爾幹地區以及非洲釋出善意，但本文無力處理巴爾幹及非洲的部分，僅能針對中亞的部分簡單闡述。

第六節、章節安排

除了緒論和結論，本文共分為四個章節。第一個章節首先聚焦在「新奧斯曼主義」概念，並分析其概念鄂圖曼帝國晚期到當代土耳其之間各意識形態的區別。本章節首先著重在討論新奧斯曼主義詞彙的起源以及定義，接著分析達武特奧盧的思想以及土耳其地緣政治論述。

第二章主要討論外交政策中的身分認同。本文主要先從理論層面探討為何身分與利益是國際政治中很重要的一部份；接著討論國際關係中有關國家身分和認同的理論，並強調建構主義的研究途徑有助於解釋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搖擺以及土耳其思考自身和其他國家關係的方式。

二戰結束以後，國際局勢驟變，受到美蘇冷戰的影響，同時國內政局出現變動，造成土耳其外交政策改變，從戰前的孤立主義立場改為一面倒向西方的外交政策，這一舉措也影響土耳其和西方國家的關係，延續至今。

1980 年代以後，隨著冷戰局勢和緩，加上國內伊斯蘭政黨的崛起，土耳其不再堅持一面倒向西方的立場，開始強調和鄰國、中亞及伊斯蘭國家間的交往，強調該國是歐亞大陸間的「橋梁」，扮演東西國家間溝通的角色。2002 年以後，隨著正義與發展黨上台，土耳其對外政策比以往更為積極主動，也是在這時候土耳其提出「零問題外交」及「戰略縱深」思維，奠定當代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基礎。

隨著蘇聯的解體，蘇聯不再對土耳其構成地緣政治上的威脅，全球化的進程也持續進行，在這樣的背景下，土耳其試圖跨越冷戰期間親西方的意識形態，透過和中亞國家、高加索國家以及其他伊斯蘭國家的互動重新界定土耳其在國際政治中的定位。

第三個章節主要探討後冷戰時期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變化，這也是新奧斯曼主義外交政策的開端，本節將分析厄札爾時期土耳其重新思考國際環境、自身定位，並根據土耳其和其他國家的互動來檢驗此時期新奧斯曼主義外交政策的核心思維。

第四個章節主要討論艾爾多安執政後「新奧斯曼主義」對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影響，包含他在擔任總理期間土國外交政策的走向以及達武特奧盧擔任總理期間提出的「零問題外交」以及「戰略縱深」政策，接著也闡述阿拉伯之春如何對「零問題外交」產生衝擊，以及土耳其如何會應中東局勢的變化。

第二章、新奧斯曼主義的意涵

本章節主要討論新奧斯主義(Neo-Ottomanism)這個概念是怎麼形成的，他和土耳其人對於過去數百年的鄂圖曼帝國史、凱末爾主義以及當代土耳其在全球政治的定位有關。因此，本章將透過歷史研究途徑進行分析，共分成幾個章節討論新奧斯曼主義：一、新奧斯曼主義的定義；二、新奧斯曼主義與近代土耳其的意識形態；三、達武特奧盧的論點。

第一節、新奧斯曼主義的定義

在冷戰期間，為了應對蘇聯的威脅，土耳其於1948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以尋求集體安全的保障，成為西方陣營的一份子。

冷戰結束後，土耳其也展開和中亞國家、巴爾幹地區國家的往來及合作。被認為具有伊斯蘭傾向的正義與發展黨(Adalet ve Kalkınma Partisi, 簡稱AKP)也在2002年成為土耳其的執政黨，土耳其開始改善和鄰國的外交關係，同時也加強和俄羅斯以及中國的關係，改變在冷戰期間一面倒向西方陣營的外交政策。在這段期間，土耳其經濟快速增長、通膨、國債減少，出口量大幅增加，成為中東地區不可忽視的經濟及政治力量。(Emel Parlar Dal 2020, 32-33)

在經濟增長、外交多元化的情況下，1980年代英國、土耳其記者開始用「新奧斯曼主義」描述土耳其的自我定位(關於兩位記者對新奧斯曼主義的想法後面會詳述)。但這樣的定位起初還不是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方向，要到厄札爾總理執政以後，新奧斯曼主義的方向才變得明確。

新奧斯曼主義的概念是相對於傳統的「傳統奧斯曼主義」(Ottomanism, 以下稱為奧斯曼主義)。哈坎(Yavuz, M. Hakan 2016)指出，奧斯曼主義是鄂圖曼帝國採取的由上至下政策，透過賦予鄂圖曼帝國全體國民同等法律權利，以換取國民對國家的效忠。從歷史上來看，鄂圖曼帝國在17世紀下半葉以後步入

衰退，在俄羅斯帝國、奧地利帝國進逼之下，頻頻失去在東歐以及巴爾幹半島的領地以及附庸國。

為了回應列強的挑戰，鄂圖曼帝國開始推動改革，一開始的目標是軍事及外交，接著，面對希臘獨立、巴爾幹地區民族主義風潮，鄂圖曼帝國實行一連串官僚及地方行政改革，並於 1838 年頒布《御園飭令》(Gülhane Hatt-ı Şerif)，除了延續前幾任執政者的改革，也加強經濟和公民權的落實，與過去改革不同的是此次改革強調帝國臣民，不分宗教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咎濤 2011, 118)透過公民權的落實，鄂圖曼帝國希望能夠整合帝國境內不同宗教族裔的民眾以應對民族主義浪潮。

儘管鄂圖曼帝國的改革運動不算完整，但也代表帝國決心整合中央-邊陲以及不同米利特 (Millet) 的努力。¹¹而在改革浪潮中，受到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不同意識形態、民族主義思維也影響鄂圖曼帝國知識份子，其中影響最深的有三種方案：奧斯曼主義、泛伊斯蘭主義以及土耳其民族主義，這些思維對土耳其國族的建構產生重大的影響。

對於新奧斯曼主義，學術界目前有幾種不同說法，哈坎 (2016) 採取較廣義的立場，認為新奧斯曼主義涉及土耳其人重新想像鄂圖曼帝國的歷史，包含土耳其在歷史上作為多民族、宗教包容的帝國，透過想像的過程，土耳其重新反思自我的定位，重新確立土耳其在全球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土耳其外交政策中所遵循的規範及準則。

相較於奧斯曼主義，新奧斯曼主義不僅要整合國民的認同，還要建構新的國族認同，透過和歷史上隸屬於鄂圖曼帝國的國家、政治單元間，在歷史、文化及宗教上的聯繫，發展外交政策。(Yavuz, M. Hakan 2016, 443)

對於新奧斯曼主義一詞的來源有不同說法。穆里森 (2017) 指出，土耳其

¹¹米利特 (Millet) 一詞來自阿拉伯語 Milla，指涉的是宗教共同體。在鄂圖曼帝國中，米利特制度代表信仰不同宗教的社群，每個社群都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權。(咎濤 2011, 056-057)

記者坎達爾(Cengiz Candar)首先使用新奧斯曼主義這個詞彙，他認為新奧斯曼主義是當時土耳其知識份子對國家前途、外交政策的一種想像，認為土耳其應該採取積極外交政策。

卡帕特認為這詞彙在1974年土耳其因賽普勒斯爆發政變而出兵時就出現，當時希臘媒體首先使用新奧斯曼主義一詞表示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擴張傾向。(張向榮 2018 108-109)

英國記者巴查德則在1985年於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Chatham House)出版的《土耳其及西方》(Turkey and The West)中提到新奧斯曼主義一詞。他將新奧斯曼主義定義為一種「對鄂圖曼帝國史的意識」(consciousness of Imperial Ottoman past)，並認為這樣的意識隨著土耳其經濟快速增長，比伊斯蘭還具有影響力。(Yavuz, M. Hakan 2016, 443)

哈坎(2016)進一步補充，新奧斯曼主義意味著歷史意識的形成，並由文學、文化等因素所建構。新奧斯曼主義同時也是土耳其在國內以及國際環境變遷所發展出來的結果，就國內而言，土耳其在1980年代採取經濟開放政策；就國際而言，土耳其也參與新自由主義全球經濟秩序，這讓土耳其經濟快速發展，在國際上的自信心也逐漸增長。

土耳其前外交部長達武特奧盧2009年曾對正義與發展黨黨員演講，內容如下：

鄂圖曼帝國留下了一個遺緒，他們稱呼我們為『新鄂圖曼人』(neo-Ottomans)。是的，我們是『新鄂圖曼人』(new Ottomans)。我們被迫和鄰國打交道，我們甚至前往非洲，而強權則被我們的行為給震懾住。(Yavuz, M. Hakan 2016, 460-461)

達武特奧盧澄清他不是新奧斯曼主義者，《共和土耳其再造：鄂圖曼帝國瓦解後的記憶與現代性》(The Remaking of Republican Turkey: Memory and

Modernity since the Fall of the Ottoman Empire) 作者、研究土耳其美國外交關係的作家丹佛斯 (Nicholas Danforth) 也抨擊外界將土耳其外交政策貼標籤為新奧斯曼主義，他認為這背後暗示著土耳其是個「威權、擴張主義、伊斯蘭及反西方」國家，帶有西方中心論的偏見。(Altin Raxhimi, 2011; Nicholas Danforth, 2020)

第二節、新奧斯曼主義與近代土耳其的意識形態

如果新奧斯曼主義涉及土耳其人對於過去歷史的反思，那理解過去土耳其人的歷史及國家認同則有助於進一步探討鄂圖曼帝國轉型到土耳其共和國後，土耳其如何「拋棄」過去的歷史、建立新的想像共同體，以及在 20 世紀末，土耳其人如何重新回顧過去的歷史並依此建立新的認同。本節透過歷史研究法的途徑，闡述土耳其意識形態的演變，以及這些思維和新奧斯曼主義的差別。

鄂圖曼帝國從立國之初就以擴張為國家的基調，並以伊斯蘭世界的領導者自居，儘管在蘇里曼大帝 (Suleiman the Magnificent) 執政期間，為對抗哈布斯堡王朝 (Habsburg) 而和法國結成聯盟。但鄂圖曼帝國直至近代以前都未和歐洲各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有些觀點將此解讀為鄂圖曼帝國的伊斯蘭信仰導致帝國不願和歐洲國家建立平等的關係，直到 18 世紀末鄂圖曼帝國缺乏外交機構以及專責處理外交的文官體制。(A. Nuri Yurdusev 2003, 06)

隨著國力衰退，鄂圖曼帝國不得不做出改革以應對列強的進逼。奧斯曼主義是鄂圖曼帝國首次想要整合全體國民的意識形態，這個詞彙可以追溯自俄羅斯韃靼知識份子阿克楚拉 (Yusuf Akçura)，1904 年他在青年土耳其黨人創辦的期刊《突厥》(Türk) 發表短文《三種政策》(Üç Tarz-ı Siyaset)，文中指出，鄂圖曼帝國精英為挽救局勢，相繼提出奧斯曼主義、泛伊斯蘭主義以及土耳其主義，透過整理三種思維，阿克楚拉試圖說服讀者土耳其主義才是唯一救國之道。(咎濤 2011 113-114)

答濤（2011）指出，阿克楚拉是具有泛突厥主義（Pan-Turkism）意識形態的知識份子，在他的論述中暗示著這三種意識形態是相互排斥、不可調和的。格普納（Gürpınar, Doğan, 2013）則提出相反的看法，認為阿克楚拉也是務實的知識份子，他曾提及他無法決定土耳其主義、伊斯蘭主義何者才是鄂圖曼帝國最合適的政策，這三種意識形態都是理想的思維而非相互排斥。

從 19 世紀鄂圖曼帝國改革的方向來看，這三種意識形態並非互斥，而是代表不同時期因應不同環境而採取的不同政策。凱末爾·卡帕特（Karpat, Kemal H 2000）指出，這三種思潮相互依賴，同樣都是要讓鄂圖曼帝國在思想上跟上其他列強，只是隨著帝國面對風起雲湧的民族主義，土耳其主義逐漸成為主導鄂圖曼帝國決策的主要力量，進而導致三種意識形態失衡。

伊斯蘭是另一個影響鄂圖曼帝國改革的力量。早在 18 世紀下半葉，阿拉伯半島就興起一股新興勢力，被稱為「瓦哈比主義」（Wahhabism），瓦哈比主義的倡議者主張回歸原初的伊斯蘭，並試圖挑戰鄂圖曼帝國的權威，儘管鄂圖曼蘇丹馬哈茂德二世（Mahmud II）令當時實力壯大的埃及總督阿里（Mohammad Ali）出兵鎮壓，但鄂圖曼帝國的合法性以及權威也逐漸動搖。

1878 年蘇丹阿卜杜哈密德二世（Abdul Hamid II）即位，他開始推動泛伊斯蘭主義政策，包含強化鄂圖曼蘇丹作為全體穆斯林社群的「哈里發」

（Caliph）、強調全體穆斯林的團結以試圖強化鄂圖曼蘇丹的權威。（答濤 2011 132-133）哈密德二世所採取的泛伊斯蘭主義政策並不代表鄂圖曼的改革停止，相反的，他也延續過去幾任蘇丹所實施的政策，不同之處在於他認為專制及伊斯蘭在當時才是維繫鄂圖曼帝國的最佳方法。（Karpat 2000, 16-17）

隨著鄂圖曼帝國現代化的速度加快，民族與民族主義的觀念也逐漸被引進到國內。大約在 1850 年左右，鄂圖曼帝國境內開始重視土耳其人的突厥特性（Turkishness）。當時的蘇丹宮廷顧問傑夫戴特帕夏（Ahmad Cevdet Pasha）曾主張要將帝國的權力集中在土耳其人手中，當時政界也逐漸重視帝國的突厥起源，並希望透過突厥學的研究尋找自身認同的根基，這被稱為土耳其主義。

(Karpat 2000, 21-22; 答濤 2011 142-143)

相較於其他意識形態，土耳其主義的發展比較晚，他表現的形式也比較多樣，極端形式的土耳其主義為泛突厥主義或圖蘭主義 (Turanism)，比較不極端的形式則為土耳其民族主義。(答濤 2011, 137)

土耳其主義起初並未得到鄂圖曼帝國的關注，原因在於這類思想和帝國推行的奧斯曼主義以及泛伊斯蘭主義相悖，不利於團結帝國臣民。但隨著帝國面對巴爾幹民族主義、阿拉伯民族主義等風潮，土耳其民族主義也影響到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識份子以及軍人，他們仿效歐洲的「青年義大利」運動，建立「青年土耳其」(Young Turk)，並將原先知識份子建立的「鄂圖曼團結協會」改名為「團結與進步委員會」(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 簡稱 CUP)。(答濤 2011, 158-159)

直到 20 世紀初，CUP 以及青年土耳其黨人仍試圖延續奧斯曼主義的政策，但 1912 年爆發的巴爾幹戰爭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徹底粉碎鄂圖曼帝國想要凝聚多民族以及穆斯林臣民的企圖，迫使鄂圖曼知識份子和菁英尋求土耳其民族主義為救亡圖存之道。(答濤 2011, 160-161)

經過獨立戰爭後，1923 年土耳其共和國建國。為了建立現代化國家，土耳其採取政治、宗教、經濟及社會改革，也被稱為「凱末爾主義」(Kemalism)。¹²為了建構新的認同，土耳其編纂歷史教科書、廢除與鄂圖曼帝國以及伊斯蘭有關的符號，對國家展開世俗化的改革。他們認為鄂圖曼帝國以及伊斯蘭代表的是落後及不文明的象徵，試圖將宗教的影響降至私領域。(答濤 2011, 334-335) 從 1923 年到 1950 年，凱末爾主義下的改革刻意著重在建構土耳其國民對「土耳其」人的認同，在史學上他們也刻意降低伊斯蘭史以及鄂圖曼帝國史的

¹² 根據中國學者答濤 (2011) 研究，「凱末爾主義」一詞是英國人率先採用的詞彙，當時土耳其人並不會將改革政策稱為凱末爾主義，要到 1935 年以後土耳其才使用凱末爾主義獲同義詞「阿塔圖克主義」(Atatürkçülük)。

比例，藉以將過去與現在給分開來。(Erken, Ali 2013, 172-173)

第三節、達武特奧盧的論點

對於當代土耳其而言，新奧斯曼主義的發展和正義與發展黨以及達武特奧盧擔任外交部長任內提出的戰略縱深以及零問題外交有關，本節將簡述達武特奧盧的外交思維以及他所設想的土耳其地緣政治。

達武特奧盧是土耳其國際關係學者，他在 2003 年到 2009 年擔任時任總理艾爾多安的幕僚長，2009 年到 2014 年擔任外交部長，2014 年到 2016 年擔任第 26 屆總理，但他在 2016 年請辭下台。他有兩本著作，其一為《另類典範：伊斯蘭及西方世界觀對政治理論的影響》(Alternative Paradigms: The Impact of Islamic and Western Weltanschauungs on Political Theory)；另一本是《戰略縱深：土耳其的國際地位》(Stratejik derinlik: Türkiye'nin uluslararası konumu)。¹³

另外，他也在任內提出兩個外交政策，其一為零問題外交 (Zero-problem Diplomacy)，另一個是「戰略縱深」(Strategic Depth)，前者強調透過軟實力的方式緩和和周邊國家之間的關係，後者則是從地理和歷史的層面調整土耳其在全球政治的定位。

達武特奧盧畢業於伊斯坦堡中學 (Istanbul High School)。畢業後他在海峽大學 (Boğaziçi Üniversitesi) 完成政治學學位，先後取得公共行政碩士以及政治學及國際關係博士學位。(Ozkan, Behlül 2014 : 121) 達武特奧盧也曾在馬來西亞國際伊斯蘭大學 (International Islamic University Malaysia) 教授國際關係，這些歷程對他的外交政策思維以及地緣政治構思有所影響。

達武特奧盧的作品《另類典範：伊斯蘭及西方世界觀對政治理論的影響》包含他過去在博士論文中提到的觀念，他在導論中表示：「本書的基本主張為—

¹³ Ahmet Davutoğlu (1993) . Alternative Paradigms: The Impact of Islamic and Western Weltanschauungs on Political Theory, US :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Ahmet Davutoğlu (2001) . Stratejik derinlik: Türkiye'nin uluslararası konumu. Turkey : Küre Yayınları .

伊斯蘭及西方政治思想間的衝突及對比主要來自於哲學、方法論及理論背景的差異，而非僅僅是制度及歷史差異。事實上，制度及歷史的差異反映了背後的哲學—政治基礎。」(Yavuz, M. Hakan 2020, 184)

達武特奧盧認為，伊斯蘭文明和西方文明各自建立在毫不相容的知識論傳統，他拒絕普世主義的思想，認為這個觀念來自西方自由主義的思想。(Yavuz, M. Hakan 2020, 184)因此，他希望透過土耳其自身的歷史經驗發展出獨特的外交政策路線，而這樣的路線是獨立於西方政治思想傳統。

達武特奧盧在2011年當選正義與發展黨國會議員，並於2014年擔任黨魁以及總理。在他擔任外交部長以及總理的期間，「戰略縱深」成為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主軸及方向。土耳其學者亞瓦奇 (Faruk Yalvaç, 2012) 指出，戰略縱深的思維受到傳統地緣政治學理論的影響，包含德國地緣政治學家拉采爾 (Friedrich Ratzel)、荷蘭裔美國人史派克曼 (Nicholas John Spykman)、美國海權論學者馬漢 (Alfred Thayer Mahan) 等人。

「戰略縱深」的概念來自達武特奧盧的作品《戰略縱深：土耳其的國際地位》(Stratejik derinlik: Türkiye'nin uluslararası konumu)，其概念受到國際關係現實主義對於地緣政治、領土、地域觀念的影響，他拒絕僅把土耳其當作東方與西方之間的「橋梁」。他認為土耳其外交政策應該遵循五項原則：一、土耳其必須在「自由」以及「安全」之間加以平衡；二、和鄰國達成「零問題」互動；三、外交上採取「多面向」以及「多軌」；四、外交論述必須要具備靈活性；五、追尋「節奏式外交」(rhythmic diplomacy)，使土耳其能適應不斷變化的國際環境。(Faruk Yalvaç 2012, 167-168)

達武特奧盧在《戰略縱深》一書中提出四個概念：一、地理縱深 (Strategic Depth)：土耳其位於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其能夠連接通往歐洲、巴爾幹半島、俄羅斯、中亞以及中東的道路；二、歷史縱深 (Historical Depth)：土耳其和周邊的國家共享鄂圖曼帝國的歷史及記憶，土耳其作為帝國的繼承者須從戰略的角度，透過外交手段利用這樣的特點；三、地緣-文化影響力 (Geo-cultural

influence)：強調土耳其和「後鄂圖曼世界」(Post-Ottoman world)之間的文化聯繫；四、地緣-經濟影響力 (Geo-Economic influence)：強調土耳其作為歐亞大陸能源供應中樞的重要性，土耳其的出口外銷增長也讓該國的重要性大增，不管是歐洲還是俄羅斯同樣重要。(Yavuz, M. Hakan 2020, 184)

透過上述兩本著作，達武特奧盧重新調整土耳其在國際政治中的定位，在他的論述中，他特別強調土耳其和「後鄂圖曼」國家在歷史、文化及地理上的聯繫，透過這些關係，他希望土耳其能夠善用這些「優勢」，讓土耳其成為該地區不可或缺的力量。



第三章、土耳其外交政策中的身分認同

本章節主要討論土耳其外交政策與身分認同，內容共分為三節，第一節闡述鄂圖曼帝國的多元身分，以便理解土耳其外交政策中的身分認同是如何形塑的；第二節討論鄂圖曼帝國晚期國家認同的改變；第三節討論 20 世紀以後土耳其身分認同變化對外交政策的影響。

第一節、鄂圖曼帝國的多元身分認同

國家具有單一身分是受到 19 世紀以來西方國際體系和國際法的影響，但在此之前全世界存在著不同類型的政治體制，每種政治體制以不同的方式統治不同文化、宗教的族群，這些政治體制在互動時同樣會以多元的方式進行交流。本節將著重在鄂圖曼帝國的多元身分認同，以探討鄂圖曼帝國轉變為土耳其共和國的過程中，如何從多元身分轉變為單一身分。

並非只有主權國家才具有身分認同，前現代的國家同樣也會依靠特定的身分認同治理國家以及和他國交往。不同於現代國家具有單一身分和民族認同，土耳其的前身—鄂圖曼帝國是透過多元治理機制和差異政治的方式統治，帝國並非在單一族群的基礎上進行運作，而是按照軍事（Askeri）—被統治者

（Reaya）的階級區分管理不同族群。其中作為統治階級的 Askeri，其成員來自不同族裔，例如阿爾巴尼亞、塞爾維亞或希臘，而突厥人在當時多半屬於被統治者，當時的鄂圖曼帝國統治者並沒有將突厥人身分拉抬到官方身分的意識。

另一方面，鄂圖曼帝國同時以多種統治者的身分治理不同族群，對於阿拉伯及穆斯林，鄂圖曼君王強調「兩聖地守護者」、「信士的領袖」（amir al-mummin）或哈里發（Caliph）；鄂圖曼君主同時也採用波斯君王（Padishah）、蒙古可汗（Sutan Khan）管理突厥人；在 1453 年攻下君士坦丁堡後，鄂圖曼君主自認為羅馬帝國的繼承者，冠之以「羅馬人的凱薩」（Kayser-I Rum）以及兵馬大元帥（Imperator）等身分，種種頭銜反映鄂圖曼帝國多元的身分以及治理

的彈性。(柯嬌燕， 2016， 29-30)



第二節、鄂圖曼帝國晚期國家認同的形塑

在和歐洲國家的交往過程中，鄂圖曼帝國很長一段時間並未遵循歐洲國家的外交禮節，例如派遣長駐歐洲國家的外交官以及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但這並不意味著鄂圖曼帝國隔絕於歐洲之外，也不代表鄂圖曼帝國對歐洲事務一無所知。事實上，鄂圖曼帝國會透過授予外國人特許權（Capitulation）的方式，給予部分外國人在帝國領域內自由貿易，透過這樣的方式，鄂圖曼帝國一方面能夠管理和外國的外交關係，另一方面也能得知其他國家的發展狀況。（A. Nuri Yurdusev 2004，03-04）

到了17世紀下半葉，鄂圖曼帝國和歐洲強權之間的實力開始反轉。首先，鄂圖曼帝國在1683年對維也納的攻勢被阻止，並在1699年和奧地利帝國王朝簽訂《卡洛維茨條約》（Treaty of Karlowitz），條約明確規範鄂圖曼帝國和奧地利、匈牙利等地的疆界，這樣的措施讓鄂圖曼帝國和歐洲強權的邊界不再維持模糊地帶，而是透過法律確立國家主權行使的範圍。

緊接著，俄羅斯為了擴大黑海出海口，也對鄂圖曼帝國發動數次戰爭，並在1774年和鄂圖曼帝國簽訂《凱納甲湖條約》（Treaty of Küçük Kaynarca），迫使鄂圖曼帝國承認克里米亞汗國的獨立，同時也允許俄羅斯享有黑海航行權以及保護鄂圖曼帝國境內東正教徒的權益。（Hale, William M 2012，14-15）

法國大革命以及隨後的拿破崙戰爭更是徹底改變16世紀以來法國和鄂圖曼帝國結盟的態勢，促使鄂圖曼帝國在1793年首次派駐常駐外交官，法國也成為鄂圖曼第一個派駐外交官的國家，在國力衰弱的情況下，外交就成為捍衛國家利益的唯一手段，鄂圖曼帝國試圖按照歐洲的外交制度和他國進行談判、捍衛國家主權。

另一方面，拿破崙戰爭也將民族主義的觀念帶到東歐及巴爾幹地區，促成泛斯拉夫主義、大塞爾維亞主義以及大希臘主義等觀念的出現，曾經作為鄂圖曼帝國屬國或直轄的臣民，希臘、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地的知識份子希望能

夠建立獨立的主權國家、脫離鄂圖曼帝國的掌握。希臘先於 1820 年代發動獨立戰爭，在西方列強的干涉下，鄂圖曼帝國於 1832 年承認希臘獨立；羅馬尼亞、塞爾維亞和蒙特內哥羅在 1878 年《柏林條約》(Treaty of Berlin) 中獨立。

綜觀 19 世紀以來的國際趨勢，鄂圖曼帝國受到兩種因素的影響。第一個是國際法和主權國家體系，在歐洲國家體系之下，主權國家是被國際社會所承認的單一行為者，帝國不再能夠透過彈性以及多變的身分和他國交往，而單一的國家身分也意味著帝國必須面對多民族治理的難題，這樣的問題不只出現在鄂圖曼國，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也面臨類似的困境；第二個因素為民族主義以及分離主義，鄂圖曼帝國過去幾百年透過分而治之的統治策略治理不同族裔及社群，但在 19 世紀民族主義的影響下，不同民族紛紛從鄂圖曼帝國治下獨立出來，這個趨勢導致鄂圖曼帝國的菁英逐漸放棄以奧斯曼主義意識形態團結國民，並轉向強調土耳其民族主義。

1908 年鄂圖曼帝國發生革命，團結與進步委員會推翻蘇丹阿卜杜哈密德二世，並恢復 1878 年被阿卜杜哈密德二世廢除的憲法，這在近代土耳其史上被稱為「第二憲政時期」。CUP 執政後，並未推翻阿卜杜哈密德二世執政時的改革措施，他們仍然試圖強調鄂圖曼人的團結，同時強調伊斯蘭信仰的重要性。但 1912 年巴爾幹戰爭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打破信奉鄂圖曼主義的菁英最後的努力。

從 1908 年到 1912 年間，CUP 的執政菁英，包含主導政局的三巨頭傑馬勒 (Cemal Paşa)、塔拉特 (Talaat Pasha) 和恩維爾 (İsmail Enver Paşa) 帕夏，對於土耳其的定位以及是否在同盟國和協約國之間選邊站意見並不一致。原本土耳其公眾以及多數菁英並未打算選邊站，傾向於保持中立，僅有恩維爾帕夏支持和德國結盟，但這樣的態度因為英國將原定交付給鄂圖曼帝國的軍艦扣留而改變，恩維爾也和德國簽訂秘密協議，答應德國鄂圖曼會在德國和奧匈帝國開戰的時候提供幫助。這些因素最終使得鄂圖曼帝國在一戰的時候加入同盟國。

(Hale, William M , 26)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鄂圖曼帝國試圖以伊斯蘭世界的領袖為名義，宣布對協約國發動「聖戰」(Holy War)。為了反制鄂圖曼帝國，英國也和阿拉伯民族主義、哈希姆家族 (Hashemites) 聯繫，希望能夠策反阿拉伯人「起義」，在阿拉伯半島和敘利亞地區牽制鄂圖曼帝國軍隊，哈希姆家族領導人胡笙

(Hussein bin Ali) 也同意和英國人合作，換取他們戰後在中東地區的勢力範圍。最終鄂圖曼帝國訴諸伊斯蘭意識形態的效果有限，也讓鄂圖曼帝國作為伊斯蘭世界的領導者的形象不再，迫使鄂圖曼菁英尋求新的途徑。

1918年10月，鄂圖曼帝國戰敗，青年土耳其黨垮台，鄂圖曼帝國政府與協約國簽訂穆茲羅斯停戰協定 (Mudros)。根據協議，帝國部隊必須解除武裝、達達尼爾海峽以及博斯普魯斯海峽全面開放以及允許協約國軍隊佔領部分鄂圖曼帝國的要地。(Hale, William M, 28) 緊接著協約國又和鄂圖曼帝國政府於1920年簽訂〈色弗爾條約〉(Treaty of Sèvres)，條約規定鄂圖曼帝國必須裁軍、安納托利亞部分地區割讓給希臘。條約引起鄂圖曼帝國政治菁英以及蘇丹政府間的分歧，對於蘇丹政府來說，當下最要緊的任務是要維持政府的運作；對於知識份子和民族主義者來說，條約為喪權辱國，一旦落實則土耳其的主權不再完整。(Erik J. Zürcher 2004, 147)

為了避免領土遭到瓜分，部分 CUP 的政治菁英成立諸多「權利保護協會」(Defence of Rights) 團體，在凱末爾 (Mustafa Kemal) 等菁英的領導下，這些團體在1919年9月合併成「安納托利亞及魯姆利亞權利保護協會 (Association for the Defence of the Rights of Anatolia and Rumelia)」，並在1920年在安卡拉召開大國民議會 (Grand National Assembly)，緊接著還要面對協約國軍隊的進逼。(Ahmad Feroz 2003, 49-50)

儘管如此，協約國對於瓜分土耳其的計畫和利益並不一致，同時土耳其東部、高加索地區也出現權力真空，這給予凱末爾能夠操作外交的餘地。為了擺脫戰後孤立無援的地位，務實的外交手段比伊斯蘭主義以及泛突厥主義更為管用。凱末爾首先向同樣被國際孤立的蘇聯尋求支持，同意蘇聯在高加索地區以

及亞塞拜然進行擴張以換取蘇聯的軍援；接著，為了確保邊界穩定，土耳其對亞美尼亞發動戰事，並和亞美尼亞簽訂〈亞歷山德羅爾條約〉(treaty of Alexandropol)，明定兩國邊界。最初蘇聯並不承認條約，一度試圖資助土耳其境內的親共勢力已擴大共產主義的勢力範圍，但隨著凱末爾政府擊退希臘軍隊以及擊敗社會主義的反對派，蘇聯也認知到和凱末爾政府的合作對他們更為有利，於是雙方在1921年3月16日在莫斯科簽訂友誼條約，確保彼此尊重對方的主權。

(Hale, William M, 35-37)

除此之外，凱末爾政府也利用列強利益不一致這點，透過秘密協議說服法國和義大利撤軍，將作戰對象僅限於希臘，隨著土耳其擊潰希臘軍隊的攻勢，凱末爾政府也在1922年10月和希臘、英國、法國及義大利簽訂停戰協議，最終於1923年7月24日簽訂《洛桑條約》(Treaty of Lausanne)，確保土耳其主權與領土完整。(Hale, William M, 36-38)

從鄂圖曼帝國晚期到土耳其共和國建國初期，土耳其經歷國內民族主義、列強對於土耳其戰略要地的覬覦以及帝國擴張，這些因素迫使土耳其從帝國轉型為現代民族國家，跟法國、英國等歐洲國家相比，土耳其國家轉型的過程是由上而下且由軍人菁英主導才完成的，這樣的過程導致土耳其建國初期是充滿威權主義的色彩，因為如果不這樣做，國家的存亡就會受到威脅。

另一方面，土耳其的戰略位置導致該國成為鄰國以及列強擴張的對象，憑藉著土耳其一國的國力難以應對多面向的衝突（這些衝突來自希臘、亞美尼亞、高加索以及阿拉伯半島等地），因此，唯有善用外交途徑、權衡列強的利益並根據情勢改變外交政策才能確保土耳其的安全及生存，以建構主義的角度來看，此時期的土耳其和鄰國之間缺乏相互認同的觀念及規範，受到歷史經驗及世界大戰的影響，這些國家視彼此為威脅到自身安全的敵人。然而，因為土耳其受到戰爭波及，戰後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與資源重建家園，這些因素促使土耳其在戰間期採取孤立以及避戰的外交方針。

第三節、戰間期到冷戰時期土耳其外交政策及認同

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土耳其在戰間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採取孤立主義的外交政策，一方面土耳其的國力不足以在同盟國以及軸心國之間選邊站，另一方面，土耳其也需要重建國家已恢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受到破壞的經濟與社會。

土耳其建國後，凱末爾政府的首要外交政策是解決邊界主權歸屬問題，尤其是摩蘇爾（Mosul）的主權歸屬，對於土耳其來說，一方面該國曾經在《國民公約》（National Pact）中強調該地是土耳其主權的一部份；另一方面，維持對摩蘇爾的控制也有助於土耳其處理庫德族問題，但對於英國來說，摩蘇爾是畫分英國和法國在中東勢力範圍的關鍵地帶，英國也希望能夠拉攏阿拉伯人哈希姆家族的支持，因此兩方對於摩蘇爾的爭執居高不下。最終在國際聯盟的介入以及調查之下，土耳其於1926年同意摩蘇爾主權歸屬於英國，作為交換，土耳其也得到每年10%的原油收入，為期25年。（Hale, William M , 42-43）

除此之外，如何解決與希臘的爭端也是戰後土耳其的一大挑戰。在長達數百年的鄂圖曼帝國統治當中，已有不少希臘人在安那托利亞定居，同時也有許多土耳其人或穆斯林在希臘定居，隨著希臘獨立以及民族主義崛起，不論是希臘人還是土耳其人，都希望建立一個民族統一的國家。

為了解決雙方移民的問題，土耳其與希臘根據《洛桑條約》進行人口交換，同時也就雙方移民所產生的產權糾紛以及君士坦丁堡牧首區（Ecumenical Patriarch Constantine）的人事任命進行協商。希臘總理韋尼澤洛斯（Eleutherios Venizelos）曾表明相信土耳其不會因為雙方的爭端動武，這樣的舉動得到土耳其諒解，兩國也就人口交換達成協議，並為後來的爭端解決建立互信基礎。（Hale, William M , 43）

土耳其在達成和希臘的諒解後，希望能藉此和西方國家建立平等以及合作的關係，除了土耳其正在推行親西方的改革之外，改善和西方的關係也有助於

促進土耳其經濟發展、國家安全的穩定。但在當時，土耳其和西方關係的最大問題有兩點，第一點是土耳其並不信任英法所主導的國際聯盟，這是因為土耳其在摩蘇爾的爭端中尋求國際聯盟的仲裁，但卻認為該國沒有得到理想的結果；另一個原因在於土耳其和蘇聯的關係，兩國在 1925 年簽訂《土耳其—蘇聯友好及中立條約》(Soviet-Turkish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Neutrality)，條約明訂雙方不得在未經彼此同意的情況下逕自向第三方做出承諾。(Hale, William M, 44)

1920 年代義大利法西斯主義崛起，對於土耳其構成新的地緣政治威脅。起初土耳其和義大利在 1928 年簽訂友好條約，又在 1930 年和希臘簽訂同樣的協議。但在 1933 年以後，義大利對於巴爾幹半島的野心也浮上檯面，對於土耳其來說，達達尼爾海峽、博斯普魯斯海峽以及巴爾幹南部的地緣政治牽涉到土耳其未來的命運，因此土耳其先和希臘達成諒解，彼此保證邊界的安全，接著和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各自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到了 1934 年，土耳其、希臘、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簽訂《巴爾幹公約》(Balkan Pact)，根據條約，任一成員國如果遭到他國入侵，其他國會保證當事國的領土完整。(Hale, William M, 46)

儘管如此，由於巴爾幹地區情勢複雜，各國對於安全及威脅的認知也不一樣，這導致《巴爾幹公約》並未能阻止義大利和納粹德國的擴張。對於土耳其而言，只能另尋其他方法以確保土耳其不會被牽涉進大國之間的衝突。對於當時的土耳其來說，他們要先解決三個目標：一、說服西方國家以撤銷《洛桑條約》中要求土耳其對色雷斯、達達尼爾海峽去軍事化的條款，使土耳其能在這兩地增加防衛能力；二、強化國防實力；三、和英、法建立防衛聯盟的同時也和蘇聯維持一定程度的聯繫。(Hale, William M, 47)

為了捍衛在博斯普魯斯海峽、達達尼爾海峽的防衛能力，土耳其於 1936 年呼籲國際聯盟以及《洛桑條約》簽約國討論如何修訂海峽公約的議題，利用英國和蘇聯等國對於軍艦是否能夠通過海峽這一點，土耳其成功說服其他國家滿

足該國對於海峽的權利，並於同年 7 月 20 日簽訂《蒙特勒海峽制度公約》

(Montreux Convention Regarding the Regime of the Straits)，其中土耳其能夠在戰時保持中立時，宣布對軍艦關閉海峽的權利，除此之外，所有的商船在行駛海峽時也具有自由航行權，不論是戰時還是和平狀態。此規範保障土耳其在地中海以及黑海之間享有的權利。(Hale, William M , 48)

從 1923 年到 1938 年，土耳其採取重經濟、輕國防的內政，優先發展國家經濟和工業，先是支持私人企業發展，1929 年經濟大恐慌爆發後土耳其改以國家主義政策主導經濟發展，透過兩次五年計畫帶動農、工業的發展。(哈全安 2010, 52-53) 因此，在這段期間，土耳其投入國防的資源較少。隨著國際局勢大變，土耳其於 1938 年增加國防預算，從原本的 23% 來到 44%，儘管如此，在當時土耳其軍隊的裝備及編制仍不足以應付大規模的戰事。(Hale, William M , 48-49)

在尋求結盟方面，土耳其當時打算和蘇聯合作以防止巴爾幹地區遭到軸心國的入侵，同時在地中海和英法結成防禦聯盟以保衛東地中海的主權，但這樣的盤算並不順利，因為英、法並未認真看待土耳其的提案，但在希特勒吞併捷克斯洛伐克以及義大利入侵衣索比亞後，英國了解到，如有必要的話必須透過戰爭阻止軸心國的擴張，因此英國於 1939 年 4 月向土耳其重提互助條約，並在 5 月 12 日順利簽定，同時土耳其也解決和法國之間的領土爭端，使得英土之間的互助協議得以落實。(Hale, William M , 50-51)

土耳其也希望和蘇聯簽訂保障黑海安全的協議，但蘇聯在 1939 年和納粹德國簽訂《德蘇互不侵犯條約》(Molotov-Ribbentrop Pact) 以便對波蘭瓜分，這引發土耳其方的不滿，打亂原本希望靠蘇聯制衡德國的計畫。計畫破滅後，土耳其轉而和英法協商，最終於 1940 年簽訂三方協議，自此土耳其的安全獲得英法的保障，同時在經濟上也得到英法的補助和貸款。(Hale, William M , 51-53)

從戰間期到二戰爆發以前，土耳其外交處境是相當艱困的，一來土耳其作

為一戰的戰敗國，國土面臨周邊國家的覬覦，因此該國必須放下成見，先和蘇聯建立密切的關係以求穩定。土耳其也知道，蘇聯對於土耳其的幫助並非沒有代價，高加索地區、兩海峽也是蘇聯想要擴張的地帶，加上義大利崛起、納粹德國試圖往東歐擴張，讓土耳其認為，必須取得其他強權的幫助才能避免讓土耳其再度捲入世界大戰。

從建構主義的角度來看，此時期的土耳其雖然以西方的政治體制、社會經濟模式對國家進行改造，但在外交上，由於周邊國家都和土耳其有糾紛，加上一旦土耳其選邊站，該國就會成為另一邊的目標，土耳其仍以現實主義為主要手段，利用強權之間的權力平衡爭取緩衝地帶以及有利於土耳其安全的中立地位。

二戰結束以後，國際局勢大幅改變，受到幾個因素影響，土耳其不再能夠在強權之間遊走，必須選邊站：一、戰後全球進入兩極體系，兩邊分別是以美國為主的民主陣營以及以蘇聯為主的共產陣營，中東歐戰後也被蘇聯掌控，巴爾幹半島諸國也被南斯拉夫所統治，對當時的土耳其構成地緣政治威脅；二、戰後美國崛起，取代英法成為全球具有份量的西方國家，不僅在經濟上是全球龍頭，政治上也主導戰後聯合國以及國際秩序的運作。

在地緣政治方面，蘇聯在二戰末期就向土耳其要求要修訂《蒙特勒海峽制度公約》，希望能夠開放讓蘇聯軍艦自由航行兩海峽，同時也希望讓蘇聯在海峽周遭建立軍事基地並讓土耳其交還東部兩省的領土。(Hale, William M, 80) 史達林也在 1945 年波茨坦會議 (Potsdam Conference) 中重申蘇聯對兩海峽的需求，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則是主張要將兩海峽交由國際共管，當時杜魯門的提案一旦付諸實現，將會讓兩海峽回到 1923 年到 1936 年間的狀態，讓土耳其失去海上的屏障，惟與會各國並未達成共識，提案不了了之。但蘇聯的態度也讓土耳其不得不改變立場。

美國的態度改變是讓土耳其選邊站的一個關鍵因素。1947 年美國駐蘇聯代辦喬治·坎南 (George Frost Kennan) 發起長電報，在數千字的長文裡他陳述史

達林政權的性質、權力，藉此警告美國蘇聯的地緣戰略以及外交政策。之後美國根據坎南的建議規劃對蘇聯的長期方針，被稱作「圍堵政策

(Containment)。圍堵政策打破美國不介入美洲以外事務的傳統，同時杜魯門強調，美國必須為全球各地的自由人提供保護，並說服國會向土耳其以及飽受內戰影響的希臘提供 4 億美元援助，這被稱為「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張國城 2020, 117-118)

1948 年土耳其加入美國所提出的「馬歇爾計畫」(The Marshall Plan)，也成為歐洲經濟合作組織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以下簡稱 OEEC) 的成員國。從 1948 年到 1950 年為止，土耳其透過歐洲復興計畫 (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me) 得到 1.83 億美元的經濟援助及 2 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儘管當時土耳其期望能得到更多援助，但美國的幫助也增進土耳其和美國的雙邊關係。(Hale, William M, 83-84)

為防衛蘇聯的恫嚇威脅，美國和西歐、南歐諸國在 1949 年簽署《北大西洋公約》(North Atlantic Treaty)，正式成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但土耳其和希臘最初並未受邀加入北約這個集體安全組織。土耳其在當時的美國及英國看來，仍屬於中東國家而非歐洲國家的一部份，加上美國年度預算有限，因此美國最初將防衛重心聚焦在西歐，以避免柏林危機再度重演。(Hale, William M, 84-85)

韓戰的爆發讓局勢再次改變，為因應戰爭，美國大幅增加國防預算，也被破調整全球戰略，這給予土耳其和希臘一個契機。土耳其同年舉行選舉，民主黨擊敗共和人民黨，為土耳其建國後第一次政黨輪替。為表示和西方陣營站在一起，土耳其宣布派遣 5000 多名軍人參加韓戰，之後幾個禮拜更是增兵以支援盟軍作戰。土耳其同時也向北約遞出申請函，希望能夠通過申請，起初北約僅將土耳其和希臘視為夥伴國，仍不願核准入會申請。但當時作為北約歐洲盟軍司令 (Allied Command Europe) 的艾森豪將軍 (Dwight David Eisenhower) 認為，歐洲和蘇聯的疆界廣袤，一旦蘇聯打算入侵歐洲，土耳其以及南斯拉夫將會是

攻擊的重心，因此當務之急是將土耳其和希臘納入美國的戰略規劃中，杜魯門總統也同意這個看法，最終在 1951 年同意讓土耳其和希臘加入北約。(Hale, William M, 86-87) 當時英國以及歐洲部分國家對土耳其仍有疑慮，擔心土耳其會利用北約成員國的身分讓北約涉入中東紛爭，但隨後英國因新內閣上台而改變態度、支持土耳其，美國也力排眾議，說服其他國家讓希臘、土耳其加入北約，最終在 1952 年 2 月定案。

土耳其加入北約一事具有兩種意義：首先，土耳其成功說服西方國家該國在地緣政治上對西方國家以及美國具有極大的重要性，利用韓戰的契機先向西方釋出善意，表示願意出兵以換取西方國家核准讓土耳其入北約；其次，蘇聯對於黑海自由航行權、軍事訴求以及土耳其東部領土的意圖也讓土耳其改變一戰以來親蘇的立場，轉而採取傾向西方的外交政策，即便之後蘇聯試圖釋出善意，本質上也沒辦法改變蘇聯在地緣政治上對土耳其的威脅，這樣的影響延續至今。

儘管土耳其採取親西方的外交政策，但這並不表示土耳其在所有議題上都支持親西方的外交政策。在 1950 到 1960 年代，土耳其涉入三個區域衝突，而這兩個衝突也影響土耳其和西方及周邊國家的關係，其一為中東議題，其二為賽普勒斯問題，其三為古巴危機。

在中東的部分，土耳其有兩個想要達成的目標，其一為建立一個區域性安全組織，除了能夠補足土耳其在中東的國防安全，也希望能夠增加土耳其在中東國家之間的影响力；其二為建立和以色列的外交關係並促進雙方的經濟及社會合作。

土耳其的戰略思維和美國的想法較為接近，美國試圖藉由土耳其以及巴勒維王朝治下的伊朗來圍堵蘇聯的擴張。美國首先和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等國簽訂共同防禦條約，伊拉克和土耳其在 1955 年 2 月 24 日簽訂《巴格達公約》(Baghdad Pact)，巴基斯坦、伊朗各自在 9 月、10 月宣布加入公約，組成「巴格達公約組織」(Baghdad Pact Organization)，強調成員國在軍事、經濟

等議題的合作，美國則以觀察員的身分列席部長會議。(Hale, William M , 91-92)

儘管如此，諸多因素導致巴格達公約組織的運作不如預期。首先，土耳其加入巴格達公約組織引發阿拉伯國家的不滿，當時阿拉伯國家盛行阿拉伯民族主義，他們強調要團結所有阿拉伯人，對抗西方強權以及以色列錫安主義，因此，對於伊拉克、土耳其和西方國家合作，他們感到不滿。埃及甚至批評伊拉克總理賽義德 (Nuri al-Said) 背叛阿拉伯人。

其次，英國連同法國、以色列對埃及發動攻擊，造成「蘇伊士運河危機」(Suez Crisis)，不僅美國不願支持英、法和以色列的立場，巴格達公約組織成員國土耳其、伊朗也譴責英法入侵埃及並要求以色列從埃及撤軍，造成英國在中東的影響力降低。最後，1958年伊拉克發生政變，軍官卡希姆 (Abd al-Karim Qasim) 領導的自由軍官團推翻國王費薩二世 (Faisal II) 政權，建立伊拉克共和國，並退出巴格達公約組織。隔年，其餘成員國將巴格達公約組織遷移到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並改組為中部公約組織 (Central Treaty Organization)，直到1979年伊朗發生革命才宣布解散。(Hale, William M , 92-93)

在土以關係方面，以色列在1948年5月14日宣布建國，並和巴勒斯坦以及周邊的阿拉伯國家爆發武裝衝突。儘管土耳其支持聯合國通過的以巴分治方案，土耳其仍在1949年承認以色列並和以色列建立外交關係，兩國建交也讓土耳其境內6.2萬名猶太人移民到以色列，同時也帶動兩國之間的經貿往來。

(Hale, William M , 92)

雖然土耳其在1950年到1990年代傾向於西方陣營，但賽普勒斯問題以及和希臘的糾紛卻是土耳其和西方國家之間難以解決的問題。從歷史上來看，鄂圖曼帝國在1570年占領賽普勒斯島，展開為期約300年的統治，直到19世紀初，隨著希臘獨立運動的開展，賽普勒斯島上的希臘裔族群希望和希臘統一為同一國，但因為在鄂圖曼帝國的統治之下島上也存在土耳其及穆斯林，他們不

見得會想和希臘人同屬一國，對於賽普勒斯的歸屬也沒辦法達成一致的意見。

1878 年鄂圖曼帝國和英國達成協議，將賽普勒斯割讓給英國，自此之後英國展開將近一世紀的統治。二戰結束以後，全球正處於去殖民化浪潮，希臘裔賽普勒斯人也希望尋求和希臘統一，導致希臘裔和土耳其裔賽普勒斯人爆發嚴重衝突，迫使英國和希臘、土耳其進行協商。起初土耳其傾向於承認英國對賽普勒斯的統治權，強調如果英國結束對賽普勒斯的統治，那該島的主權應當回歸土耳其治下。到了 1956 年，在考慮到民族問題以及西土之間的戰略地位，土耳其改變態度，反而主張賽普勒斯島上的希臘裔和土耳其裔應該尋求分治。

(Hale, William M, 92) 在英國的協調下，各方於 1960 年達成協議，同意建立以賽普勒斯憲法為基礎的賽普勒斯共和國 (Republic of Cyprus)。

儘管如此，仍有希臘裔賽普勒斯人對此不滿，他們仍懷有大一統 (enosis) 的理念，渴望建立一個大希臘國家。1963 年，賽普勒斯總統馬卡里奧斯三世 (Makarios III) 提出 13 點修憲計畫，希望能夠取消土裔賽普勒斯人的權利，引爆兩方激烈衝突。當時英國提議要動員北約部隊以防止事態惡化，但遭到賽普勒斯拒絕，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案，打算派遣維和部隊，但遠水不如近火，因此土耳其決定要派遣部隊介入賽普勒斯事務，但此舉卻遭到時任美國總統詹森 (Lyndon Johnson) 來函警告，如果土耳其動兵，則北約成員國不會在土耳其遭蘇聯攻擊時考慮援助該國，這被稱為「詹森信函」(Johnson Letter)。(Hale, William M, 106-107)

雖然土耳其當時並未出兵，但美國的警告也引起土耳其的不滿，認為美國過度偏袒希臘，這樣的結果除了在國內引起反美浪潮，土耳其政府也考慮重新調整和蘇聯的敵對關係。1965 年蘇聯中央政治局委員波德戈爾內 (Nikolai Podgorny) 率領代表團訪問土耳其，並在接下來幾年提供土耳其經濟援助以協助土耳其工業發展。1967 年希臘軍事政變更讓蘇聯和土耳其在賽普勒斯問題的立場較為接近。儘管土耳其在國防、安全上仍和北約、美國站在一起，但賽普勒斯問題也讓土耳其思考不能過度依賴西方國家，與蘇聯的對立也並非一直不

變的，土耳其必須要懂得變通才能捍衛主權及國家安全。(Hale, William M , 108)

另一個影響土美關係的事件是古巴飛彈危機。1959年土耳其政府同意美國在該國境內部署15枚朱庇特(Jupiter)中程彈道飛彈，這些彈道飛彈載有核彈頭，並於1961年部署在土耳其西北部城市伊茲密爾。這些飛彈理論上為土耳其所有，但實際上由美國控管，且運作要得到美國的同意。美國在土耳其部署核彈頭的行為引發蘇聯不滿，蘇聯同樣也在古巴部署核彈頭以示報復。為了避免情勢惡化，蘇聯總書記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向美國表示，如果美國願意撤出部署在土耳其的核彈頭，蘇聯也願意撤回在古巴的核武。美國接受古巴的提案並忽略要撤回朱庇特飛彈的要求，但這並非美國忽略蘇聯的提案，而是為了顧及土耳其的觀點而選擇私底下撤回朱庇特飛彈。(Hale, William M , 99-100)

美國和蘇聯私底下對朱庇特飛彈談判的行為對土耳其而言會讓他們有被當作棋子的感覺，這也影響土耳其人對美國的觀感，但撤出飛彈一事對土耳其來說也未必是件壞事，因為美蘇一旦互相在邊界部署核彈，土耳其反而會成為蘇聯核打擊的首要目標，這也反映在土耳其政府並未對此事過度高調。相較之下，賽普勒斯問題對美土關係的影響程度還比較大。(Hale, William M , 100)

第四章、後冷戰時期土耳其外交政策與新奧斯曼主義

從 1980 年代起，土耳其所處的國際環境面臨兩大挑戰，其一是伊朗伊斯蘭革命，伊朗革命推翻過去在外交上親美以及和土耳其友好的巴勒維政權，革命衝擊美國戰略的同時也影響土耳其的安全和戰略規劃；其二為蘇聯入侵阿富汗，蘇聯對阿富汗的用兵更讓土耳其認為必須和北約站在一起才能保障土耳其自身的安全。除了以上所提的兩個國際事件，全球伊斯蘭復興運動、以巴衝突更是讓中東充滿引爆點，對土耳其來說，除了依靠西方提供安全保障以外，土耳其也要利用這段契機建構新的外交途徑，一方面擴大土耳其國家利益，另一方面降低土耳其過度依賴西方的風險。

本章節主要分成幾個部分：第一節討論厄札爾總理執政後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變化，包含更加強調伊斯蘭以及過去鄂圖曼帝國時期的歷史；第二節討論厄札爾的外交政策理念以及新奧斯曼主義；第三節討論厄札爾時期土耳其的中亞外交政策；第四節討論 1990 年代土耳其和俄羅斯的外交關係；第五節則討論厄札爾時期新奧斯主義外交政策在中東的落實。

第一節、1980 年代以後土耳其外交政策

1980 年代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轉變可以從兩個層面來解釋：國內及國際因素。從國內因素來說，1980 年代土耳其政治受到軍方政變以及伊斯蘭政黨崛起的因素，反映土耳其國內對於建國以來凱末爾主義意識形態的反思；從國際因素來看，中東政局變動以及蘇聯、東歐局勢變化也未土耳其帶來新的機會。

1923 年土耳其建國後，凱末爾領導的政府展開六項改革，這被稱為「阿塔圖克主義」，這些措施也被稱為凱末爾主義六支箭，包含：共和主義 (Republicanism)、民族主義 (Nationalism)、平民主義 (Populism)、國家主義 (Etatism)、世俗主義 (Secularism) 和改革主義 (Reformation)。這六隻箭對內壓制伊斯蘭信仰、同時強化國家主導社會經濟的角色，對外則樹立以土耳其民

族為主體的現代民族國家，並接受國際法和主權國家體系，透過外交途徑和談判解決國家之間的爭端。(哈全安 2010，23)

從 1923 年到 1947 年，伊斯蘭政黨持續被國家打壓，直到 1948 年才有伊斯蘭政黨的出現，當時民主黨的部分黨員反對凱末爾主義底下的世俗化政策，他們認為政府應該要尊重民眾的信仰自由，因而組成民族黨 (National Party)，但因為其政治立場和共和人民黨甚至民主黨不合，最終在 1953 年被強制解散。

(朱傳忠 2018，26-27)

1960 年土耳其軍方發動政變，推翻當時執政的民主黨政府，並於 1962 年通過新憲法，開放土耳其多黨參與的機制，同時也限制內閣制體制底下國會具有的權力，開啟土耳其政治史上的多黨制。在這段期間土耳其連續幾屆選舉都沒有政黨能過半，因此必須要組成聯合政府，其中正義黨為主要的執政黨。到了 1970 年，正義黨中部分支持宗教自由的人士脫黨成立新政黨，名為民族秩序黨 (National Order Party)，由當時總理德米雷爾 (Suleyman Demirel) 好友埃爾巴坎 (Necmettin Erbakan) 所領導，但好景不常，隨著 1971 年土耳其軍方再度發動政變，民族秩序黨被迫解散，埃爾巴坎只得在 1973 年成立救國黨

(National Salvation Party)，堅持信仰自由並反對加入歐洲共同體，認為土耳其會被歐洲給同化。(朱傳忠 2018，28-31)

土耳其在 1960 到 1980 年間陷入國內政治對立、經濟上惡性通膨，導致軍方於 1980 年再度發動政變，宣布接管政府並取締救國黨等政黨。1983 年土耳其軍方宣布開放組建政黨，部分救國黨成員在救國黨的基礎上成立繁榮黨

(Welfare Party)，繁榮黨主張伊斯蘭才是團結土耳其的重要元素，他們反對西方帝國主義、反對和歐洲進行整合，儘管繁榮黨在當時並非土耳其主流政黨，但訴求也影響其他政黨的政綱。(朱傳忠 2018，34-38)

1983 年土耳其舉行大選，厄札爾領導的祖國黨 (Motherland Party) 擊敗軍方所支持、由蘇納勒普 (Turgut Sunalp) 所領導的國家民主黨，使土耳其的文官政治逐漸穩固。厄札爾上任之後，土耳其受到美國雷根以及英國柴契爾政府

的影響，也採取經濟自由化的政策，他認為共產主義式計畫經濟或著國家主導的福利國政策都沒有辦法讓國家在經濟上快速發展，因此，唯有採取自由化的政策才能讓土耳其擺脫過去僵化的經濟政策。(Hale, William M , 119-120)

土耳其和西方國家的關係也有所改善，過去土耳其因為賽普勒斯出兵的問題遭到美國實施武器禁運和制裁。到了 1979 年，伊朗發生革命，導致親美的巴勒維政權被推翻，對於美國而言，要穩固在中東戰略就只能加強和土耳其、以色列的合作，因此美國在 1980 年和土耳其簽訂《國防經濟合作協定》

(DECA)，除了讓美國能夠使用土耳其境內 12 個軍事基地、13 處情報機構，美國也同意增加對土耳其經濟及軍事援助，1984 年美國提供土耳其 7.15 億美元軍事援助，到了 1988 年，隨著冷戰降溫，美國才減少提供土耳其的軍事援助至 5.26 億美元。(Hale, William M , 120)

除此之外，協定最重要的一部份是允許土耳其和美國通用動力國防承包商 (General Dynamics) 合作，在土耳其境內生產 F-16 戰鬥機，這讓土耳其具備一定程度的國防自主性，也為後來土耳其改善空軍奠定技術基礎。(Hale, William M , 120)

另一個讓土耳其傾向西方陣營的因素是蘇聯入侵阿富汗。土耳其本身並未協助阿富汗反抗軍對抗蘇聯，但是阿富汗戰爭帶來的難民潮也讓土耳其面臨接納難民的額外開支以及負擔。此外，黎巴嫩內戰以及蘇聯和敘利亞的軍事合作都讓土耳其感到安全受到威脅。但隨著戈巴契夫上台，對蘇聯放寬管制並展開改革，土耳其、西方和蘇聯的關係才開始放緩，在這段期間，土耳其和蘇聯的雙邊貿易也開始增長，從 1987 年的 4.76 億美元來到 1990 年的 18 億美元，蘇聯也修建一條經由白羅斯通往土耳其的天然氣管線，這讓後冷戰時期土耳其和蘇聯或俄羅斯的關係沒有冷戰時那麼對立。(Hale, William M , 121-122)

土耳其和歐洲關係的改善也是這段時期重要的發展，由於歐洲共同體重視自由、民主價值，頻繁出現政變的土耳其如要加入歐洲的整合，勢必要對國內的軍文關係進行調整，才能符合歐洲各國的規範。1981 年土耳其和歐洲理事會

簽訂一份援助土耳其經濟的協議，但前提是土耳其必須要落實民主化改革。隨著 1983 年厄札爾的上台，土耳其也落實經濟自由化的政策，去除關稅壁壘並於 1987 年遞交加入歐洲共同體的申請書。只是當時歐洲以土耳其的經濟發展程度和歐洲國家有落差以及土耳其和希臘的問題為由暫緩談判。(Hale, William M, 130-131)

到了 1990 年，隨著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土耳其頓時失去最大的威脅來源，這不僅意味著中東歐、高加索地區以及中亞出現權力真空，同時也代表土耳其作為北約成員國的角色的重要性也開始降低，讓土耳其在地緣政治上的重要性開始下滑，因此，土耳其必須另闢新路，加強和周邊國家的關係以建立土耳其的新身分，並透過新的身分與認同確立土耳其的新戰略和外交政策。

第二節、厄札爾的外交政策理念與新奧斯曼主義

厄札爾 1927 年出生於土耳其東部馬拉蒂亞省 (Malatya)，與過去幾任政府首腦不同，厄札爾的出身較為平凡，他是當地一農戶之子，也是庫德族裔。由於他生長的環境對伊斯蘭信仰較為虔誠，耳濡目染之下他也對伊斯蘭信仰抱持較同情的態度。(Mufti, M, 2009 58)

1950 年厄札爾從伊斯坦堡科技大學畢業，畢業後他先在民主黨任職，接著在國家水利局 (State Water Administration) 工作。隨著德米雷爾在 1960 年代中期擔任總理，厄札爾也被提拔為技術顧問以及國家計劃局 (State Planning Organization) 總監。1971 年土耳其發生政變，厄札爾被迫逃到美國，並在世界銀行工作三年，回國後於 1979 年在德米雷爾政府負責管理當時土耳其的經濟政策。(Mufti, M, 2009 58)

1983 年厄札爾組建祖國黨並在大選中勝出，執政後展開經濟自由化的政策，從 1983 到 1991 年間，土耳其年均經濟成長率為 5.2%，GDP 也從 1983 年 2 億 500 萬美元增長到 3 億 800 萬元，這段期間經濟成長快速，對內也試圖降低軍方干涉政治的程度，讓文官政治趨於穩定。(Kösebalaban, 2011 119)

根據厄札爾的設想，為了要在後冷戰時期融入全球化、自由化國際體系，土耳其必須建構一個遵循自由價值的國家認同及身分，這類的認同包含三個層面的自由：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和經商自由，他認為這三層面的自由有助於土耳其解決和伊斯蘭保守派的衝突以及和庫德族之間的政治對立。為了擴大宗教自由，他也以身作則，除了經常參加星期五的伊斯蘭主麻日，他也前往參加朝聖。這些動作也讓當時相信凱末爾主義的土耳其政治菁英、官僚認為他是伊斯蘭主義者，但實際上厄札爾時期的政策更多是相信西方價值以及自由主義精神，這也為新奧斯曼主義外交政策提供基礎。(Kösebalaban, 2011 119-120)

亞伍茲 (2020) 指出，厄札爾在美國工作的期間了解到美國的強大，他認為美國之所以能夠成為全球的霸權，就是因為該國採取自由主義的政治體制。他將鄂圖曼土耳其和美國比較，認為兩者具有類似的特徵，同樣包容不同文化的群體，允許不同群體享有宗教自由。為了要讓土耳其發揚光大，土耳其首先該減少建國以來所依賴的凱末爾主義意識形態，因為該意識形態強調國家以威權的手段干涉人民的生活以及政治運作，威脅到人民的自由，進而不利國家的成長茁壯。

厄札爾對伊斯蘭以及鄂圖曼帝國的觀點受到蘇菲主義學者科特庫 (Sheikh Kotku) 的影響，他是當時土耳其國內著名的大師，上述所提到的救國黨領黨人埃爾巴坎，他的理念也受到科特庫的影響。厄札爾之所以會踏入政壇，就是因為受到科特庫和埃爾巴坎的影響。另一方面，土耳其前教育部長、當時擔任厄札爾顧問的居澤爾 (Hasan Celal Güzel) 表示：

在世俗主義的共和國體制下，鄂圖曼遺產以及伊斯蘭的角色被予以否定，這導致厄札爾並沒有歸屬感。對鄂圖曼帝國的懷舊 (hasret) 是界定國內保守派穆斯林知識份子、政治家的重要特徵，包含三個原因：他們所希望的是土耳其 (版本) 伊斯蘭，且他們認為伊斯蘭只有在鄂圖曼帝國黃金時代 (這裡指的是西元 1299 到 1683 年) 才能被最佳的

理解以及實踐，換言之，了解鄂圖曼的遺產才能理解當代土耳其的伊斯蘭；第二、厄札爾及部分土耳其知識份子希望參與歐洲機制，他們認為鄂圖曼帝國是促進土耳其和歐洲關係的重要因素，事實上，鄂圖曼帝國就是在東南歐成長茁壯；最後，對於安納托利亞民眾以及知識份子來說，黃金時代以及偉大的模式一直都是鄂圖曼帝國的一部份。

(Yavuz 2020, 108)

居澤爾的說法可以總結為幾點：一、厄札爾認為鄂圖曼帝國的歷史、尤其是國力強盛的時期，是建構當代土耳其認同的重要因素；二、厄札爾認為土耳其化的伊斯蘭是讓土耳其不同於其他伊斯蘭國家的重要因素，居澤爾並未提及怎樣才是土耳其化的伊斯蘭，但根據土耳其政治體制以及厄札爾所推行的政策推斷，此處指的應該是採取共和、民主選舉的政治體制；三、厄札爾特別強調鄂圖曼帝國和歐洲的關聯，透過追溯鄂圖曼帝國在巴爾幹地區發跡的歷史，他想強調土耳其也是構成歐洲整體的一份子，不應該被歐洲排除在外。

隨著經濟自由化，土耳其國內的政治和社會風氣也比以前還要寬鬆，這也帶動國內民眾開始挑戰傳統凱末爾主義避而不談的議題，也就是鄂圖曼帝國史。對於傳統凱末爾主義者來說，鄂圖曼帝國的腐敗及無能才會讓土耳其民族陷於危險的處境，而伊斯蘭信仰則限制了改革及創新，應該要被限縮在私領域。但從 1980 年代起，民眾以及知識份子開始在公開場合討論和鄂圖曼帝國有關的歷史，隨著葛蘭運動（Gülen）的推廣，對鄂圖曼帝國的重新思考不僅重新建構土耳其人的自我認同，同時也推動土耳其在中亞、中東等伊斯蘭地區的外交政策。(Yavuz 2020, 109)

亞伍茲（2020）認為，厄札爾的思維或世界觀受到三種認同以及三種觀念的影響，前者包含歐洲、伊斯蘭及鄂圖曼，後者包含伊斯蘭、民主以及經濟自由化，其中他對於鄂圖曼帝國、伊斯蘭信仰以及自由價值的信念促使他規劃土耳其的新奧斯曼主義外交方針，為了加強和西方國家的聯繫以加入歐洲共同

體，厄札爾任內廢除死刑、加強庫德族少數族群的人權以及推動安納托利亞地區經濟的發展。(Yavuz 2020, 110)

從 1980 到 1990 年間，厄札爾要處理兩種觀念上的分歧，其一為凱末爾主義，其二為庫德族分離主義。不同於凱末爾主義，厄札爾認為國家的族群及宗教多樣性不必然會對該國安全構成威脅，相反的，他認為這是一國強盛以及文化富裕的象徵。為達到這個目的，厄札爾提出上述所說的三項自由，經濟層面上他強化土耳其出口導向的能力並希望能夠將土耳其發展為全球第 15 大經濟體，他認為土耳其的經濟實力遠比軍事實力還要重要。(Yavuz 2020, 109-110)

在族群及文化方面，厄札爾希望憑藉著土耳其在歷史、地緣政治以及文化的重要性拓展市場，並調解土耳其和庫德族、周邊國家以及世俗化和伊斯蘭信仰之間的矛盾。他特別援引鄂圖曼帝國的經驗重新界定民族主義以及世俗主義，並確立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方針，他稱為「新奧斯曼主義」。居澤爾認為，庫德族問題容易惡化成武裝衝突，成為土耳其邊界不安全的威脅來源，這也是厄札爾首當關注的問題。要解決庫德族和土耳其之間的矛盾就要從認同政治著手，厄札爾希望利用鄂圖曼帝國時期不同族裔共存的模式處理庫德族問題，並藉此將土耳其的權力投射到伊朗、伊拉克以及敘利亞地區的庫德族議題當中，強化土耳其所扮演的角色。(Yavuz 2020, 110-111)

亞伍茲指出，除了厄札爾本人的想法，當時土耳其國內以及國際因素也促成新奧斯曼主義的出現。在國內的部分，葛蘭運動的興起強化土耳其以及伊斯蘭的認同。葛蘭運動是一個以蘇菲主義為主的政治宗教組織，因為該組織由土耳其宗教學者葛蘭 (Fethullah Gülen) 建立，故以此為名。葛蘭運動主張透過「重新喚醒」過去鄂圖曼帝國的歷史以維持土耳其—穆斯林國家 (Turkish-Muslim nation)，只有從伊斯蘭以及鄂圖曼帝國過去的歷史土耳其才能重新挖掘最真實的自我。對於葛蘭而言，他想尋求並非最真實的過去，而是符合當下需求的歷史，換而言之，歷史是為當下政治及社會宗教目的服務，這樣的做法延續到埃爾多安時期土耳其政府對過去鄂圖曼帝國的看法。(Yavuz 2020, 113)

葛蘭所設想的土耳其民族主義並非基於單一民族或種族，而是在單一政治體制之下不同族群基於共同歷史經驗尋求共存，土耳其人（Turk）在葛蘭的定義中，指的是那些居住在土耳其的穆斯林、共享鄂圖曼的遺產且自我認同為土耳其人。但葛蘭對阿拉伯人持負面的看法，他認為阿拉伯人和鄂圖曼帝國作對且將伊斯蘭當作政治鬥爭的手段，背離了伊斯蘭真爭的樣貌。（Yavuz 2020，113）

葛蘭運動在土耳其境內以及海外土耳其人社群大量創辦私立學校，葛蘭希望透過教育的方式讓世人理解鄂圖曼帝國傳統，進而推翻凱末爾主義改革所帶來的教育體制。葛蘭認為土耳其社會充滿失敗者情節以及缺乏自信心，他希望透過強調鄂圖曼帝國的黃金時代來增加國民的自信心，而教育是最有效的途徑。（Yavuz 2020，113-114）¹⁴

另一方面，國際局勢的不穩定、衝突也影響土耳其的新奧斯曼主義外交政策。1989年保加利亞政府對境內的穆斯林實施大遷徙（Big Excursion），造成約39萬人逃到土耳其境內；同一時間高加索地區的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對於卡拉巴赫（Karabakh）飛地的主權歸屬產生紛爭，進而導致戰爭，造成約100萬名亞塞拜然突厥人流離失所；1992年塞爾維亞軍警對波士尼亞穆斯林實施種族滅絕，引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干涉，同時也讓土耳其思考該以何種態度處理和鄰國之間的關係，這也是厄札爾提出新奧斯曼主義外交政策的國際背景。（Yavuz 2020，116）

與內政相比，作為外交政策的新奧斯曼主義旨在去除和巴爾幹國家、中亞、高加索以及中東國家之間的經濟藩籬，希望能夠促進國家之間人員、商品以及觀念的流動。如果以國際關係理論來看，此時期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偏向以新自由制度主義以及建構主義的思維去探索和周邊國家的關係，希望透過頻繁

¹⁴ 實際上葛蘭所設想的鄂圖曼帝國和歷史上的鄂圖曼帝國有所差距，從歷史上來看，鄂圖曼帝國並非只依靠伊斯蘭法來治理國家，因此將鄂圖曼帝國和伊斯蘭信仰畫上等號更多是為了當下土耳其社會的需要而非還原歷史。

的交流建立一個具有共同觀念、視彼此為夥伴而非敵人的國際社會。

到了 1990 年代，厄札爾所提出的新奧斯曼主義外交政策遭遇一些挫折，這包含：一、國內政治及社會轉型快速，導致社會上出現不同聲音，這些聲音開始批判厄札爾任期內所提出的政治及經濟自由化政策；二、國際局勢急遽變動，先是蘇聯解體，再來土耳其加入歐洲共同體的請求被拒絕，同時賽普勒斯問題又讓土耳其和西方國家的關係變得緊張，南斯拉夫內戰更讓土耳其的立場顯得尷尬，這讓當時土耳其的新奧斯曼主義外交政策無法如厄札爾所設想的完全落實。(Yavuz 2020, 112)

儘管如此，這些挑戰並無法證明新奧斯曼主義外交政策就無法執行。從後冷戰時期的諸多發展來看，蘇聯解體的同時中亞各加盟共和國也獨立出來，高加索地區局勢的不穩定以及巴爾幹地區獨立國家的出現同樣為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新的機會，也讓土耳其開始規劃新的戰略以強化新奧斯曼主義外交政策。

第三節、厄札爾時期土耳其外交政策

一、土耳其中亞政策

1991 年 12 月 25 日蘇聯宣布解體，作為蘇聯加盟共和國的中亞五國，哈薩克、塔吉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以及土庫曼也獨立出來，成為新興的共和國，高加索國家如喬治亞、亞美尼亞及亞塞拜然也宣布成為獨立國家，對於土耳其來說，這些新興獨立國家中絕大多數都是突厥裔國家，如果能透過突厥人的共同歷史、文化及社會觀建立起密切的聯繫，將能讓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具有主動性，也能拓展厄札爾時期所開展的新奧斯曼主義外交政策。

要討論土耳其的新奧斯曼主義以及中亞政策，必須要先討論土耳其和中亞國家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文化、歷史以及社會上的相似性。土耳其 (Turkey)、突厥 (Türk) 指涉的是相近但不同的詞彙，土耳其指的是 1923 年在安那托利亞所

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國」(Republic of Türkiye)，共和國內的國民認同他們屬於「土耳其」這個族群，並以此身分、標籤區別我群和他群之間的差異；突厥的意涵較為複雜，在中文的脈絡裡，突厥可以指涉 6 到 8 世紀之間在北亞地區興起的遊牧民族，早期突厥人臣服於其他遊牧民族政權底下例如柔然，當突厥部落實力凌駕於周邊部族時，他們會推翻過去所臣服的政變並建立龐大的突厥帝國，藉以和周邊的農業國家例如中國、波斯打交道，隨著唐朝在幾次戰爭中擊敗突厥，突厥諸部落也遷移到中亞和西亞，影響到其他地區政治、軍事發展；從更廣的層面來看，突厥僅僅指的是從北亞草原到西亞地區，不同部族但講著類似語言的一群人，他們也被早期的波斯以及阿拉伯人稱之為「突厥斯坦」(Turkistan)，意思是突厥人之地。(昝濤 2011 042-044)

中亞地區是廣袤的草原沙漠地帶，數千年來這塊地孕育著不同生活型態的族群，最早期的族群為印歐語系族群，包含斯基泰、粟特人等等，隨著 7 世紀以後伊斯蘭的擴張，不少阿拉伯人有定居在伊朗東北部呼羅珊 (Khorasan) 地區，緊接著，突厥、蒙古的崛起又造成歐亞大陸種民族的大遷徙，最終造成中亞、西亞多數國家 (除了塔吉克) 以突厥裔國家為主。

中亞多數國家原本只是部落聯盟或鬆散的國家組織，隨著 19 世紀俄羅斯帝國的擴張，俄羅斯先在 1847 年吞併哈薩克汗國、1876 年建立突厥斯坦總督區，1881 年正式將新疆以外的中亞地區都納入俄羅斯帝國的領土，並對中亞地區展開俄羅斯化政策。(土肥恆之 2018, 300-301)

在俄羅斯帝國以及蘇聯的統治期間，中亞地區的部落民被迫建立以領土為主的國家體制，這樣的措施打破過去中亞牧民的生活習慣，同時俄羅斯—蘇聯政府也將俄羅斯的生活、經濟和生活方式施加於中亞民眾之上，導致中亞的民眾面對現代性的衝擊、被迫調整過去的經濟營生方式以及伊斯蘭信仰。

楊成 (2020) 指出，蘇聯解體以後，中亞五國被迫獨立，被迫在巨變的國際環境下建立新的國家身分與認同以維持國家生存。他認為國家身分有兩層涵義，一方面是個體身分，此概念類似溫特所提到的團體以及類屬身分，指的是

使國家能夠形成的觀念及身分，這類身分是自行組織且由國家內部塑造而成；另外一個身分為集體身分，此概念相當於溫特所提到的角色身分，也就是國家和國家交往之間透過共同觀念、國際規範等因素所建構的社會角色。這兩種角色是相互影響以及相互建構，並且同樣依靠他者的存在才有意義。

相較於尋求民族自決、憑藉著自身的力量尋求獨立的前華沙公約組織國家，中亞國家在物質層面具有以下幾點問題：一、中亞國家的經濟發展過度依賴前蘇聯，在蘇聯統治時期的計畫經濟底下，中亞各加盟國只發展單一有利的產業，到了後蘇聯時期，這些國家在經濟層面上仍舊依賴俄羅斯的經濟，尤其是能源和進出口；二、中亞國家的民族組成成分相當複雜，多數國家缺乏單一且佔絕對多數的主要民族，俄羅斯族裔在各國當中都佔有不少比例，以哈薩克為例，2009 年的統計當中，該國有 23.7% 的國民為俄羅斯裔，吉爾吉斯境內也有 13.8% 的人為俄羅斯裔，反映中亞五國人口的多元。（見表一）

表格 1：中亞五國佔前五名的民族人口比例

國名	哈薩克	烏茲別克	吉爾吉斯	土庫曼	塔吉克	
族名及排序	一	哈薩克 69.6%	烏茲別克 83.8%	吉爾吉斯 73.8%	土庫曼 85%	塔吉克 84.3%
	二	俄羅斯 17.9%	塔吉克 4.8%	烏茲別克 14.8%	烏茲別克 5%	烏茲別克 13.8%
	三	烏茲別克 3.3%	哈薩克 2.5%	其他 5.2%	俄羅斯 4%	其他 2%
	四	維吾爾 1.5%	俄羅斯 2.3%	俄羅斯 5.1%	其他 6%	
	五	烏克蘭 1.3%	卡拉卡爾 派 2.2%	東干 1.1%		

資料來源：The World Factbook

楊成（2020）認為，中亞五國獨立後，在建立國家新任的過程中會經過三個階段，即去宗主國化、在地化以及國際化，其中去宗主國化為核心，指的是擺脫過去在文化、政治及經濟上對俄羅斯的依賴，並透過在地化、國際化這兩種途徑建構中亞國家的主體性、塑造新的認同。

對於土耳其而言，蘇聯解體正是該國發展新關係的契機，一方面中亞、高加索地區富含能源，和中亞國家建立關係有助於透過能源轉運賺取龐大的利益另一方面，土耳其也受到泛突厥主義影響，基於民族認同的需求，希望建立以突厥為共同認同的社群，除此之外，土耳其以及西方國家也希望在地緣戰略上遏止伊朗的擴張，因此拉攏中亞國家成為當時土耳其外交政策的重要一環。

土耳其在蘇聯解體之前就和中亞國家有接觸，1991年3月厄札爾率團拜訪烏克蘭、亞塞拜然和哈薩克，並和這些國家簽訂技術及經濟合作協議，但當時並未商議如何進一步處理後蘇聯時期的雙邊關係。同年11月土耳其承認亞塞拜然獨立，接著於12月承認中亞五國的獨立。（Hale, William M，222-223）

土耳其和中亞國家互動初期希望能夠像中亞國家推銷「土耳其模式」（Turkish Mode），也就是強調土耳其獨特的政治、社會及經濟體制，並透過此種模式建立突厥國家間的聯繫。土耳其也打算在1992年籌備突厥國家高峰會（Turkic Summit），希望建立突厥國家間的共同市場、促進人員及商品的流動，但對於中亞國家來說，一方面他們在經濟上仍需要依賴俄羅斯，另一方面他們也不樂見土耳其作為突厥國家的共主，想要維持中亞國家在外交方面的自主性，這導致土耳其的盤算並未成功，並改變策略、轉而採取比較保守及務實的外交途徑。（Hale, William M，222-223；Gareth Winrow，2001，179）

二、土耳其俄羅斯關係

土耳其和俄羅斯在後冷戰時期的關係比較微妙，一方面兩國因為戰略和意

識型態的原因呈敵對狀態，另一方面土耳其也需要俄羅斯的天然氣，俄羅斯也是土耳其農產品的主要出口地之一，政治上敵對、經濟上依賴構成了土耳其和俄羅斯之間矛盾的關係。土耳其學者巴佐奧魯（Duygu Bazoğlu Sezer）稱兩國在 1990 年代之間的關係為「虛假和解」（Virtual Rapprochement），這指的是，檯面上兩國仍是敵人，但在其他方面，兩國都認知到彼此合作能促進各自的利益，雙方高層官員也避免使用煽動性言論以激起民眾憤怒，但這樣的合作仍然有限，因為雙方對彼此仍充滿猜忌以及不信任，最終導致雙方在諸多議題上「同床異夢」。（Duygu Bazoğlu Sezer 2001，154）

巴佐奧魯（2001）認為，土耳其和俄羅斯之間的「虛假和解」包含兩種截然對立的互動模式，一方面土耳其和俄羅斯在經濟上開展合作，另一方面兩國採取「管理地緣政治競爭」（Managed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模式，挑戰彼此在中亞、高加索等新興國家的影響力。

對俄羅斯聯邦來說，1990 年代充斥著恐怖主義及分離主義，尤其是車臣、達吉斯坦和喬治亞共和國，邊陲地帶的不穩定對俄羅斯的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因此俄羅斯對這些地區的外交政策首要目標是要排除境外勢力的干涉，將獨立國家國協（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成員國整合進俄羅斯的掌控範圍。（Duygu Bazoğlu Sezer 2001，155）¹⁵

對土耳其來說，該國的目標有兩個，其一是要幫助新興獨立國家維持獨立自主的地位，其二希望建立土耳其和亞塞拜然以及中亞突厥國家之間的聯繫，但此舉對俄羅斯來說會刺激國內分離主義以及中亞地區泛突厥主義「極端主義」意識形態，因此兩國在地緣政治上的考量是互斥的，但在當時中亞國家並不認可土耳其的戰略規劃，使得土耳其轉而採取比較保守的外交手段。

¹⁵ 1991 年 11 月 22 日，11 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簽署《阿拉木圖宣言》（Alma-Ata Protocol），宣布成立獨立國家國協，當時成員國包含亞美尼亞、亞塞拜然、白俄羅斯（後來改白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摩爾多瓦、俄羅斯、塔吉克、土庫曼、烏克蘭以及烏茲別克。2008 年喬治亞爆發南奧賽梯戰爭，退出獨立國家國協；2018 年烏克蘭因為克里米亞危機以及頓巴斯戰爭退出獨立國家國協。

為了管理地緣政治上的衝突，土耳其和俄羅斯的高層官員會透過外交層面的對話以及接觸處理爭端，一來這能處理檯面上沒有辦法公開的安全問題，二來這種方法也能增加兩國的合作機會，對土耳其來說，這也能成為該國和歐洲關係惡化時的替代方案，避免過度依賴美國和歐洲。

1992年土耳其總理德米雷爾出訪莫斯科，和俄羅斯商議亞塞拜然和亞美尼亞戰爭的問題，雖然當時獨立國家國協參謀長沙波什尼科夫（Yevgeny Shaposhnikov）威脅，如果土耳其介入亞美尼亞、亞塞拜然爭端，俄羅斯不排除動用核武，但兩國還是簽訂友好及合作條約，試圖建立可以控管以及正面的雙邊關係。俄羅斯總理切爾諾梅爾金（Viktor Chernomyrdin）1997年也拜訪安卡拉，是俄羅斯自蘇聯解體以來第一位拜訪土耳其的政府首腦，切爾諾梅爾金希望和土耳其洽談藍溪天然氣管線（Blue Stream）的興建計畫，預計耗資300億美元、為期25年並在2010年以前供應210億立方碼的天然氣，土耳其也藉此希望擴大兩國在其他領域的合作。（Duygu Bazoğlu Sezer 2001, 157）

透過兩國互相訪問，土耳其和俄羅斯試圖在各自最敏感的安全議題上尋求合作的機會，儘管如此，庫德族以及車臣問題依舊是兩國難以促成合作的議題，之所以有困難也是和兩國的民族認同以及國家安全有關，難以在短時間內達成共識。

相較於地緣政治，土耳其和俄羅斯的經濟合作發展的速度比較快速，尤其是貿易、觀光業、零售業以及建築業，但隨著1990年代後期俄羅斯經濟的崩潰，兩國貿易及服務業的經濟也急速下滑，在1990年代中期兩國的貿易總額每年帶來80億到100億美元的利潤；土耳其出口到俄羅斯的商品約13億4700萬美元、進口量約21億5200萬美元，呈貿易逆差，但在1997年土耳其的出口量減少34.4%、進口量幾乎沒有變，反映這段期間兩國貿易的不穩定。（Duygu Bazoğlu Sezer 2001, 163-164）

三、新奧斯曼主義與土耳其中東外交政策

厄札爾時期土耳其外交政策的重點除了試圖和中亞國家建立聯繫外，也希望增加土耳其在中東的話語權，這受到兩個因素的影響：其一是庫德族問題，土耳其自建國以來就面臨庫德族民族主義以及土耳其民族主義間的衝突，要如何調解或鎮壓庫德族議題是當下土耳其政府要思考的問題；其二是土耳其在伊斯蘭世界該扮演怎樣的角色，土耳其自建國以來一直以凱末爾主義主導國家的建設及改革，隨著經濟成長、伊斯蘭的影響力在國內增加，土耳其也開始思考不再過度依靠西方國家，但要如何擴大和伊斯蘭、中東國家的關係就變成這段時期土耳其的問題。

納赫瑪尼 (Amikam Nachmani, 2009) 提到，土耳其建國以後，為了塑造單一的國家認同，強迫少數族裔，如庫德族接受「土耳其化政策」(Turkification)，不僅原本居住的地方被改成土耳其名稱，庫德族人的名稱也被迫改成土耳其名字，庫德族也不被承認為庫德族，而是被稱為「山地土耳其人」(Mountain Turks)。為了反對土耳其化政策，庫德族自 1924 年到 1938 年發動數次叛亂，其中 1925 年謝赫薩依德 (Sheikh Said) 領導的叛亂讓凱末爾政府認為，這些庫德族人一方面代表的是伊斯蘭舊勢力，另一方面他們也從國外得到支持，試圖顛覆土耳其。到了 1938 年，迪爾希姆 (Dersim) 庫德族反對中央政府的土耳其化政策，採取武裝對抗，引發凱末爾政府鎮壓，造成約 1.3 萬人死亡 (陳牧民, 2016, 84)¹⁶

土耳其在 1960 年代以後陷入左右意識形態對立的局面，其中庫德族民族主義份子受到左翼政治理念的影響，也成立相關的政黨以表明庫德族的政治訴求。1970 年代庫德族政治領袖歐嘉蘭 ((Abdullah Öcalan)) 在土耳其東南部成立「庫德工人黨」(Partiya Karkerên Kurdistan)，接下來幾年的時間庫德工人黨透過武裝游擊的方式和土耳其政府對抗，並以敘利亞北部、伊拉克北部為根據

¹⁶ 2011 年，時任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為迪爾希姆大屠殺表示歉意，為土耳其建國以來第一位行政首長正式公開道歉。詳情請見 BBC, "Turkey PM Erdogan apologises for 1930s Kurdish killings"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15857429>.

地壯大勢力，由於土耳其東南部地形崎嶇，造成土耳其軍方難以進入山區鎮壓，而土耳其對庫德族的施壓造成大量庫德族難民逃到歐洲，也成為之後歐盟關切土耳其人權的議題之一。(陳牧民，2016，85-86)

厄札爾上台之初，庫德工人黨人對土耳其發動數次攻擊，迫使他對全國七省的省發布緊急命令以避免情勢惡化。厄札爾不希望單以武力解決庫德族分離主義的問題，他希望透過新奧斯曼主義的方式，透過尊重多元文化和族群的方式讓武裝衝突的風險降到最低，並以伊斯蘭、鄂圖曼帝國的共同記憶取代以世俗國家為主的國族認同，最終希望將庫德族整合為國家的一部份。

除了土耳其本身，庫德族問題同樣也牽動整個中東局勢。1980年9月伊拉克總統海珊(Saddam Hussein)對伊朗發動戰爭，伊拉克方本以為能夠趁伊朗革命後國力虛弱之時有所收穫，但雙方均陷入戰爭泥淖，最終在1988年在聯合國的調停下同意停火，造成兩國近百萬人傷亡。過程中，伊朗以及伊拉克各自拉攏彼此境內的庫德族，希望利用庫德族分離主義打亂對方陣腳，為了解決庫德族問題，海珊對伊拉克北方的庫德族實施血腥鎮壓，並動用飛機甚至毒氣等分式對付庫德族，造成大量難民逃到土耳其境內。(Kösebalaban, 2011, 125)

兩伊戰爭造成的難民潮也給土耳其帶來諸多問題，當時土耳其國內朝野上下對於是否接納庫德族難民意見不一，民族主義者認為，一旦接納庫德族難民，就會讓該國境內庫德族的比例增加，進而增加庫德族的勢力，讓國家陷於分裂，而西方國家就會變成最大贏家。厄札爾當時考量三點：第一、他希望能夠推動讓土耳其加入歐洲共同體，而歐洲共同體重視成員國在經濟自由化、政治自由化以及人權上的表現，土耳其在庫德族議題如果能夠伸出援手，則有助於增加該國在人道救援上的形象；第二、當時土耳其接近選舉年，厄札爾希望能夠爭取國內庫德族選民的支持；第三、受到新奧斯曼主義的影響，厄札爾希望以多元主義的方式處理不同族群的問題。最後厄札爾同意接收庫德族難民，到了1988年9月，土耳其共接收約6萬名庫德族難民。(Kösebalaban, 2011, 125)

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發國際譴責，美國也在隔年（1991年）1月聯合全世界近40國聯軍對伊拉克用兵，被稱為「沙漠風暴行動」。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也造成庫德族難民潮，土耳其接收超過50萬名伊拉克庫德族人，厄札爾希望藉此改變土耳其和庫德族人的關係，同時也希望利用這個機會讓土耳其涉入伊拉克事務。厄札爾先是同意伊拉克庫德族人在伊拉克北部建立自治區，土耳其也拉攏伊拉克北部的庫德族團體，希望在當地扶持親土耳其的勢力。（Kösebalaban，2011，125）

此外，為了拉攏和西方國家的關係，土耳其也加入美國對伊拉克的制裁以及美國對伊拉克的軍事行動，根據美國駐土耳其大使說法，厄札爾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後主動聯繫時任美國總統布希（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他提議要關閉從伊拉克北部經由土耳其輸送到地中海的原油管線，以表明土耳其和美國的利益一致，並希望利用美國的支持參與中東事務。（Amikam Nachmani，2009 134-135）

厄札爾希望透過改善和庫德族的關係達成多項外交目標：一、建構一個包容度更高的國族認同，透過伊斯蘭信仰和鄂圖曼帝國的共同歷史背景取代民族主義以及分離主義；二、將庫德工人黨的影響力降到最低，逐步排除在外；三、擴大土耳其在中東事務的影響力，以建立起土耳其在伊斯蘭世界的重要角色。儘管如此，要推行上述的目標還會遇到幾個障礙：一、土耳其內部對於庫德族的看法不一，特別是軍方，其主張要以武力鎮壓庫德工人黨；二、阿拉伯國家因為過去土耳其和以色列以及西方國家的關係，並不信任土耳其。這些因素也導致土耳其的邊界仍處於不安定的狀態，直到正義與發展黨上台，土耳其依舊要處理這些問題。

除了庫德族議題，伊斯蘭信仰也是土耳其中東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一方面是要和中東國家建立穩定的外交關係，另一方面也希望確保能源運輸管道的順暢以及邊界地帶安全的保障。土耳其和中東國家的外交關係可以追溯到二次大戰以後去殖民化浪潮，當時土耳其為避免蘇聯侵犯主權、同時受到

凱末爾主義的影響，決定採取親西方的立場，並和希臘達成諒解以便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在 1950 年代，土耳其拉攏伊拉克、伊朗和英國建立巴格達公約組織，試圖在中東建立區域安全性組織以鞏固土耳其周邊的領土安全，但這樣的舉措卻引來阿拉伯世界的反感，原因是當時的敘利亞、黎巴嫩、埃及等國受到阿拉伯主義的影響，他們對土耳其和以色列建交的行為感到不滿，將其視為西方在中東的代理人。(Kemal Kirişci 2001 98-99)

儘管如此，土耳其仍試圖保持和阿拉伯世界的關係，在 1967 年六日戰爭爆發時土耳其就拒絕美國使用該國境內的軍事基地以提供以色列支援，在這之後，土耳其經常對以阿衝突表態，反對以色列以武力強佔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以及反對美國利用土耳其的軍事基地協助以色列。(范盛保 2016, 105)

伊赫薩諾盧 (Ekmeleddin Ihsanoğlu, 1996) 認為，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必須在兩大原則之間保持平衡，第一是不干預他國內政，土耳其必須在中東的衝突當中保持中立，這也意味著土耳其並不尋求伊斯蘭世界的領袖；其二是和西方國家維持緊密的關係。伊赫薩諾盧認為過去鄂圖曼帝國的經驗對於當代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有所幫助，使得土耳其能夠在中東和西方國家之間維持良好的平衡。

1960 年代之後，中東伊斯蘭國家分裂為兩大陣營，其一是支持伊斯蘭復興運動，包含沙烏地阿拉伯、巴基斯坦、外約旦等國家；其二為支持阿拉伯民族主義、強調阿拉伯人團結的國家，包含埃及、敘利亞以及伊拉克。1965 年沙烏地阿拉伯國王費薩 (Faisal bin Abdulaziz Al Saud) 出訪伊斯蘭國家，希望能夠組建一個以穆斯林國家領導人為主的跨國會議以討論和伊斯蘭有關的議題，當時有不少國家反對他的提案，例如埃及、敘利亞、伊拉克，支持沙烏地阿拉伯的國家有伊朗、巴基斯坦、摩洛哥、索馬利亞以及約旦，土耳其當時選擇在兩大陣營間保持中立，並未馬上選邊站。(ekmeleddin ihsanoğlu, 1996, 77-78)

隨著 1967 年六日戰爭的爆發、1969 年阿克薩清真寺 (al-Aqsa) 遭人縱火，伊斯蘭團結的意識也得到更多國家的支持，相較之下，阿拉伯民族主義因為六日戰爭戰敗的原因而逐漸消逝。最終全球 36 個伊斯蘭國家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 (Rabat) 舉行會議，同意建立伊斯蘭合作組織 (Organis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 簡稱 OIC)。

1970 年代是土耳其和伊斯蘭國家關係發展迅速的時期，1974 年土耳其以賽普勒斯土耳其裔居民遭到迫害為由出兵，導致美國對土耳其實施武裝禁運，造成土耳其在西方陣營遭到孤立，也讓土耳其對西方國家在賽普勒斯和希臘議題上的偏心感到不滿，促使土耳其選擇和伊斯蘭國家發展以避免過度依賴歐洲和美國。除此之外，當時全球爆發能源危機，導致土耳其的外匯收入大幅縮水，加上全球油價大幅上升，這使得依賴能源進口的土耳其必須要加強和產油國的合作以應對經濟危機，同時，為了減輕高昂的外債，土耳其也希望向阿拉伯地區的產油國借款以應付短期危機，這促使土耳其於 1977 年加入伊斯蘭開發銀行 (Islamic Development Bank, 簡稱 IDB)，該銀行旨在依照伊斯蘭法的原則促進成員國之間的經濟發展以及社會福祉，與 IMF、亞洲銀行相比，伊斯蘭開發銀行並不要求利息，因為伊斯蘭法禁止放貸。(ekmeleddin ihsanoğlu, 1996, 83-84)

到了 1980 年代，隨著全球朝向自由化經濟以及全球化，IOC 要討論的國際議題也從原本的政治經濟擴大到文化、社會等方面，這也讓土耳其和其他國伊斯蘭國家有更多合作的機會。在政治方面，IOC 於 1980 年 1 月真對蘇聯入侵阿富汗召開會議，會中土耳其也同意大會的決議，即要求暫停阿富汗成員國資格、抵制莫斯科奧運以及譴責蘇聯入侵阿富汗的行為。(ekmeleddin ihsanoğlu, 1996, 88) 隔年 (1981 年) IOC 針對兩伊戰爭召開會議，其中在第三次會議中土耳其首次參加總理層級的會議，該次會議也提出《麥加宣言》(Mecca Declaration)，強調伊斯蘭國家之間的團結、合作以及遵循伊斯蘭法原則。

在經濟層面，1984 年時任土耳其總統埃夫倫 (Kenan Evren) 擔任 IOC 旗

下委員會經濟和商業合作常務委員會（The Standing Committee for Economic and Commercial Cooperation，簡稱 COMCMC）的主席，並於同年 11 月在伊斯坦堡舉行第一期會議，厄札爾在會中強調要透過經濟上的合作解決成員國的爭端，透過放寬經濟管制，土耳其也在 1980 年代吸引中東國家到土耳其投資，並在當地設立數間投資銀行以促進投資，從 1980 到 1990 年之間，土耳其從伊斯蘭國家進口商品的比率由 9%增長到 18%；1980 到 1985 年間土耳其出口到歐洲的商品下降到 30%，出口到伊斯蘭國家的商品則來到 45%，反映土耳其和中東以及伊斯蘭國家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緊密。（ekmeleddin ihsanoğlu，1996，93-94）

在 1980 到 1990 年這段期間，土耳其在庫德族議題以及伊斯蘭國家間的互動都遵循著新奧斯曼主義的邏輯：也就是透過伊斯蘭信仰和中東及伊斯蘭國家發展合作關係，透過鄂圖曼帝國的歷史處理伊拉克和庫德族問題，希望將土耳其打造成東方以及西方的橋樑、協調者。

第五章、埃爾多安、正義與發展黨與新奧斯曼主義

1993 年厄札爾於總統任內過世，標誌他的施政告一段落，儘管如此，他在任內提出的新奧斯曼主義外交政策並未因此被放棄，1990 年代中期的繁榮黨政府，其領導人埃爾巴坎的外交政策也受到新奧斯曼主義的影響，致力於加強和巴爾幹以及中亞國家的關係。

2000 年以後，隨著土耳其經濟發展快速，土耳其不再像厄札爾時期仍追隨西方的腳步，新上台的正義與發展黨政府開始調整新奧斯曼主義外交政策，一方面強調土耳其和周邊國家的伊斯蘭、鄂圖曼的共同歷史、文化經驗，另一方面選擇和西方國家保持距離，並在許多議題上和美國及歐盟針鋒相對，反映出土耳其試圖尋求更獨立自主的認同、建構出不依賴他國的角色。

本篇共分為幾個部分：一、正義與發展黨與埃爾多安的崛起：本部分將討論正義與發展黨的成立、埃爾多安的生平經歷以及他在獲的權力的過程，並探討他的崛起如何影響土耳其外交政策；二、埃爾多安、達武特奧盧及新奧斯曼主義：本部分討論埃爾多安的外交政策理念以及他如何看待新奧斯曼主義，並做出不同的詮釋；三、阿拉伯之春、敘利亞與新奧斯曼主義：本部分討論中東發生阿拉伯之春後，土耳其如何推廣新奧斯曼政策，並規劃新的地緣戰略；四、新奧斯曼主義與埃爾多安的中亞外交政策：本部分討論土耳其從正義與發展黨上台以後對中亞五國、高加索地區採取的外交政策。

第一節、正義與發展黨與埃爾多安的崛起

自 1960 年代實施多黨制以後，土耳其境內被壓抑的伊斯蘭政黨逐漸崛起，到了 1990 年代，主張伊斯蘭認同、公平秩序以及反對加入歐洲共同體、反對西方帝國主義的繁榮黨崛起，先是在 1994 年地方選舉中躍居全國第三大政黨，接著在隔年全國大選中以 21.38 的得票率囊括 158 席次，成為全國第一大黨。（朱傳忠 2018，36-37）

繁榮黨上台後提出五點外交政策綱領，希望能夠結束伊斯蘭世界受到剝削的處境，包含：一、建立伊斯蘭國家的聯合國；二、建立伊斯蘭共同市場；三、發行伊斯蘭共同貨幣；四、建立伊斯蘭共同部隊；五、建立伊斯蘭共同文化合作組織。(朱傳忠 2018, 40) 繁榮黨希望透過以上幾項措施團結整個伊斯蘭世界，這樣的主張部分受到新奧斯曼主義的影響，希望重新塑造土耳其的國家認同以及和他國交往的身分，並透過這樣的身分建構國家利益。

1997 年土耳其軍方控制的國家安全委員會 (NSC) 向埃爾巴坎政府提出 20 點計畫，要求落實世俗化政策，防止「伊斯蘭主義」對國家世俗化精神的破壞，埃爾巴坎被迫同意軍方計畫，並宣布內閣總辭，這次軟性政變又被稱為「二二八進程」。隔年 (1998 年) 1 月，土耳其憲法法院以違反世俗化為由判定繁榮黨解散，埃爾巴坎以及其他政黨領袖也被禁止從事政治活動。(Hale, William M; Özbudun, Ergun. 2010: 04)

繁榮黨倒台後，部分前黨員重組新政黨，名為「美德黨」(Virtue Party)，並在 1999 年全國大選中獲得 15.4% 選票，成為全國第三大黨。除了繁榮黨外，也有部分祖國黨黨員選擇脫黨加入。美德黨宣稱要促進土耳其民主、清廉以及自由，並在 1999 年大選中宣傳要壯大土耳其、建立強大軍隊以及外交等政見。但在過程中美德黨內部出現分裂，一派為改革派，希望能改變政黨類型，他們不滿埃爾巴坎壟斷黨內政治，希望讓政黨變得更開放、民主，此派以居爾 (Abdullah Gül)、埃爾多安為代表；另一派則是傳統派，以埃爾巴坎為代表，埃爾巴坎則認為美德黨不應該走溫和路線、希望能集中黨的權力。(朱傳忠 2018, 51、54-55)

從繁榮黨到美德黨的過程中，儘管黨員對於黨的路線和手段有不同意見，但他們都認為伊斯蘭信仰以及強化土耳其認同是核心政見，這樣的理念也影響後來正義與發展黨的外交政策，讓土耳其採取更為積極、主動的角色，而非照單全收西方國家的觀點和意識形態。

2001 年，美德黨被土耳其憲法法院取締，使得黨內改革派和傳統派分道揚

鑣。傳統派於同年7月成立幸福黨，幸福黨主張反歐盟、反西方外交政策，同時對哈瑪斯和真主黨抱持同情的態度，相較於民主，幸福黨更強調民族主義，其黨綱也使用鄂圖曼帝國時期的詞彙，例如精神 (maneviyet)。儘管如此，幸福黨在2002年參加全國大選，僅獲得2.5%選票，在接下來幾次選舉該黨的得票率有限，反映該黨逐漸被邊緣化。(朱傳忠 2018, 56-57、59)

與此同時，當時土耳其面臨嚴重的經濟危機，從2000年11月到2001年2月，土耳其爆發嚴重的銀行倒閉潮、通貨緊縮以及失業率爆增，土耳其幣里拉 (Lira) 貶值約50%，造成國內經濟危機，除此之外，土耳其在1999年大地震的救災不力以及聯合政府出現嚴重對立，都讓國內人心惶惶，導致國內民眾傾向於改革派。最終改革派於2001年8月成立正義與發展黨，創始委員由74人組成，包含13名女性。(朱傳忠 2018, 56-57、59)

2002年正義與發展黨首次參加全國大選，卻囊括34.2%選票、66%席次，成為大國民議會最大黨。與過去的選舉相比，這次選舉代表著土耳其伊斯蘭政黨首次以絕對多數執政；除此之外，過去標榜為中間意識形態的政黨在這次選舉中獲得的席次較少，反映土耳其的民意正在變化，安納托利亞中部信奉虔誠伊斯蘭、較保守的選民逐漸成為選戰的關鍵。(朱傳忠 2018, 76-79)

另一方面，正義與發展黨在意識形態上也和過去的伊斯蘭政黨有所差別，首先，過去的伊斯蘭主義政黨著重於強調民族主義，這些政黨採取反西方的態度，認為土耳其不該加入北約，而正義與發展黨則標榜自身為「保守型民主政黨」(Conservative Democratic Party)，而非強調伊斯蘭的身分；其次，正義與發展黨執政之初更強調土耳其的世俗主義綱領，認為世俗主義是民主的基礎，但正義與發展黨也認為要避免法律和政策對於虔誠信仰者的傷害。(Hale, William M; Özbudun, Ergun. 2010: 20-21)

上述態度讓正義與發展黨在執政之初並未採取和西方價值背離的態度，但這也可能和三個因素有關：一、正義與發展黨並無全國執政的經驗，需要一段時間才能熟悉政務；二、正義與發展黨黨內的路線之爭，正義與發展黨成立時

有部分過去被解散的伊斯蘭政黨成員加入，但這些政黨成員對土耳其內政及外交政策的看法也不同，要如何協調不同態度是當下正義與發展黨的問題；三、選民代表性的問題，正義與發展黨為了擴大選民基礎，在意識形態上會採取較低調的方式安撫不同立場的民眾。(朱傳忠 2018：80-81)

隨著正義與發展黨站穩腳步，在 2007 年、2011、2015 年的選舉中正義與發展黨都贏的大選，另一方面，埃爾多安的崛起也讓正義與發展黨乃至土耳其政治出現更多變數，也影響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以及意識形態。

埃爾多安 1954 年出生於伊斯坦堡郊區城鎮卡森姆帕夏 (Kasımpaşa, Beyoğlu)，他的祖先從喬治亞西南部、靠近黑海的城市巴統 (Batumi) 搬到土耳其東北方城市里澤 (Rize)。他的父親是海軍上校軍官，同時也是當地著名的宗教人士，但根據艾爾多安所述，他和父親的關係並不融洽，小時候常常遭到父親的處罰，相較之下，她和母親的關係很好，可以說他的早年就是在母親的照護下度過的。另一方面，由於家庭貧困，埃爾多安自小就要出去打零工以貼補家用。(Yavuz, 2021：35)

埃爾多安的童年是在里澤度過，1960 年在當地的私立小學就讀，由於他對伊斯蘭信仰虔誠，因此學校推薦他到伊瑪目哈提卜中學 (İmam Hatip) 讀書，在那段時間，艾爾多安積極投入足球運動，並參加職業運動賽事，此外，中學時期的教育和宗教也奠定埃爾多安的世界觀。(Yavuz, 2021：36-37)

1960 到 1980 年期間，除了運動賽事，埃爾多安也接觸到政治事務，並受到當時政治動盪、政變頻傳以及凱末爾主義者對伊斯蘭信仰打壓的影響，他加入救國黨 (MSP) 青年支部，培養參政的經驗。畢業後埃爾多安進入馬爾瑪拉大學，專攻經濟學以及商學，並在 1981 年獲得學士學位，並在私人企業任職。(朱傳忠 2018：159)

1984 年埃爾多安擔任繁榮黨地方支部主席，隔年(1985 年)成為伊斯坦堡支部主席，並於 1986 年進入繁榮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埃爾多安嘗試在 1989 年參與地方選舉，雖然沒有成功，卻也讓繁榮黨的票數大幅增加。1994 年埃爾多安

成功當選伊斯坦堡市長，他曾強調他們是「土耳其的政黨」。1997年埃爾多安在土耳其東南部城市錫爾特（Siirt）發表演講時朗誦詩歌，遭到外界解讀為他支持在土耳其實施伊斯蘭教法，結果埃爾多安遭判刑坐牢。（朱傳忠 2018：160）

1998年土耳其憲法法院取締繁榮黨，部分黨員隨後成立美德黨，當時埃爾多安也是美德黨的成員，結果土耳其國家安全法院以煽動仇恨言論為由判處埃爾多安10個月監禁以及褫奪公權、5年內禁止參加政治活動。儘管如此，這並未能阻止埃爾多安從事政治活動，他不能參選以及擔任政府公職，但能從事政黨活動，因此他和其他美德黨的改革派共同成立正義與發展黨，在居爾的帶領之下正義與發展黨也在2002年贏得大選並組成政府，接著正義與發展黨修改法律以便讓埃爾多安能夠參選，2003年埃爾多安透過補選成為大國民議會議員，同時居爾也辭職下台並交棒給埃爾多安，使他躍升為總理。（朱傳忠 2018：161）

亞伍茲（2021）認為，數個因素導致埃爾多安成為政治強人：一、1994年埃爾多安擔任伊斯坦堡市長後，以高效率的能力解決伊斯坦堡市政，獲得民眾的愛戴，他也將市政的經驗應用在治國之道上；二、2001年土耳其爆發嚴重的經濟危機，導致除了正義與發展黨外所有政黨都出現財政危機，其中多數政黨被懷疑為了籌措財源而有貪腐的嫌疑，在這個背景之下正義與發展黨被認為是比較清廉、執政能力好的政黨；三、推動和歐盟的關係，雖然正義與發展黨是伊斯蘭政黨，但埃爾多安上台時，為了塑造自己為穆斯林世界的自由派領袖，埃爾多安聲稱要推動土耳其加入歐盟，並和葛蘭運動合作以獲取國內民眾的支持，同時也強化埃爾多安對於伊斯蘭以及鄂圖曼帝國遺產的認同。

埃爾多安、正義與發展黨和土耳其世俗派的關係以2013年為分界，在此之前兩個陣營之間的關係比較溫和，儘管世俗派對正義與發展黨的政策有所懷疑，但正義與發展黨的政策也沒有遭到大量反彈。2013年是土耳其政治較為動盪的一年（*annus horribilis*），該年土耳其國內以及中東發生三大事件，影響埃爾多安、正義與發展黨以及土耳其政治：一、加齊公園抗爭事件；二、埃及政

變，導致穆斯林兄弟會領袖穆西（Mohamed Morsi）被趕下台；三、埃爾多安遭控貪汙，導致他和葛蘭運動決裂。

加齊公園（Gazi Park）位於伊斯坦堡的塔克辛廣場（Taksim Square），過去幾十年來是土耳其不同政治意識形態的團體相互競爭的場合，隨著經濟的成長，加齊公園也吸引大量投資人，他們希望在附近興建百貨公司和商場以促進消費。2013年五月，土耳其環保人士抗議加齊公園土地徵收案，遭到警方以催淚彈驅趕，導致民眾反彈，反而在全國組織規模更大的示威抗議以和政府對抗，民眾的抗爭也從原本的反拆遷演變成四大主張：反對政府威權、反貪腐、要求政治體制要有更多制衡政府權力的機制以及日常生活遭到威脅。（Yavuz，2021：181）

加齊公園抗爭結束後，埃爾多安成為當時抗爭者以及反對黨擊火的目標，同時也讓埃爾多安和十任總統居爾決裂，同時也讓正義與發展黨和葛蘭運動分道揚鑣，讓埃爾多安重新調整他所設想的新奧斯曼主義。

第二個事件為埃及政變，2011年中東爆發阿拉伯之春，同年2月埃及總統穆巴拉克（Muḥammad Husnī Sayyid Mubārak）下台，穆斯林兄弟會領袖穆西也在隔年6月當選埃及總統。然而，因為穆西的穆斯林兄弟會背景，加上她和軍方之間的關係緊張，這導致他在2013年被軍方發動政變、逼迫下台。對於埃爾多安來說，他認為埃及軍方政變背後有西方國家、阿拉伯國家的支持，包含美國、歐盟、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公國等對穆斯林兄弟會有敵意的國家。這影響了埃爾多安幾個方面：一、埃爾多安並不太信任西方國家，他認為美國及西方國家假借埃及軍方政變，實質干涉埃及民主化過程，他這樣的方法會在土耳其重演；二、埃爾多安擔心權力受到挑戰，因而尋求俄羅斯的支持以鞏固他的權力。（Yavuz，2021：191-192）

第三個事件為埃爾多安貪腐指控，2013年12月，伊斯坦堡反貪腐部門逮捕47名嫌疑犯，其中包含三名內閣成員之子，伊斯坦堡警方認為正義與發展黨閣員可能涉嫌賄賂，但埃爾多安和正以與發展黨則指控土耳其檢方可能受到葛

蘭運動的影響，意圖顛覆正義與發展黨政府。儘管如此，為了將貪腐疑雲的傷害降到最低，正義與發展黨政府進行人事改組，重新任命數千名官員，特別是檢警方，此外，正義與發展黨政府也透過修法降低葛蘭運動的影響，這樣的措施也被認為是反民主，任何批判政府的聲音都有可能被定調為葛蘭分子。

(Yavuz, 2021: 192-194)

2013年土耳其國內爆發的三個事件讓埃爾多安和葛蘭運動決裂，也讓埃爾多安加速權力集中的進程，2016年軍方政變未遂更讓埃爾多安加速政治體制的更動，於2017年通過新憲法，將土耳其憲政體制改為總統制，也使埃爾多安成為土耳其史上首位握有實權的總統。在外交政策的部分，正義與發展黨執政之初依舊採取親西方的立場，隨著正義與發展黨連任成功，土耳其外交政策也從親西方轉變為等距外交，希望保持外交上的彈性，而軍方政變失敗也讓土耳其懷疑西方國家，轉而採取和俄羅斯友好的立場。儘管如此，土耳其並未因此停止和西方國家的關係，就筆者來看，土耳其在這段期間只是利用地緣政治上的優勢、強權之間的競爭為該國爭取最大的利益，一旦情勢對土耳其不利，土耳其依舊會在特定議題上讓步，以下幾節將分析土耳其執政至今外交政策的變化。

第二節、埃爾多安、達武特奧盧及新奧斯曼主義

與厄札爾時期的新奧斯曼主義相比，正義與發展黨執政後土耳其的外交政策變得更具有彈性，且不再強調遵循歐洲及西方價值，並且重視土耳其作為地緣政治上樞軸國家所具有的自主性，本節先簡述正義與發展黨外交政策，其次闡述埃爾多安的新奧斯曼主義外交政策。

政治學者阿孔雲路 (Karabekir Akkoyunlu, 2021) 將正義與發展黨執政時到2016年以後的外交政策分為五個時期，包含：歐洲化 (2002-2007)、自主化 (2007-2011)、帝國化 (Imperialization, 2011-2013)、孤立 (2013-2016) 以及當代。

正義與發展黨於 2002 年執政，當時正義與發展黨政府尚無執政的經驗，因此傾向於採取實用主義的內政及外交政策，為了和軍方以及傳統官僚對抗，正義與發展黨選擇和自由派知識份子合作，重新塑造該黨作為「保守型民主政黨」的形象；其次，正義與發展黨也和葛蘭運動合作，一方面希望得到葛蘭運動在財源上的贊助，二方面也希望藉助葛蘭運動的人脈拉攏教育界、軍公教中同情正義與發展黨的人，藉此擴大該黨的基本盤。(Akkoyunlu, 2021: 246-247) 在外交方面，正義與發展黨也擱置反西方立場，以爭取加入歐盟為主要的外交目標，此外，土耳其也強化和美國以及以色列之間的關係，也被美國及歐洲認為是中東適合合作的夥伴。(Akkoyunlu, 2021: 248)

從 2007 年起，正義與發展黨在政治上壓制軍方的影響力，並透過修憲鞏固權力，在對外方面，由於土耳其入歐盟一案仍遭到否決，加上美國總統歐巴馬打算要讓美軍撤出中東，這給予土耳其考慮發展自主性角色以填補中東地區的權力真空。在這段期間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並未轉向，但開始和敘利亞、伊拉克、伊朗、俄羅斯等周邊國家改善雙邊關係，同時也開始強調土耳其自身的軟實力以強化土耳其在中東的國際形象。(Akkoyunlu, 2021: 249)

2011 年阿拉伯之春爆發以後，土耳其對外開始採取積極進取的外交手段。在這段期間埃爾多安以及時任外交部長達武特奧盧判斷，世俗化的獨裁政權垮台之後，取而代之的可能會是傾向於伊斯蘭主義的政權，對土耳其來說這是擴張並重新界定邊界的最佳時機，土耳其也根據上述所提的戰略規劃提出「零問題外交」，支持埃及、突尼西亞、利比亞等地和穆斯林兄弟會有關的宗教運動，並希望對外輸出「土耳其模式」。(Akkoyunlu, 2021: 251)

從 2013 年起，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接連失利。首先土耳其支持的埃及穆斯林兄弟會遭到軍方推翻，其次是敘利亞內戰的爆發以及伊斯蘭國 (ISIS) 的崛起，讓土耳其的邊界變得不安全，也讓大量難民湧入土耳其境內。除此之外，美國為了打擊伊斯蘭國，選擇和敘利亞庫德族組織民主聯盟黨 (Partiya Yekîtiya Demokrat, 簡稱 PYD) 旗下的武裝組織人民防衛軍 (Yekîneyên

Parastina Gel，簡稱 YPG) 結盟，此舉激怒土耳其，導致兩國關係惡化，最終土耳其打破零問題外交，決定對庫德族以及伊斯蘭國動武。(Akkoyunlu，2021：253-254)

2016 年以後，土耳其內政出現重大變化，其一為軍方政變失敗、其二為達武特奧盧離職，標誌埃爾多安個人獨攬大權，同時也讓土耳其在和西方國家的關係上開始採取強硬的立場，不再對西方國家唯命是從。首先土耳其和俄羅斯達成外交上的諒解，除了對 2015 年土耳其將俄羅斯軍機擊落一事道歉，土耳其也同意向俄羅斯購買 S400 防空系統，這也導致土耳其和美國協議的 F-35 戰機購買協議作廢；其次，和俄羅斯的諒解也讓土耳其和敘利亞、伊朗進行外交談判，上述行為意味著土耳其改變從 1980 年代以來土耳其所遵循的新奧斯曼主義外交政策，但在本質上仍然採取務實的手段，並未完全背離和西方國家以及美國的關係。(Akkoyunlu，2021：257-258)

從 2002 年到 2022 年，土耳其外交政策經歷和西方國家的蜜月期、阿拉伯之春以後土耳其的主動出擊以及後阿拉伯之春以後土耳其和傳統地緣政治的敵國俄羅斯、伊朗的和解，反映出土耳其認同的轉變，接下來的問題交處理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轉變是否還能以新奧斯曼主義加以解釋，本文將先處理埃爾多安的世界觀以及正義與發展黨的新奧斯曼主義論述。

埃爾多安的世界觀構築了他對新奧斯曼主義的理解，他的世界觀可以分成兩部分：其一為他對伊斯蘭以及歷史的理解；其二為他對鄂圖曼帝國的了解以及對鄂圖曼帝國這個符號的運用，他對鄂圖曼帝國的理解與其說從學術上重新反思鄂圖曼帝國的意義，倒不如說是基於特定政治需求而重新詮釋鄂圖曼帝國史，重新詮釋的過程中同樣建構了埃爾多安本人乃至土耳其的自我認同。

(Yavuz，2020：146)

埃爾多安的伊斯蘭觀念以及歷史觀受到土耳其詩人、伊斯蘭思想家法齊爾 (Necip Fazıl) 的影響。法齊爾認為整個鄂圖曼帝國史應該等同於「純粹的伊斯蘭史」，他在著作中也強調，土耳其應該作為伊斯蘭的「劍與盾」，捍衛伊斯

蘭境域 (Islamdom) 免於遭到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除了西方帝國主義，法齊爾也痛批阿拉伯人對伊斯蘭的詮釋，認為他們過度將伊斯蘭和阿拉伯劃上等號，他認為，詩作等文學作品才是推動社會變遷最有利的動力。(Yavuz, 2020: 86-87)

對埃爾多安來說，他認同法齊爾將伊斯蘭視為對抗世俗派的力量，他曾經稱呼土耳其境內的什葉派阿拉維派 (Alavi) 為受到汙染的族群 (土文為 cünüp, 有影射性交後身體不潔的意思)。亞伍茲 (2020) 指出，埃爾多安的伊斯蘭觀更像是把宗教當成操控大眾以及管理社會的方式，因此，不僅是凱末爾主義者，即便同樣是伊斯蘭團體，也可能因為政治議題而受到埃爾多安的針對。

有些土耳其人將埃爾多安和鄂圖曼帝國晚期的統治者阿卜杜哈密德二世做比較，認為兩者同樣都質疑西方化政策，懷疑西方化是否能讓國家變得更好，在這方面，埃爾多安認為西方化會對土耳其—穆斯林社會在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更成威脅；其次，埃爾多安跟阿卜杜哈密德二世一樣都是以開明、自由派的身分執政，隨著權力穩固，兩者都卸下開明的身分，開始打壓異議分子。埃爾多安也會拿這段時期的歷史來比喻，他曾以當時土耳其流行的電視劇《阿卜杜哈密德二世》(Payitaht: Abdülhamid) 為例，試圖重新詮釋阿卜杜哈密德二世以解釋當代土耳其所面對的問題，同時他也自比為捍衛國家、對抗外來者的角色，以透過民粹主義的方式吸引民眾的同情。(Yavuz, 2020: 147-149)

土耳其史觀察家阿姆斯壯 (William Armstrong) 認為，當代土耳其刻意將阿卜杜哈密德二世神格化，將他塑造成對抗西方帝國主義、捍衛伊斯蘭世界的領袖以滿足當代土耳其政府想要建立文明復興的敘事，並將埃爾多安描述成和阿卜杜哈密德二世有類似處境的統治者，藉以合理化他集中權力的行為。

(Yavuz, 2020: 151) 但這樣的塑造和歷史上阿卜杜哈密德二世的實際作為有落差，雖然阿卜杜哈密德二世執政後封閉憲法、打壓異議人士，但他仍延續過去幾任執政者的改革措施，開辦新式教育以及強化國家國防和教育體制，同時

他也不排斥西方文化，僅僅是根據當下為了鞏固帝國的需求而採取集中權力、打壓異己的措施。

亞伍茲（2020）認為，埃爾多安以及支持他的媒體透過將阿卜杜哈密德二世塑造成他的理想模範，其用意在於將伊斯蘭認同政治化，對外建構土耳其自身認同、和西方國家保持等距關係，對內則以伊斯蘭的名義打擊政敵。與過去幾任土耳其領導人相比，埃爾多安反過來強調洛桑條約中土耳其所喪失的領土、念茲在茲摩蘇爾、阿勒坡等地，他也鼓勵土耳其國民以做為一個土耳其人以及穆斯林為榮，強調「大土耳其」（Greater Turkey）的理念。

在戰略論述層面，埃爾多安特別著重在早期鄂圖曼帝國史，他受到加齊精神（Gaza）的影響，認為早期土耳其人是伊斯蘭文明的捍衛者、也是鄂圖曼帝國的統治者；相較之下，他認為凱末爾主義讓土耳其變得更衰弱。埃爾多安也透過 2015 年 5 月 30 日君士坦丁堡被攻陷 562 周年時的公開講話，強調土耳其人的歷史意識的同時，也暗示著土耳其外交政策不該保持被動，而是要讓土耳其在國際上變得更有分量。（Yavuz, 2020: 155）¹⁷

實際上埃爾多安的崛起、權力集中以及對阿卜杜哈密德二世時期鄂圖曼帝國史的強調反映出土耳其國內民意對世俗化政策態度的變化。建國之初為了形塑土耳其人的國家認同，凱末爾政府極力壓抑鄂圖曼帝國時期的歷史以及和伊斯蘭有關的符號，但隨著伊斯蘭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興起，重新檢視鄂圖曼歷史也成為民族主義者的重要任務，埃爾多安的崛起更讓這些潮流加以結合，透過一連串選戰的勝利，埃爾多安嘗試根據鄂圖曼、伊斯蘭理念重新定義共同體的分界，在族群方面實施「去族群化」（de-ethnicize），希望不要以土耳其和庫德族民族主義的角度建構國家認同，但另一方面他也實施「再伊斯蘭化」（re-

¹⁷ 對於早期鄂圖曼帝國的成因，學界有不同的看法，一派認為早期鄂圖曼帝國的發展受到拜占庭、希臘的影響比較深，一派強調鄂圖曼帝國發源於早期突厥部落，這類學者強調鄂圖曼帝國的突厥屬性，另有一派重視早期鄂圖曼人的加齊精神，他們認為早期鄂圖曼人並非依靠突厥聯繫擴大自己的勢力，而是訴諸於聖戰精神，藉此強化不足的凝聚力。

Islamicize)，強調伊斯蘭作為團結國家的價值以及鄂圖曼帝國作為國民之間共同的歷史，透過兩種手段埃爾多安重新調整新奧斯曼主義的概念。(Yavuz，2020：156)

除了埃爾多安，前總理、前外交部長達武特奧盧的外交政策理念也影響土耳其的戰略規劃以及新奧斯曼主義外交政策，儘管他在 2016 年以後辭職下台，但他任內做出的外交政策規劃仍影響之後土耳其的戰略構思。

除了第一章所提到的概念，達武特奧盧曾就人類文明轉型時會遇到的危機提出他的看法：

所有人 (All of Humanity) 都尋求新穎的事物，因而 (人類文明) 急需維繫。國際秩序正陷入崩潰，且已經失去回應危機的能力。科技的進步不僅能大幅影響生物，也能影響人類精神以及心理的未來。我們比以往更需要哲學及智識上的研究，我們需要找出新的對策。(Yavuz，2020：184-185)

他強調，這不只是國際關係或國際政治的問題，而是在於要建立新的思維方式。基於上述的前提，達武特奧盧提出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新方向，他認為土耳其會在 2023 年的時候成為世界前 10 大經濟體，到時候土耳其要和歐亞大陸個強權競爭，因此，土耳其不能夠隔絕自己和周邊國家，而是要和能夠代表人民意志的國家合作以共創未來。在這樣的情況下，土耳其將致力於和周邊國家發展共同歷史背景的合作關係，並以此為基礎開拓新的政治藍圖以及在恢復人類文明上扮演主要角色。(Yavuz，2020：185)

達武特奧盧認為，土耳其不能只是北約的馬前卒，而是要成為區域政治的中心。土耳其不能僅滿足做為文明之間的橋樑，而是要成為伊斯蘭文明的中心。在第一章所提到的戰略縱深的論述中，達武特奧盧認為土耳其是地緣—文化的中心，這裡所指的地緣—文化為伊斯蘭—鄂圖曼文化，他認為土耳其應該

善用地理上的優勢以及鄂圖曼帝國史的歷史重要性成為國際體系中重要的「玩家」，他認為當代土耳其一就是具有多元認同的國家：

從地理上來說，土耳其佔有獨特的空間。作為在歐亞非地帶中龐大的國家，土耳其該被定義成具有多樣區域認同的中央國家（Central Country）而非被化約為僅具備單一特徵的國家。如同俄羅斯、伊朗、德國以及埃及，土耳其不能在地緣或文化上等同於單一區域，土耳其多樣的區域特徵使其能同時在不同區域發揮作用，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土耳其已在周邊區域控制了期能發揮影響力的區域。（Yavuz，2020：185-186）

2011年，他在土耳其 NGO Türk Ocakları 的大會中曾強調要關注過去曾被鄂圖曼帝國所統治的地方，即便這些地方日後已成立新的國家。¹⁸達武特奧盧跟埃爾多安一樣都相信能夠在鄂圖曼的基礎上建立「大土耳其」（Great Turkey），作為土耳其著名的國際關係學者以及地緣政治學者，達武特奧盧明白要如何在國際舞台上讓土耳其的地緣政治的優勢發揮出來。但亞伍茲（2020）認為，達武特奧盧同樣也將鄂圖曼帝國浪漫化，無視新奧斯曼主在現實層面會碰到的障礙，他對鄂圖曼帝國史的概念也是建立在東、西方二元對立的基礎，而忽略在現實中鄂圖曼帝國和西方國家關係的複雜性。

雖然達武特奧盧任內制定並規劃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方針，但在執行以及調整上還是以埃爾多安為主，而埃爾多安時期的新奧斯曼主義部分受到土耳其以外的因素限制或影響，例如賽普勒斯問題、土耳其和庫德工人黨的衝突以及土耳其入歐盟遭到拒絕，這些因素導致埃爾多安重新調整新奧斯曼主義外交政

¹⁸Türk Ocakları 成立於 1912 年，旨在提倡土耳其人民文化、歷史及語言的保存。目前中文界並沒有 Türk Ocakları 的對應詞彙，從土耳其詞源來看，Türk Ocakları 可能源自中亞遊牧民族帳篷中的爐灶，除象徵生生不息之外，也有聚會和組織的意思。

策，讓土耳其外交政策更朝向俄羅斯歐亞主義或現實主義。

若將厄札爾時期的新奧斯曼主義外交政策和埃爾多安時期新奧斯曼主義相比，會有幾點差異：一、厄札爾希望透過新奧斯曼主義的理念處理土耳其所面對的國際環境，重視的是土耳其所扮演的協調者身分，埃爾多安則是希望透過新奧斯曼主義重新定義土耳其的伊斯蘭以及鄂圖曼帝國性質；二、厄札爾重視多元主義、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能帶來國家間的合作，埃爾多安則強調民族主義、權力集中於國家；三、在看待鄂圖曼帝國史的部分，厄札爾強調鄂圖曼帝國寬容、包容多元文化的一面，而埃爾多安強調鄂圖曼帝國擴張、帝國權力以及軍事能力最強盛的時期；四、在外交途徑的部分，厄札爾和達武特奧盧均強調以談判代替武力解決，重視國家間的理解，而埃爾多安則強調外交手段的彈性、和西方國家保持等距以建構土耳其更為自主的角色。(Yavuz, 2020: 161-162)

第三節、阿拉伯之春、敘利亞與新奧斯曼主義

2010年12月17日，突尼西亞青年為抗議政府不公而自焚身亡，引爆全中東的抗議浪潮，先後延燒到埃及、利比亞、葉門、敘利亞等國，其中埃及、利比亞的強人政權遭到推翻，而敘利亞則陷入內戰，美國、俄羅斯、土耳其、伊朗等國甚至支持不同的武裝組織以達成各國在地緣政治上的目標。對於土耳其而言，阿拉伯之春是對其新奧斯曼主義外交政策的最大考驗，一方面土耳其希望和周邊各國建構相互合作的關係，一方面土耳其也必須考量阿拉伯國家如何回應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土耳其也希望解決庫德族問題，藉以鞏固土耳其的國家安全。

敘利亞是土耳其在中東外交政策的最大挑戰，一方面兩國有邊界的主權歸屬之爭（如兩國交界的哈泰伊省），另一方面敘利亞政府也支持庫德工人黨，這導致土耳其和敘利亞的關係一直以來都不好。正義與發展黨上台以後，兩國的關係雖然降溫，但造成衝突的隱憂並未解決，反而成為未爆彈，並在敘利亞內

戰、伊斯蘭國崛起之後引爆。

對於土耳其來說，阿拉伯之春涉及兩種價值之爭，其一是支持民主、信奉伊斯蘭主義的平民百姓和知識份子，包含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其二為堅信世俗主義但採取威權統治的統治者，尤其是敘利亞的阿薩德家族。為了推廣新奧斯曼主義外交政策以及土耳其模式，土耳其選擇前者，這樣一來也能塑造土耳其在遜尼派伊斯蘭國家中的領導地位。(Yavuz, 2020: 229-230)

儘管如此，敘利亞的演變越來越失控，超出各國的預期。根據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的統計，截至 2022 年為止，共有超過 30 萬名敘利亞人死於內戰；而根據聯合國難民署 (UNHCR) 的統計，從 2011 年至今，共有超過 1400 萬名敘利亞人離開原本居住的地方以尋求安全、敘利亞境內有超過 680 萬人居無定所，內戰也造成約 550 萬人成為難民，分別在土耳其、黎巴嫩、約旦、伊拉克及埃及尋求庇護。¹⁹

根據美國國會提出的報告，敘利亞內戰可以分為幾個階段：從 2011 到 2013 年間，敘利亞國內由民眾組成的抗爭團體演變為武裝組織，其中反對阿薩德政權的前敘利亞軍人組成自由敘利亞軍 (Free Syrian Army)，希望能夠統合國內所有反對派的武裝力量，但因為利益分歧，實際上能管控的部分有限；除此之外，伊斯蘭國也在這段期間崛起，部分成員前往敘利亞，和在地協力者合作，成立努斯拉陣線 (Nusra Front)。²⁰

從 2012 年以後，隨著阿薩德政府軍升高常規武力，促使反抗軍加大攻擊、

¹⁹ 有關內戰造成的傷亡以及難民人數，請見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UN Human Rights Office estimates more than 306,000 civilians were killed over 10 years in Syria conflict” (2022/6/28)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2/06/un-human-rights-office-estimates-more-306000-civilians-were-killed-over-10> ; USA for UNHCR, “Syria Refugee Crisis Explained” (2023/3/14) <https://www.unrefugees.org/news/syria-refugee-crisis-explained/> .

²⁰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Syria Conflict Overview: 2011-2021” (2021/02/10)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F/IF11080>

導致國內局勢惡化，也給予美國、俄羅斯、土耳其等國干預的空間。隨著反抗軍節節勝利，也迫使阿薩德政府為了保全政權而和黎巴嫩真主黨(Hezbollah)、俄羅斯和伊朗合作，美國、土耳其、歐盟和海灣國家則支持反抗軍。從2014年起，為了因應伊斯蘭國的崛起，美國聯合多國發動堅定決心行動(Operation Inherent Resolve)，根據美國國防部的統計，從2014年到2017年，美國所花費的軍費來到143億美元，對伊拉克、敘利亞分別執行超過1萬3,331次、1萬1,235空襲，但因為美國和伊拉克和敘利亞的庫德族合作，行動也讓土耳其感到不安，並引起兩國之間的紛爭。²¹

當時土耳其和美國的目標並不一致，對美國來說，首要目標是要打擊恐怖主義，因此在地庫德族盟友的合作對美國來說是相當重要的，美國也和庫德族人民防衛軍(People's Defense Units，以下簡稱YPG)合作，但對土耳其來說，人民防衛軍以及民主聯盟黨(Democratic Union Party，以下簡稱PYD)都和庫德工人黨有串通，但土耳其認為美國並未重視土國的國家安全，以對土耳其的安全構成威脅。另一方面，土耳其原本希望能夠利用人民對政權的不滿促使阿薩德政權採取民主及和平的政治改革，但這樣的建議並未被敘利亞政府聽見，這導致土耳其決定支持反抗軍，試圖推翻敘利亞政府。

土耳其最初拉攏敘利亞境內數個庫德族組織，包含庫德族民主聯盟黨，庫德族也像土耳其提出要求，希望能夠維持自治，但兩方對此沒有達成共識，造成協商破裂，庫德族也變成土耳其政府要打擊的目標。種種跡象最終迫使土耳其政府修正過去所提倡的「零問題外交」，開始採取軍事干預的手段。(Ozpek, Burak Bilgehan，2014：339)

2016年8月24日，土耳其宣布，根據聯合國憲章第51條行駛自衛權(Self-defense right)，並對敘利亞北部發動「幼發拉底之盾行動」(Euphrates

²¹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peration Inherent Resolve: Targeted Operations to Defeat ISIS" <https://dod.defense.gov/OIR/>

Shield Operation)，一方面要打擊伊斯蘭國，另一方面也要打擊庫德工人黨以及民主聯盟黨（PYD），藉以建立緩衝區以保障土耳其的邊界安全。軍事行動共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以敘利亞阿勒波省（Aleppo）的賈拉布魯斯

（Jarabulus）城市為主，土耳其動員 1500 名在地協力者敘利亞自由軍（Free Syrian Army）以及 300 名軍人對該城市的伊斯蘭國武裝分子發動攻擊，不久拿下該座城市。（Cantinar, Ömer Faruk ; Kozera, Cyprian Aleksander, 2022 : 353-354）

在對伊斯蘭國打擊的同時，土耳其也要求武裝組織敘利亞民主力量（Syrian Democratic Forces）、人民防衛軍退出幼發拉底河以東，時任美國副總統拜登為了鞏固反恐戰爭中土耳其的重要角色，也同意土耳其此時的訴求，要求這兩個組織撤回去，否則美國不會提供支援。²²

接著，土耳其於同年 9 月 3 日對伊斯蘭國在敘利亞北部的城鎮拉伊（al-Rai）、10 月 15 日對達比克（Dabiq）發動攻勢，並在隔日宣布拿下該城，此攻勢也意味著伊斯蘭國發跡以來重大的挫敗，因為該城是伊斯蘭國最初發跡時最重要的根據地。（Cantinar, Ömer Faruk ; Kozera, Cyprian Aleksander, 2022 : 355）

從 2016 年 11 月起，土耳其以及敘利亞自由軍對伊斯蘭國的第二個根據地巴卜（Al-Bab）發動攻擊，在這次行動中，土耳其和美國對於軍事行動要拓展的範圍意見並不一致，美國同意土耳其從其國界向外拓展 20 到 25 公里，但土耳其希望的是取得巴卜並鞏固土耳其對當地的治理，一方面能清除伊斯蘭國的勢力，另一方面土耳其也希望能降低庫德族對其國家安全的威脅，一旦土耳其的手段達成，就能造成既定事實，即便美國有意見，也不至於會影響土耳其的

²²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and Turkish Prime Minister Binali Yildirim at a Press Availability" (2016/08/25),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6/08/25/remarks-vice-president-joe-biden-and-turkish-prime-minister-binali>

行動。²³

除了美土關係，在「幼發拉底之盾行動」中，土耳其的外交進展還包含和俄羅斯諒解，除了調解在 2015 年土耳其擊落俄羅斯軍機所造成的兩國糾紛外，土耳其內部政變失敗也讓該國和西方國家的關係趨於緊張，為了突破僵局，同時也鞏固古爾其國內政治的穩定，改善和俄羅斯的外交關係成為此時土耳其重要的選擇，這也有助於土耳其建構其在中東的外交政策以避免樹立太多敵人。

為了進一步鞏固土耳其在敘利亞北部的安全地帶，土耳其於 2018 年又策畫「橄欖枝行動」(Operation Olive Branch)，除了掃除伊斯蘭國的勢力，也打算藉機清除民主聯盟黨和庫德工人黨的威脅。根據外交部長恰武什奧盧 (Mevlüt Çavuşoğlu) 的說法：

伊斯蘭國 (Daesh) 已經在軍事上被重重地挫敗，但這不只是因為美國所訓練、提供裝備的團體給予最後一擊。他們 (伊斯蘭國) 是被伊拉克軍隊以及在土耳其境內運作的全球聯盟所擊敗的。自土耳其為北約唯一一個在敘利亞北部城市賈拉布魯斯直接參與 (軍事行動) 一且不意外的壓制，伊斯蘭國的弱點就暴露出來。在包含土耳其在內的聯盟的合作下，藉由將外國恐怖份子列入黑名單以及全世界最大的反伊斯蘭國安全行動，以預防伊斯蘭國捲土重來。²⁴

土耳其的計畫是，透過軍事行動控制敘利亞北部的城市阿夫林 (Afrin)，以將庫德族的勢力趕往敘利亞境內。為了爭取他國的支持，土耳其和俄羅斯協商，利用俄羅斯和敘利亞有軍事上合作的因素，爭取俄羅斯的「綠燈」，以讓土耳其

²³ Sinan Ülgen ; Can Kasapoğlu, "Operation Euphrates Shield: Aims and Gains" (2017/01/09), <https://carnegieeurope.eu/2017/01/19/operation-euphrates-shield-aims-and-gains-pub-67754>

²⁴ Mevlüt Çavuşoğlu, "The Meaning of Operation Olive Branch" (2018/04/05), https://www.mfa.gov.tr/article-by-h_e_-mr_-mevlut-cavusoglu_-the-minister-of-foreign-affairs-of-turkey-the-_meaning_-of-operation-olive-branch.en.mfa

能夠使用俄羅斯所控制的、敘利亞西部的空域。(Can Kasapoğlu, Sinan Ülgen, 2018: 3)

另一方面，美國的態度同樣也很重要，尤其民主聯盟黨是美國在敘利亞的重要盟友，假如要對人民防衛軍動武，則土耳其要確保美國不會干預，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和時任美國總統川普在電話中確認所謂的「曼比齊路徑」

(Manbij)，除了同意讓美軍和土軍在「幼發拉底河之盾」地區以及曼比齊進行共同巡邏外，土耳其也換取美國要求讓人民防衛軍從該地區撤軍，並同意由當地的阿拉伯人建立委員會以穩定當地局勢。²⁵

透過拉近和俄羅斯的關係、爭取美國的支持，土耳其重新建構相當靈活的外交途徑，一方面向北約以及西方國家保證土耳其是他們在中東重要的盟友，另一方面也成功和俄羅斯達成經濟和能源上的合作，以擴大土耳其的經濟利得，並確保和俄羅斯之間富有彈性的外交關係。

為了在土耳其和敘利亞之間建立緩衝區，土耳其在 2019 年 10 月對敘利亞北部發動「和平之泉行動」(Peace Spring Operation)，土耳其在此行動有兩個主要目標，其一為透過軍事手段遏止民主聯盟黨獨立建國的可能性；其二是要建立緩衝區，一勞永逸的解決敘利亞內戰造成大量難民的問題。(Serhat Erkmen, Gendarmerie and Coast Guard Academy, 2020: 03)

儘管美國並未對土耳其的軍事行動表示支持，但也未明確反對，此舉等於是為土耳其的行動開綠燈。在行動的幾天內，土軍達成幾點目標：一、確保民主聯盟黨在短期內不會獨立建國，儘管人民防衛軍仍控制諸多要地，但其實力已經被削弱，隨時都有可能遭到敘利亞政府軍的攻擊，因此短期內民主聯盟黨並不會有大動作；二、土耳其在軍事行動中擴大的領土使其能安置敘利亞難民；三、在外交層面上土耳其認為俄羅斯和該國的共同利益比美國還要多，隨

²⁵ Hurriyet Daily News, “Trump, Erdoğan confirm commitment to Manbij roadmap in phone call” (2018/06/27) <https://www.hurriyetdailynews.com/trump-erdogan-confirm-commitment-to-manbij-roadmap-in-phone-call-133835>

著人民防衛軍的實力下滑，俄羅斯在中東的影響力也大幅提升。(Serhat Erkmen, Gendarmerie and Coast Guard Academy, 2020 : 05)

透過上述三個行動，土耳其成功在敘利亞北部一帶建立緩衝區，儘管當地仍有安全疑慮，但土耳其已經能夠在當地進行建設以及安置難民。在外交層面上，土耳其擺脫厄札爾時期依賴西方國家的外交立場，著重於按照自身安全的需求採取獨斷的外交政策，並拉近和俄羅斯以及伊朗的關係以確保自身的經濟及政治利益。從建構主義的角度來看，土耳其在回應阿拉伯之春、伊斯蘭國以及美俄等強權的過程中重新建構自身的國家認同，阿拉伯之春爆發的時候土耳其重視自身作為中東民主典範，但隨著敘利亞內戰爆發，土耳其模式並未被周邊國家接受，這促使土耳其調整自身的認同，以大膽且侵略的手段凸顯出土耳其在中東的重要性，也更加重視自身的需求。

從新奧斯曼主義的角度來看，土耳其並未放棄 1980 年代以來新奧斯曼主義所強調共同歷史、伊斯蘭價值的角色，但在不穩定的地緣政治環境以及強權政治下，阿拉伯之春夏的土耳其仍傾向以新現實主義的方式去理解新奧斯曼主義，並以此作為和敘利亞、美國及俄羅斯互動的方式。

第四節、新奧斯曼主義與埃爾多安的中亞外交政策

除了中東，中亞也是土耳其外交政策中重要的一部份。從新奧斯曼主義的立場來看，土耳其和高加索以及中亞國家具有文化上的聯繫，因此，對於土耳其來說，和這些國家擴大關係除了能加強自身在伊斯蘭以及突厥國家之間的聲望，同時也能加強和這些國家的能源合作、避免讓自己過度依賴俄羅斯以及中東的能源。

蘇聯解體以後，土耳其試圖拉近和中亞國家的關係並提倡「土耳其模式」，但成效不彰，這受到幾個因素影響：一、1990 年代土耳其國力不強、經濟發展程度不高，難以提供中亞其他國家實質的經濟及政治利益，土耳其也很難從中

亞國家獲得足夠的經濟收益；二、中亞國家的歷史發展和政治體制和土耳其不同，土耳其模式對於這些國家的執政者來說並沒有吸引力；三、對中亞國家而言，他們希望和所有國家建立平等的國際關係，但土耳其的態度讓中亞國家認為土耳其想以「老大哥」的姿態和他們互動；四、俄羅斯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還在，尤其是在 911 事件後，俄羅斯總統普丁藉由反恐議題拉近俄羅斯和中亞國家在政治、經濟等層面的關係。(Stephen, 2003: 100-101)

2001 年美國爆發 911 事件，土耳其和中亞國家的關係出現轉變，一方面中亞國家均面對國際恐怖主義的威脅，土耳其利用此機會向烏茲別克提供軍事協助，包含訓練以及提供烏茲別克軍隊反恐所需要的裝備；另一方面，土耳其也利用美國反恐戰爭的戰略規劃，增加該國在中亞、高加索以及阿富汗等地區的曝光度，土耳其也同意派遣軍隊到阿富汗，希望增加該國在國際安全援助部隊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ssistance Force, 簡稱 ISAF) 的影響力。(Stephen, 2003: 103-104)

正義與發展黨上台以後，土耳其採取比較務實的態度處理和中亞國家的關係，在 2002 年到 2014 年間，土耳其的中亞政策旨在支持這些國家強化民主價值以及融入國際社群，並強調和鄰國建立合作及互惠的關係。2007 年前土耳其外長居爾當選總統後，積極推動和突厥國家間的外交關係，特別是拜訪特定突厥國家，與之前的總統或總理相比，居爾積極拜訪亞塞拜然、土庫曼等國家，並在 2009 年和亞塞拜然、哈薩克、吉爾吉斯簽訂《納希契凡協議》

(Nakhchivan Agreement) 同意成立突厥語國家合作委員會 (Cooperation Council of Turkic-Speaking States, 簡稱為 CCTS)，希望能夠建立土耳其和中亞國家之間在文化、歷史和語言之間的聯繫，突厥語國家合作委員會也做其他次級組織的保護傘，例如突厥語國家議會大會 (Parliamentary Assembly of Turkic-speaking countries)、突厥文化國際組織 (TURKSOY) 以及國際突厥學院

(Turkish Academy)。(Demir, Sertif; Eminoğlu, Ayça; Aslantürk, Arzu Y; Boyacıoğlu, Ebru Z., 2018: 400)

另一方面，土耳其透過中亞政策，也希望將該國轉變為能源中樞，除了能透過能源賺取大量利潤，也能在戰略上讓土耳其成為具有影響力的國家，同時確保自身的能源安全，降低受到國際原油價格、他國能源政策的影響。根據土耳其能源市場管理局（EPDK）公布的統計圖表，土耳其 2021 年的能源發電中，天然氣佔的比例最高，有 33.22%，其次為水力發電，有 16.71%，反映出土耳其對天然氣的依賴。（EPDK，2022：iv）除此之外，土耳其的天然氣主要從俄羅斯、伊朗以及亞塞拜然進口，其中土耳其和俄羅斯興建的藍溪天然氣管線在 2003 年開始運作，每年輸送 16BCM 的天然氣，是土耳其天然氣最大進口國。（Austvik；Rzayeva，2017：541）

為避免過度依賴俄羅斯的天然氣，土耳其也和周邊國家興建天然氣管線，其中裏海、土庫曼的油田蘊藏量豐富且品質高，也是土耳其分散風險的重點。為了分攤風險，土耳其透過兩條管線將裏海的天然氣以及原油輸送到土耳其，第一條是南高加索管線（也稱為 Baku–Tbilisi–Erzurum Pipeline, BTE pipeline），此條天然氣由亞塞拜然首都巴庫（Baku），經由喬治亞輸送到土耳其傑伊漢（Ceyhan），全長 690 公里，每年輸送約 6.6 億立方公尺的天然氣；另一條是巴庫—第比里斯—傑伊漢油管（Baku–Tbilisi–Ceyhan pipeline），路線和前者相似，但也運送部分來自哈薩克和土庫曼的原油。（Austvik；Rzayeva，2017：541）

2022 年俄烏戰爭的爆發也讓土耳其開始考慮進一步尋求和中亞能源國家的合作，降低對俄羅斯的依賴，一來能夠以此為籌碼，增加土耳其和歐盟談判的有利條件，二來也能透過能源轉運中心增加土耳其在能源方面的收入。地緣政治的改變導致土耳其成為能源以及物流運輸的中心，2014 年亞塞拜然、喬治亞等跨國運輸業共同成立「跨裏海國際運輸走廊」（Trans-Caspian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Route Middle Corridor，簡稱中部走廊或 TITR），透過鐵路、公路甚至航運的方式，串聯從中國、哈薩克等國，經由裏海到歐洲國家的路線，能夠避

開俄羅斯，且更穩定。²⁶

隨著戰爭的爆發，中部走廊的重要性也大幅提升，土耳其所扮演的角色也越來越重要，加上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使得土耳其在中亞和高加索地區的影響力也提升。德國國際與安全研究所（Germ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指出（2022），在中部走廊中，位於哈薩克的跨哈薩克鐵路（Trans-Kazakhstan railroad）能夠比以往省下約 1000 公里的車程，2017 年才完工的巴庫—第比里斯—卡爾斯鐵路（Baku–Tbilisi–Kars），串聯亞塞拜然、喬治亞和土耳其的鐵路運輸，讓土耳其和高加索國家間的運輸變得更有效率。

對土耳其來說，中部走廊的崛起有助於降低該國對俄羅斯以及伊朗的依賴，土耳其也希望能透過中部走廊從俄羅斯的運輸路線中吸收約 30% 的物流，要達到這個目的還是要說服中亞國家中部走廊的倡議是對他們有利的。國際情勢在 2014 年因為烏克蘭危機而有所變化，俄羅斯因為入侵烏克蘭而遭到國際的制裁，這導致過去在經濟上依賴俄羅斯的中亞國家必須另尋出路，土耳其、中國就成為最佳選擇。

除此之外，2020 年亞美尼亞、亞塞拜然戰爭也讓土耳其國產無人機 TB2（Bayraktar TB2）大放異彩，讓土耳其的硬實力大幅增加。俄烏戰爭爆發後，土耳其也利用這個機會和哈薩克以及烏茲別克發展戰略夥伴關係。

儘管如此，土耳其的中亞政策以及新奧斯曼主義外交政策仍面對諸多挑戰：一、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希望透過經濟上的合作、安全及反恐的互助（如上海合作組織）強化中國在中亞的影響力，對土耳其而言，一方面土耳其在經濟上相當依賴中國外資的投入，另一方面土耳其也想要加強自身的軟實力，要如何取捨是未來土耳其的難題；二、土耳其雖然是歐亞大陸的重要樞紐，但對於中亞國家而言土耳其並非唯一且最重要的區域強權，中國、伊朗甚至印度同

²⁶ Ilayda Nijhar, "With Russia focused on Ukraine, Turkiye positions itself as a key connector in Central Asia". (2022/11/21) . <https://odi.org/en/insights/with-russia-focused-on-ukraine-turkiye-positions-itself-as-a-key-connector-in-central-asia/>

樣也有辦法發揮影響力，要如何透過新奧斯曼主義的影響力建構土耳其和中亞國家之間的關係是未來土耳其的挑戰。



第六章、結論

第一節、研究發現

本文透過比較新奧斯曼主義和土耳其近代思潮，結合對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歷史性分析，可以總結為以下幾點：

一、新奧斯曼主義源自於土耳其對於該國在世界體系中的定位重新反思，並重新賦予自身在國際政治上的主體性，不再依靠任何一方。

土耳其外交政策中的身分認同可以追溯到 19 世紀鄂圖曼帝國，當時鄂圖曼帝國正逢內憂外患，對外有列強進逼，其中俄羅斯帝國想要打開黑海出海口、英國則想要捍衛通往印度的帝國生命線，導致鄂圖曼帝國成為諸多列強的目標，也迫使鄂圖曼帝國進行改革，建立現代化的國家體制。

另一方面，法國大革命後歐洲民族主義的思潮也影響到鄂圖曼帝國境內不同族裔，鄂圖曼帝國試圖以「奧斯曼主義」的方式建立官方民族主義，強調所有臣民在法律、社會及經濟上平等，但這樣的措施卻因為巴爾幹民族主義而有限，隨著列強干涉以及諸多民族的獨立建國，鄂圖曼帝國轉而訴諸於伊斯蘭主義，然而這樣的號召力本身也有限，最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土耳其執政菁英才以土耳其民族為主體，建立單一民族國家，代價就是犧牲國內少數族裔的主體性，如庫德族。

從外交政策的角度來看，地緣政治的不穩定以及和列強的國力差距，都讓土耳其在外交上採取較為謹慎的手段，較少依賴武力。1923 年建國以後，土耳其首先採取偏向孤立的外交政策，此時期的目標著重在重建國家社會經濟、保持領土完整；二次大戰以後，蘇聯的擴張迫使土耳其思考是否和西方國家重新結盟，最終在韓戰中土耳其藉由承諾出兵以換取美國的援助以及支持土耳其加入北約，在冷戰期間土耳其大致上和西方國家保持一致的外交立場，但 1974 年賽普勒斯問題以及庫德族議題都造成土耳其和西方國家之間的不和諧。

蘇聯解體以後，土耳其失去地緣政治的威脅，對於西方國家來說土耳其的重要性也大幅下降，因此，要如何重新建立土耳其的國家形象、國家認同以及在國際政治中的定位是當時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在這個脈絡下厄札爾政府提出了「新奧斯曼主義」的概念。

二、新奧斯曼主義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詮釋，從親西方、自由主義的立場轉向親俄羅斯、重視自身安全的中間路線。

從 1983 年厄札爾執政開始，土耳其開始強調鄂圖曼過去的歷史以及伊斯蘭信仰對國民認同的塑造，並以此作為和他國交往時重要的共同基礎，尤其是巴爾幹國家、中亞國家以及阿拉伯國家。受到當時全球的新自由主義影響，厄札爾任內採取新自由主義政策，一方面放寬對國內的管制，另一方面也強調土耳其模式是整合不同文化國家的重要方法，有助於讓這些國家融入國際體系。

隨著正義與發展黨上台，土耳其改變過去親西方國家的態度，開始強調戰略和外交上的自主性，對內降低凱末爾主義以及軍方的影響力，對外則拉攏歐亞大陸各強權，例如俄羅斯和伊朗，以平衡土耳其和強權之間的關係。而在正義與發展黨執政期間，土耳其的新奧斯曼主義又可以分成兩個階段：從 2002 年到 2016 年，土耳其的戰略構思和外交政策相對溫和且親西方，特別是在達武特奧盧擔任外交部長以及總理期間，土耳其推行土耳其模式、零問題外交和戰略縱深，希望建構安全且友好的鄰國關係。

但隨著局勢惡化，加上難民潮、恐怖主義等問題，土耳其的對外政策趨於強勢，尤其是埃爾多安擔任總統以及修憲之後，土耳其在不同議題上和歐盟以及美國有不同意見，例如賽普勒斯、巴勒斯坦甚至瑞典加入北約一案，同時土耳其在敘利亞議題上尋求和俄羅斯的幫助、經濟及能源上對俄羅斯的依賴也讓西方國家擔心土耳其是否會改變立場，轉而站在俄羅斯那一邊。

如果分析土耳其建國初期到當代正義與發展黨的新奧斯曼主義外交政策，就會發現，不同時期土耳其的外交政策都是遵從同樣的邏輯，也就是根據國際

情勢選擇符合當下土耳其身分及利益需要的政策，不會盲從單一意識形態及價值，即便是在冷戰期間，土耳其仍在巴勒斯坦議題上偏向阿拉伯人、賽普勒斯議題上支持土耳其裔賽普勒斯人，而不同執政黨、不同時期的外交政策僅代表的是土耳其採用的手段差別。

第二節、後續研究建議

以新奧斯曼主義來分析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仍有不足之處，包含：一、可能忽視其他意識形態發揮的作用，例如歐亞主義（Euroasianism）、泛突厥主義，因此後續的研究可以聚焦在新奧斯曼主義、歐亞主義以及泛突厥主義對當代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影響。

除此之外，中國的一帶一路、俄烏戰爭都對中亞、高加索的地緣政治構成挑戰，從新奧斯曼主義的角度來看，要如何回應這些挑戰同時強調土耳其的重要性也是後續研究值得聚焦的地方。

參考文獻

一、中文專書

Ahmad, Feroz 著，鄭東超譯（2020）。《現代土耳其的形成》，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Caroline Finkel 著，徐大成、于麗譯（2019）。《奧斯曼帝國（1299-1923）》，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Kemal Haşim Karpat 著，陳和豐譯（1992）。《當代中東的政治和社會思想》，北京：中國社科出版。

Wendt, Alexander 著，秦亞青譯（2000）。《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

朱傳忠（2018）。《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研究》，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哈全安、周術情（2010）。《土耳其共和國政治民主化進程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咎濤（2011）。《現代國家與民族建構：20世紀前期土耳其民族主義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咎濤（2022）。《從巴格達到伊斯坦布爾：歷史視野下的中東大變局》，北京：中信出版社。

張錫模（2004）。《中亞區域安全淨評估》，臺北市：遠景基金會。

張國城（2020）。《美國的決斷》，新北市：八旗文化。

土肥恆之（2018）。《搖擺於歐亞間的沙皇們：俄羅斯·羅曼諾夫王朝的大地》，新北市：八旗文化。

黃達遠、李如東主編（2020）。《區域視野下的中亞研究：範式與轉向》，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柯嬌燕，〈歐亞帝國的早期近代複合體〉，陳恆、王劉純主編，《新史學第十六輯：前近代清朝與奧斯曼帝國的比較研究》：24-42，河南：大象出版社。

楊成，〈去俄羅斯化、在地化與國際化：後蘇聯時期中亞新獨立國家個體與集體身分的生成和鞏固路徑分析〉，黃達遠、李如東主編，《區域視野下的中亞研究》：296-36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二、中文期刊論文：

宋斌（2018）。「從泛突厥主義到新奧斯曼主義——論冷戰後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調整」，南京師大學報，2018年第3期，頁82-89。

咎濤（2008）。「土耳其的民族主義與現代化——論齊亞·格爾卡普托古改制式的民族主義」，西亞非洲，2008年第8期，頁19-25。

咎濤（2012）。「土耳其模式：歷史與現實」，新疆師範大學學報，第33期，

咎濤（2012）。「奧斯曼、伊斯蘭還是土耳其？——淺析土耳其獨立運動的革命話語問題」，西亞非洲，2012年第1期，頁128-138。

-
- 咎濤(2015)。「土耳其、歐亞主義與絲綢之路經濟帶——一則思想史的側記」，中國圖書評論，2015年第9期，頁16-20。
- 咎濤(2015)。「從歷史角度看土耳其的多邊主義戰略」，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年第1期，頁52-66。
- 馬細譜(2016)。「新奧斯曼主義與土耳其的戰略佈局」，學術前言，2016年第6期，頁88-95。
- 張向榮(2018)。「新奧斯曼主義：歷史嬗變與影響」，新疆社會科學(漢文版)，2018年第2期，頁108-118。
- 張向榮(2021)。「正義與發展黨執政以來土耳其的巴爾幹政策新變化」，西亞非洲，2021年第6期，頁84-114。
- 張來儀(2008)。「21世紀以來的俄羅斯與土耳其關係」，西亞非洲，2008年第8期，頁37-41。
- 楊張鋒(2017)。「新奧斯曼主義影響下的土耳其外交」，商丘師範學院學報，2017年第2期，頁80-82。
- 劉中民(2008)。「從原始共同體到民族共同體——齊亞·格爾卡普的土耳其民族主義思想研究(上)」，西亞非洲，2008年第8期，頁26-30。
- 劉中民(2008)。「從普世主義與帝國傳統走向民族主義——齊亞·格爾卡普的土耳其民族主義思想研究(下)」，西亞非洲，2008年第9期，頁38-43。
- 陳牧民(2016)。「由歷史角度看土耳其庫德族問題與現況」，台灣國際研究季刊，2016年第12卷第1期，頁79-96。
- 范盛保(2016)。「土耳其史觀的外交政策」，台灣國際研究季刊，2016年第12卷第1期，頁97-115。

三、英文專書：

Ahmad, Feroz (2003). *The making of modern Turkey*. London ; New York,

NY : Routledge

Ahmad, Feroz (2014) . *The Young Turks and the Ottoman Nationalities:*

Armenians, Greeks, Albanians, Jews, and Arabs, 1908–1918. US :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Akşin, Sina.; Mursaloğlu, Dexter H. (2007) . *Turkey 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 : the emergence of the Turkish nation from 1789 to

the present. London : Hurst & Co.

Alaranta, Toni. (2015) . *National and State Identity in Turke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public's Statu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US :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Allison, Graham T. (1971) . *Essence of decision :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Boston : Little, Brown.

Alper Bulut ; T. Murat Yildirim (2020) . *Political Stability, Democracy And*

Agenda Dynamics In Turkey. US : Palgrave Macmillan.

Arafat, Alaa Al-Din (2020) .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owers in the Gulf*

Security. Cham :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Aras, Bülent. (2002) . *The new geopolitics of Eurasia and Turkey's position.*

London ; Portland, Or. : F. Cass.

Buzan, B ; Gonzalez-Pelaez, A; Buzan, Barry ; Gonzalez-Pelaez, Ana (2009) .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Middle East: English School Theory at the

Regional Level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Cenap Çakmak, ; Ali Onur Özçelik ; Nakamura, Yoko (2019) . *The World*

Community and the Arab Spring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Davutoğlu, Ahmet (1993) . *Alternative Paradigms.* London :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DeLamater, John D ed (2003)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

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

Duygu Bazoğlu Sezer. “Russia: The Challenges of Reconciling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with Economic Partnership.” In Barry Rubin and Kemal Kirisci, eds. *Turkey in World Politics : An Emerging Multiregional Power*.pp151-173.US:Lynne Rienner Publisher.

Ercan, Pinar Gözen (2017) .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egality and Global Reach* US : Palgrave Macmillan.

Findley, Carter V (1980) . *Bureaucratic reform in the Ottoman Empire : the Sublime Porte, 1789-1922*.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indley, Carter V (2010) . *Turkey, Islam, nationalism, and modernity : a history, 1789-2007*. Londo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Giddens, Anthony (1984) .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England : Polity Press.

Gürpınar, Doğan (2013) . *Ottoman/Turkish Visions of the Nation, 1860–1950* 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

Gürpınar, Doğan (2014) . *Ottoman imperial diplomacy: a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London : I.B.Tauris

Hale, William M (2012) . *Turkish Foreign Policy since 1774*. New York : Routledge.

Hale, William M, ; Ergun Özbudun (2010) . *Islamism, democracy and liberalism in Turkey: the case of the AKP*. New York : Routledge.

Hollis, Martin. (1994) .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England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şıksal, Hüseyin ; Oğuzhan Göksel (2018) . *Turkey's Relations with the Middle East: Political Encounters after the Arab Spring*. US :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 Ismael, Tareq Y.; Aydın, Mustafa. (2003) . *Turkey's foreign poli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a changing role in world politics*. Burlington, Vt. : Ashgate.
- Karpat, Kemal H (1996) . *Turkish foreign policy : recent developments*. Madison, Wis. :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Karpat, Kemal H (2000) . *Ottoman past and today's Turkey*. Leiden, The Netherlands.
- Kedourie, Sylvia. (1996) . *Turkey : identity, democracy, politics*. London : Frank Cass.
- Kedourie, Sylvia. (2000) . *Seventy-five years of the Turkish Republic*. London ; Portland, Or. : Frank Cass.
- Kemal Kirisci, "U.S-Turkish Relationships: New Uncertainties in a Renewed Partnership." In Barry Rubin and Kemal Kirisci, eds. *Turkey in World Politics : An Emerging Multiregional Power*.pp151-173.US:Lynne Rienner Publisher.
- Kösebalaban, Hasan (2011) .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slam, Nationalism, and Globalization* US : Palgrave Macmillan.
- Kurki, Milja.; Smith, Steve; Dunne, Timothy ed. (2010)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 discipline and diversity*. Oxford, U.K.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dau, Jacob M. (1995) . *Pan-Turkism: From Irredentism to Cooperation*. US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Larrabee, F. Stephen. (2003) .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Santa Monica, Calif. : Rand
- Lewis, Bernard (1969) .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2nd ed U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Mufti, M (2009) . *Daring and Caution in Turkish Strategic Culture: Republic at Sea* .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 Nachmani, Amikam (2009) . *Turkey--facing a new millennium : coping with intertwined conflicts.* , N.Y. :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Nuri Yurdusev, A. (2004) . *Ottoman Diplomacy: Conventional or Unconventiona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Özbudun, Ergun (2000) . *Contemporary Turkish Politics : challenges to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
- Özbudun, Ergun (2011) .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of Turkey: 1876 to the Present*, 1st ed. 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
- Özerdem, Alpaslan ; Matthew Whiting (2020) .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urkish Politics*, 1st ed. New York : Routledge.
- Ozoglu, Hakan ; Ezoglu, Hakan (2011) . *From Caliphate to Secular State: Power Struggle in the Early Turkish Republic*. Westport: ABC-CLIO, LLC.
- Parlar Dal, Emel (2018) . *Middle powers in global governance : the rise of Turkey*. Cham :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 Imprint: Palgrave Macmillan.
- Parlar Dal, Emel (19692020) . *Turkey's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21st Century*. US : Palgrave Macmillan.
- Rubin, Barry M. ; Metin Heper (2002) . *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 1st ed London : Routledge.
- Waltz, Kenneth (2018) .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endt, Alexander (1999) .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Yavuz, M. Hakan. (2020) . *Nostalgia for the Empire : The Politics of Neo-*

Ottomanism,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Yavuz, M. Hakan. (2021) . *Erdoğan: The Making of an Autocra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Yukselen, Hasan, (2020) . *Strategy and strategic discourse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Cham :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 Imprint: Palgrave
Macmillan

Yurdusev, A Nuri (2004) . *Ottoman Diplomacy: Conventional or
Unconventional?*. US : Palgrave Macmillan.

四、英文期刊論文

Akkoyunlu, Karabekir (2021) , “The five phases of turkey's foreign policy
under the akp”, *Social research.*, Vol.88 ,No.2, PP.243-270.

Balta, Evren, Soli Özel (2009) , “Turkey's Foreign Policy: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in a New Era”, *Social research.*, Vol.88 ,No.2, PP.539-560.

Bargu, Banu (2021) , “Neo-Ottomanism: An Alt-Right Formation from the
South?”, *Social research.*, Vol.88 ,No.2, PP..299-333.

Berenskoetter , Felix (2017) 。 “Ident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Ergin, Murat ; Karakaya, Yağmur (2017) , “Between neo-Ottomanism and
Ottomania: navigating state-led and popular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past”, *New perspectives on Turkey*, Vol.56, PP.33-59.

Erken, Ali (2013) , “Re-Imagining the Ottoman Past in Turkish Politics: Past
and Presentt”, *Insight Turkey*, Vol.15, No.3,PP. 171-188

Gontijo, Lorenzo C. B. ; Barbosa, Roberson S. (2020) , “Erdoğan’s
pragmatism and the ascension of AKP in Turkey: Islam and neo-
Ottomanism”, *Digest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29 ,No.1, PP.76-91.

Demir,Sertif ; Eminoğlu,Ayça ; Aslantürk,Arzu Y ; Boyacıoğlu,Ebru Z.

(2018) "The evolution of Turkey's foreign policy toward Turkish Republics post-1990s", *Trakya Üniversitesi Sosyal Bilimler Dergisi*, Vol.20 ,No.2,pp.387-407

Hoffmann, Clemens (2018) ,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as Orientalism: The geo-political ecology of crisis in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Vol.31 ,No.1, PP.94-104.

Hoffmann, Clemens (2019) , "Neo-Ottomanism, Eurasianism or securing the region? A longer view on Turkey's interventionism", *Conflict, security & development*, Vol.19 ,No.3, PP.301-307.

Hristov, Ivaylo (2019) , "Neo-ottomanism - emergence, ideology and political doctrine", *Social evolution & history*, Vol.18 ,No.1, PP.139-156.

Murariu, Mihai ; Anglițoiu, George (2020) , "Anatolian Security and Neo-Ottomanism: Turkey's Intervention in Syria", *Middle East policy*, Vol.27 ,No.2, PP.33-59.

Murinson, Alexander (2006) , "The Strategic Depth Doctrine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 *Middle East policy*, Vol.42 ,No.6, PP.945-964

Ozkan, Behlül (2014) , "Turkey, Davutoglu and the Idea of Pan-Islamism", *Survival (London)*, Vol.56 ,No.4, PP.119-140

Ozpek, Burak Bilgehan ; Demirag, Yelda (2014) , "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Arab Spring': from agenda-setter state to agenda-entrepreneur state", *Israel affairs*, Vol.20, No.3, pp328-346.

Pearson, W. Robert, Gonul Tol, Aaron Stein, Lisel Hintz (2018) , "Turkey's Emerging Role in the Middle East", *Middle east Policy*, Vol.25 ,No.2, PP.5-26.

Singer, J. David (1960) , "International Conflict Three Levels of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12 ,No.3, PP.453-461.

Singer, J. David (1961) , "The Level-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Vol.14 ,No.1, PP.77-92.

Kasapoğlu Can, Ülgen Sinan (2018), "Operation Olive Branch:: A Political – Military Assessment", *Centre for Economics and Foreign Policy Studies.*, , PP.01-14.

Torbakov, Igor (2017), "Neo-Ottomanism versus Neo-Eurasianism? Nationalism and Symbolic Geography in Postimperial Turkey and Russia", *Mediterranean quarterly.*, Vol.28 ,No.2, PP.125-145.

Yalvac, Faruk (2012), "Strategic Depth or Hegemonic Depth? A Critical Realist Analysis of Turkey's Position in the World Syste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6 ,No.2, PP.165-180.

Yalvac, Faruk (2014), "Approaches to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 Critical Realist Analysis", *Turkish studies*, Vol.15 ,No.1, PP.117-138.

Yanik, Lerna K (2009), "The Metamorphosis of Metaphors of Vision: "Bridging" Turkey's Location, Role and Identity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Geopolitics.*, Vol.14 ,No.3, PP.531-549.

Yavuz, M. Hakan (2016),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Neo-Ottomanism: Searching for a Post-National Vision", *Welt des Islams.*, Vol.56 , PP.139-156.

五、外文專書

Ahmet Davutoglu (2001) . *Stratejik Derinlik*, Istanbul : Küre Yayinlari.

松谷浩尚 (1987) . 《現代トルコの政治と外交》, 東京 : 勁草書房.

六、網路資料

Altin Raxhimi.2011, Davutoglu: 'I'm Not a Neo-Ottoman'

<https://balkaninsight.com/2011/04/26/davutoglu-i-m-not-a-neo-ottoman/> (August 21, 2023)

Gazete Duvar. 2022, Erdoğan declares 'Century of Turkey vision,' signaling new constitution <https://www.duvarenglish.com/erdogan-declares-century-of-turkey-constitution>

[vision-signaling-new-constitution-news-61481](#)(August 21, 2023)

Nicholas Danforth.2020, The Nonsense of “Neo-Ottomanism” (August 21, 2023)

Serhat Erkmén, Gendarmerie and Coast Guard Academy , ” Operation Peace Spring: Objectives, Current Situation and its Future” (2020/04/21) ,

<https://dam.gcsp.ch/files/doc/discussion-paper-syria-transition-challenges-project-2>

土耳其能源与自然资源部，(2022) ” T.C. ENERJİ PİYASASI DÜZENLEME KURUMU : Strateji Geliştirme Dairesi Başkanlığı”

駐安卡拉台北經濟及文化代表團，2022，〈土耳其促成糧食協議有助緩解僵局及供應困境〉，<https://www.roc-taiwan.org/tr/post/9417.html> (August 21, 2023)

駐安卡拉台北經濟及文化代表團，2022，〈土耳其對亞塞拜然天然氣輸往歐洲扮演關鍵角色〉，<https://www.roc-taiwan.org/tr/post/9392.html> (August 21, 2023)